

单位代码	10445
学 号	20021292
分类号	K29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明末清初南、北方士人
对待西学态度之比较

学科专业名称 专门史
申请人姓名 翟杰
指导教师 朱西华
论文提交时间 2005年4月20日

明末清初南、北方士人对待西学态度之比较 (中文摘要)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以科学文化为传教手段,在向中国人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科学文化传入中国。西学(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作为一种陌生的外来文化传入以后,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反应相当复杂。不同阶层、不同地域,对西学的反应大相差异。南、北方士人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就有明显的差异。本文对明末清初南、北方士人对待西学态度的差异进行具体分析,并探讨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

“引言”简要回顾学术界对明末清初士人对西学的各种反应、西学在不同地区的传播以及南、北方文化差异的研究状况,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

标题“一”列举明末清初南、北方的知名士人天主教徒和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知名士人。数据统计显示,南方的知名士人天主教徒比北方多,南方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士人也比北方多。表明南方士人对待西学的态度比较积极,接受西学比较广泛。

标题“二”列举明末清初士人排斥西学的重要事件:南京教案、闽浙士人“破邪”、钦天监教案,以及南、北方接受西学但排斥天主教的知名士人。通过对比,表明南方士人拒斥西学的程度比北方士人强烈。

标题“三”分析南方士人比北方士人接受西学广泛的原因。西学传播路经的自南向北,使南方士人首先接触到西学。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南方社会氛围的开放,使南方士人比北方士人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目的、更广的范围认识和了解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思想文化的活跃。人才地理分布、阳明心学和实学思潮皆偏重于南方,是南方士人广泛接受西学的人才基础和思想基础。

标题“四”分析南方士人比北方士人反对西学强烈的原因。西学与儒学在根本上的冲突是士人排斥西学的重要原因,而南方士人云集,排斥的力度也就强烈一些。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的侵略,使南方士人对传教士有很重的猜疑和警惕心理。南方

教务的昌盛，使南方士人对可能由此引起“以夷变夏乱华”的危险有更深刻的忧虑，反西学态度就更强烈。

标题“五”分析山东士人与浙江士人对待西学态度的差异及其原因。

“结语”简要论述明末清初南、北方士人对待西学态度的差异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对南、北方近现代历史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指出双方只有取长补短，才能互相促进，从而对不同地区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明末清初 士人 西学 南北方

分类号：K29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ttitudes to Western Learning
Between Southern Intellectuals and Northern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Abstract)**

At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western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to propagate Catholicism. At the same time, they introduced western science and culture to China. After being spread into China as a strange outside culture, western learning (Catholicism and western science and culture) aroused quite complicated reaction in Chinese society. Different personages and different regions' response were all different. The attitudes of southern intellectuals and northern intellectuals treating western learning had obvious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to the difference of southern intellectuals' and northern intellectuals' attitudes toward western learning, and analyses the reason to cause this kind of difference.

The whol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seven parts altogether.

The foreword briefly reviews the research states towards various kinds of responses to western learning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ern learning's spread in different areas in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nd definitize the subject of this article.

Heading one enumerates the famous intellectuals Catholic and the famous intellectuals that studied western science and culture. Data contrast analyses that southern famous intellectuals Catholic and intellectuals that studied western science and culture were both more than north, which indicates that southern intellectuals' attitude to western learning was more active and they accepted western learning abroad.

Heading two enumerates the important incidents that intellectuals repelled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famous intellectuals that repelled Catholicism. The contrast analyses that southern intellectuals repelled western learning stronger than northern intellectuals.

Heading three analyses the causes of southern intellectuals accepted western learning abroad. The western learning's spreading route from south to north made the south touch western learning at first. The coastal foreign trade of southeast caused the opening of the southern social atmosphere, and made southern intellectuals had more chance, more

purposes and wider ranges than northern intellectuals to know and understand westerners and western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midwifery the activeness of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The south overweight of talen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Wang Yangming's School of Mind and the practical academic trend was southern intellectuals' talent and though foundation of accepting western learning.

Heading four analyses the causes of southern intellectuals repelled western learning stronger. The south had more intellectuals, the repelling power was stronger. The west colonist' invasion in the southeast made southern intellectuals have heavier mind of suspicion. The prosperous of southern Catholicism made southern intellectuals had deeper worry of changjing China.

Heading five analyses the difference of Shandong intellectuals' and Zhejiang intellectuals' attitudes toward western learning.

The epilogue briefly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intellectuals treating western learn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keep lasted until neoteric and modern times and caused different degree influences on history in neoteric and modern times of south and north, and point that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s strong points to offset each other's weaknes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thereby offer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 for the reformation and open of different reg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al society.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ntellectuals; western learning; south and north

Category number: K29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程杰

导师签字：朱五作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学校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程杰

导师签字：朱五作

签字日期：2005年4月20日

签字日期：2005年4月20日

引言 相关的研究和界定

明末清初，随着大批西方传教士的入华，西学（包括天主教和西方的科学文化）也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值社会大变革时期：政治上改朝换代，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文化上阳明心学和实学思潮相继勃兴，军事上倭寇和西方殖民者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学作为一种陌生的外来文化，而且是带来外患的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它的传入，必然在中国社会引起比较复杂的反应。不同阶层、不同地域，在对待西学上出现了不同的态度。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对于明末清初西学东传的关注和研究。梁启超在 1920 年著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与 1923 至 1925 年间所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都特别提到了西学，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西学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学问研究方法”，^[1] 欧洲历算学的输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公案”，值得“大书特书”。^[2] 其后，西学就真的被“大书特书”了。向达、徐景贤、罗常培、张星琅、张荫麟、唐擎、洪煊莲、陈观胜、徐宗泽、陈垣等学者，或从宏观、或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西学的入传过程、内容、影响等。80 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新局面的到来，对西学东渐的研究具有了更加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课题就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出版或刊发了大量的论著及论文。港台的学者和国外的学者，如方豪、李志刚、秦家彭、费赖之、德礼贤、谢和耐、钟鸣旦等，也一直进行着西学东渐的研究，其深度和广度不亚于中国大陆学者，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

有关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在明清西学东传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回顾与评述，如[荷]许理和著、辛岩译：《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研究》（《国际汉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 1999 年）、[比]钟鸣旦著、马琳译：《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国际汉学》第四辑）、[台]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国际汉学》第四辑）、张先清：《回顾与前瞻：20 世纪中国学者之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陈村富主编《宗教文化》第三辑，东方出版社 1998 年）、徐海松：《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论著目录 1980—1999》（《东西文化交流论谭》第 2 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等。鉴于以往的这些研究史论述已经对本世纪以来明清西学东传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回顾，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也包含了士人对西学的各种反应以及西学在不同地区的传播的研究。其中，涉及士人对西学的各种反应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受颐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国学季刊》第 5 卷第 2 期），文中对明末清初士人对西学的各种反应作了归类分析；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 1988 年），书中有 40 余位明末清初接受天主教或对天主的传播有贡献从而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留名的士人传记；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 1994 年），书的“下

篇”就是“明末士大夫对‘天学’的理解与反应”；王晓朝的《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 1997 年）；书中有对护教、排教的明末士人的分析；徐海松的《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 2000 年），考察了清初士大夫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所作出的反应及其对清代学术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沈定平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 年），分析了明末几位有代表性的士人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回应和对中西文化的会通。此外，还有一批研究单个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方以智等人与西学的专著或专论。硕博士论文方面，有西北师范大学杨建平的硕士论文《论明末清初士大夫对西学态度的转变》（2002 年）、华东师范大学林在勇的硕士论文《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对基督教的认识》（2004 年）等。

涉及西学在不同地区的传播的研究成果有：杨建华的《明清之际浙江地区中西文化的冲突》（《浙江学刊》1991 年第 3 期），分析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浙江的传播、浙江学人对西学的吸收和批判以及西学入传对浙江文化的影响；贾二强的《明末清初陕西的传教士》（《文史知识》1992 年第 6 期），简单介绍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播情况；张笃勤的《天主教在武汉地区的传播及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4 年第 1 期），文中提及明朝末年至清朝康熙年间是天主教在武汉的发端时期；赵春晨等著的《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书中有对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岭南的传播的回顾；朱亚非的《16—18 世纪西学在山东的传播》（《中西文化研究》2004 年第 1 期）。此外，江西师范大学吴薇的《明清时期江西天主教的传播》、华南师范大学朱满珍的《康雍乾禁教时期广东的天主教》等硕士论文本别研究了江西和广东天主教的发展状况。

中国国土辽阔，在大范围上可分为南方、北方两大地域，这两大地域的差异非常明显，体现在地理、风俗、品性、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等各个方面，不少学者曾以极大的兴趣关注和研究过南、北方的文化（指包括各领域的广义的文化）差异，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刘德增在其《正统的北方人——中国南北文化透视》（济南出版社 1992 年）一书后的“跋”中将先贤的研究列举了出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该书《后娶》、《治家》、《风操》、《书证》、《音辞》等篇）、顾炎武的《南北学者之病》（见《日知录》卷 13）、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见《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 5 册）、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文集》卷 7）、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见《刘申叔先生遗书》）、柳诒徵的《南北之对峙》（见《中国文化史》第 2 编第 4 章）、林语堂的《北方与南方》（见《吾国吾民》第 1 章）、鲁迅的《北人与南人》（见《鲁迅全集》卷 5）、曹聚仁的《万里行记》（见该书《东南沿海行》、《“南”与“北”》等篇），等等。而刘德增的著作则是对南北文化差异的比较全面的论述。

当代学者对南、北文化差异的研究，除了刘德增的专著外，还有：葛壮、李晓

璐的《浅谈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载《历史学》1986年第6期)、姚乐野的《明代科举制下的南北之争》(载《历史知识》1986年第1期)、赵园的《明清之际士人的南北论》(载《上海文化》1994年第5期)等。此外,一些学者在其研究课题之内也对南、北方差异给予了关注,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九》中有“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蠢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的论述;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赵洪恩、李宝席主编的《传统文化通论》中各有一段集中论述南、北方文化差异的文字;^[3]各种“历史地理”著作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对南、北文化差异的研究,如胡兆量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三联书店2002年)等。

然而,对不同地域的士人对待西学的不同态度的比较研究,比如将西学、士人、南北方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却很少见到。士人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传承者,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他们对西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社会对西学的态度和西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南方、北方因为具有不同的文化性格,对待西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从而使得西学在南、北方的传播也不尽相同,进而影响到南、北方社会发展的差异。即使是在今天,南、北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态度还是不一样的,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有差异的。所以,考察南、北方的士人对待西学的态度,既可作为研究西学东传和南、北文化差异的一个新视角,又对当前日益深入的中外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借鉴,是一个颇具学术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鉴于此,笔者不揣孤陋,进行一次这方面的研究尝试。

本文的研究时段为明末清初,即从明朝万历十年(1582)利玛窦来华,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驾崩。因为利玛窦来华是西学东传真正开始的时间,而康熙时期虽然也有禁教令,但总是禁而不严,西学(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仍有比较大的进展。直至雍正继位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西学的传播才受到较大的局限。

本文研究中涉及的南、北方地域,是指以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各省区为北方,主要是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区为南方,主要是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地。

本文研究的士人均对西学态度明确且在当时比较知名者。因为士人对西学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有的理解、宽容和接受,也有的排斥和批判;有的对天主教和科学文化都接受,也有的只接受其中之一;有的开始接受后来反对,也有的开始反对后来接受;有的态度明确,也有待态度模糊;等等。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尽量选择态度明确的士人,分别从接受西学和排斥西学两大角度进行研究,在接受西学方面,又从接受天主教和研习西方科学文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在排斥西学方面,从天主教和科学文化都排斥、只接受西学但排斥天主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通过比较,分析出南、北方士人在对待西学态度方面的差异,进而探讨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南、北方士人接受西学状况的比较

明末清初的西学（天主教和科学文化）东传是以传教士为媒介的，这些传教士分别来自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及罗马教廷传信部，其中以来自耶稣会者为最多。据法国学者费赖之所撰列传统统计（至 1773 年），在华的耶稣会士为 481 位（含附传），而其它修会的传教士人数远远比不上耶稣会士人数。相较于其它修会的传教士，耶稣会士多是饱学之士。他们一般都受过五六年的大学教育，熟悉和掌握先进的科技理论和实践技术，在天文、地理、数学、哲学、机械制造、医药、生物、音乐、绘画、建筑等各学科各有所长。

耶稣会士等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虽然是晚明时期，但中国仍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具有优势的强盛大国，诉诸传统的征服手段是行不通的。在认真研究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之后，由耶稣会士范礼安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手段，并由利玛窦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发挥耶稣会士的学问特长，最终确立了“适应性”传教策略。其内容包括学习中国文化，尊重儒学，顺应中国礼俗；引入西方奇器，介绍西方科学文化；与官僚士大夫广泛结交，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等方面。这一传教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西学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一时好异者咸尚之”。^[4]

人们对新鲜事物的反应不可能持整齐划一的同一种态度，必定会出现既有接受又有反对的情况。西学作为一种陌生的文化传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其态度当然是不会相同的。单就士人阶层来看，也是既有接受者，又有反对者。而不同的地域，对待西学的反应也是有差异的，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对待西学的态度就不一样。本章将对南、北方士人接受西学的状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第二章再分析比较南、北方士人反对西学的状况。

（一）知名士人天主教徒

明末，政治形势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趋势以及传教士执行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使得不少士人对天主教采取了同情、宽容、支持的态度，甚至有些士人受洗成为天主教教徒。在士人天主教徒当中，有不少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徐宗泽认定的“奉教中有名望之人有”：徐光启（上海人）、李之藻（浙江杭州人）、杨廷筠（浙江杭州人）、瞿太素（江苏常熟人）、冯应京（江苏盱眙人）、李天经（河北吴桥人）、张焘（籍贯不祥）、孙元化（江苏嘉定人）、王徽（陕西泾阳人）、韩霖（山西绛州人）、段袞（山西绛州人）、金声（安徽休宁人）、瞿式耜（江苏常熟）、张庚（福建人）等 14 人。^[5] 这些人都是名公巨卿、翰苑闻人。清初，宫廷争斗、满汉矛盾以及文化高压政策，使得传教士将传教对象由公卿士大夫转向普通士人和民众，天主教徒中为名

公巨卿者极少，其中比较有名的士人天主教徒有：吴历（江苏常熟人）、刘蕴德（湖广人）、许缙曾（上海人）、佟国器（辽宁人）等。无疑，明末清朝的这些士人天主教徒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在这 17 名籍贯明确的士人天主教徒中（张焘除外），南方士人 12 人，北方士人只有 5 人，南方士人天主教徒多于北方士人天主教徒。而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更能有力地表明南、北方士人天主教徒人数的多寡。书中所列皆为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将其中属于明末清初且籍贯明确的士人制表（即表 1：《明末清初信奉天主教的士人一览表》）列出，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方士人有 34 人，占表中所列人数（48）的 71%，而北方士人只有 14 人，占表中所列人数的 29%。这表明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士人中，南方多于北方。下文是南、北方知名士人天主教徒的具体介绍。

1. 南方的知名士人天主教徒

（1）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上海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徐光启在赵凤宇家教授家馆，并且应邀随之前往广西浔州。途经已有西方传教士定居并建造了教堂的广西韶州时，徐光启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初次听到了天主教和西洋科学。这是徐光启“初次和神父们结识，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礼拜了十字架”。^[6]三十八年（1600），徐光启再次到北京应试，道经南京，拜访了利玛窦，与之谈论西方科学和宗教。通过利玛窦的讲解，徐光启对天主教又多了一层认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再次来到南京，此时利玛窦已经北上，传教士罗如望接待了他，并送给他《天主教要》和《天主实义》两本书。徐光启“于邸中读之，达旦不寐，立志受教。”^[7]经过数日观教礼、考道义之后，徐光启由罗如望施洗入教。入教后的次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考中进士，日后仕途显达，历庶吉士、擢礼部高官直至内阁大学士。

无论是在京任官，还是回乡暂住，无论天主教及传教士是受到宽容和优待，还是受到打击和驱逐，徐光启始终保持着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并且为宣传教义、维护教会尽心竭力。

作为教徒，徐光启“是非常虔诚的人：据一位历史学家记载，在他自己的经堂里，他每天在十字架受难像下祈祷半小时。”^[8]万历三十二年（1604），刚入教不久的徐光启为参加会试再次来到北京，他“到达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来拜访教堂，行忏悔礼以及领圣餐。有人说，保禄（徐光启）是如此虔诚，以致在领圣餐时竟忍不住流下泪来，就连站在圣坛栏杆旁的人们看了也一样泪流不止。”^[9]

信教的人总想将他所接触到的人吸引到教中，徐光启也不例外。他在京中时传教，在家乡时传教，在士大夫中传教，在普通百姓中传教，向家人传教，向亲朋传教。

在他的影响下，家人及部分亲友先后受洗入教，不少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也因之对天主教抱有好感或入教。

徐光启不仅自身热心传教，还积极支持其他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万历三十五年（1607），因父亲去世，徐光启回籍守制，途经南京，邀请郭居静到上海开教。次年冬，郭居静到达上海，徐光启为他安排住处，建造教堂，协助他传教。两个月中，有50人受洗入教。此后在徐光启及其家人的支持下，上海教务日渐发达，“二年之间，就付洗二百”。^[10] 回京后，徐光启依然很关心在上海传教的教士，这从他的家书中就可看出。如“郭先生（郭居静，当时均称先生）何时来，何时去，仍在西园否？旧年先生到，住在西园。今年若先生欲来，可仍在西园住；……如少，再造一两间，不妨也。他盘缠自用，只要房子，或时常馈些食用足矣。”^[11]

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礼部侍郎沈口上疏反对天主教，请逐西教士，随后兴起南京教案，逮捕教士，迫害教徒。教难期间，徐光启为保护传教事业四处奔波，不仅写信嘱咐在上海的家人保护教士、料理教务，还上《辩学章疏》，以身家性命相担保为教会及教士辩护。他在上疏中指出，天主教是正教，“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功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一切训诫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传教士是贤正之士，“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传教士所传学问是正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如果容留传教士在华传教授学，则“数年之后，人心世道，必渐次改观。乃至一德同风，翕然不变，法立而必行，令出而不犯，中外皆勿欺之臣，比屋成可封之俗，圣躬延无疆之遐福，国祚永万世之太平矣！”^[12] 徐光启的《辩学章疏》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因其中有不少夸张和渲染天主教和传教士的溢美之辞，所以此疏在教中流传很广，抄本、刻本很多。

徐光启还利用各种机会，向朝廷输入先进的西方器物、推荐传教士，使朝廷切实认识到西方科技的重要性，认识到传教士是有用之才，不得不利用西方科技，起用传教士，从而提高了天主教和传教士的声望，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在通州练兵时，请李之藻派人去澳门购买火炮。次年，李之藻的门生张焘从澳门购得一批火炮，并带回了技术高超的炮手前来教习。后来袁崇焕守宁远，用西洋火炮大败清军，并把努尔哈赤炸伤致死。朝廷看到西洋火炮的威力，遂决定下诏到澳门招募洋人和传教士来京供职。自南京教案遭受重大打击后，传教士重新得入内地传教，天主教重新抬头。自崇祯二年始，徐光启主持西局，督领修历，他借机邀请传教士龙华民、邓玉涵、罗雅谷、汤若望等入京参加修历，并对他们格外关照。在去世前一天的上疏中，他还为传教士请功：“如远臣罗雅谷汤若望等，撰译书表，制造仪器，算测交食躔度，讲教监局官生，数年呕心沥血，几于颖秃唇焦，功应首叙；但远臣辈

守素学道，不愿官职，劳无可酬，唯有量给无碍田房，以为安身养贍之地，不惟后学攸资，而异域归忠，亦可假此为劝。”^[13]

宣传和赞扬天主教教义亦是徐光启热心从事的活动。他为传教士的著作润色文词，作序或作跋，以促进流传。他为利玛窦的《二十五言》作跋，“大大提高了这本书的声望”。^[14] 传教士旁迪我撰《七克》，他“为之笔削，并撰《克罪七德箴赞》”。^[15] 他与传教士毕方济共同翻译了《灵言蠡勺》，探讨天主教关于人的灵魂（亚尼玛 Anima）、灵魂不死以及死后荣登天国的道理。他个人也写了不少宗教著作，有宗教赞美诗，如《耶稣像赞》、《圣母像赞》、《规诫箴赞》等；有关于天主教学说的散文，如《造物主垂像略说》、《景教堂碑记》等；有批判中国佛道两教及民间迷信的散文著作，如《辟妄》、《咨陬偶编》等。徐光启还常常利用出版科学著作之机介绍宣扬天主教，在《刻几何原本序》、《刻同文算指序》和《泰西水法序》中，都有论及并赞扬传教士修身事天之学的言辞。

徐光启是名声显赫的士大夫，又位居高位，能够准确地判定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是否合适，所以传教士遇事往往同他商量。《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徐保禄（徐光启）博士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传教士）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则要新奇而有证明。”^[16] 这表明徐光启促进了传教士向中国译介西方科学著作的举动。在杭州开辟新教区的计划，亦是在征得徐光启的“完全同意”之后，才付诸实施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死后，继任中国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入京，试图上疏请求传教，后来因为徐光启的劝阻而没有上疏，因为上疏请求传教可能产生副作用。阳玛诺负责北京教务时，就受到上面指示，不论何种举动，应先与在京的徐光启、李之藻商量。^[17]

由于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和传教士活动的支持与保护，徐光启受到传教士的高度赞扬，在当时的欧洲亦有一定的名气。耶稣会士柏应理在《徐光启行略》中写道：“现在西国，大圣人及国王及公卿士庶，无不称赞中国之徐公，诚心恭敬天主，著书立行，德高业盛，真为天学干城，国家楨干。”^[18]

（2）李之藻

李之藻（1565—1630），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居士、存园寄叟等，浙江仁和县（今杭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先后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福建学政、工部分司、州知府、南京太仆寺少卿、河道工部郎中、广东布政使、光禄寺少卿等职。“万历辛丑（1601），利氏（利玛窦）来宾，余（李之藻）从寮友数辈访之。”^[19] 之后，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李之藻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利玛窦向李之藻灌输天主教义。万历三十八年（1610），李之藻在北京突患重病，生命垂危。当时他只身一人，旁无眷属，幸得利玛窦精心照料，方转危为安。他认为“此后有生之年，皆

上帝所赐，应尽为上帝用也。”^[20] 遂于病愈后不久，受洗加入了天主教，教名良，传教士称他为“良博士”。入教后，他捐献黄金 100 两，用于修筑北京的教堂。万历三十九年（1611），因父亲病逝，李之藻告假返回杭州，邀请耶稣会士郭居静、金尼阁同去杭州开教。同年五月八日月，郭居静、金尼阁在杭州城内李之藻居所举行了第一次弥撒，杭州自此开始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

李之藻早年信奉佛教，在家中设佛堂，供奉菩萨。皈依天主教后，他将家中的佛像尽行毁弃，换上天主教耶稣救世主像，还在自家附近建造了一所小教堂。不仅毁弃家中佛像，“李良博士在基督教（即天主教）中继续前进，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用行动表明他思想中已归信的东西。当他成为基督教徒后首次担任官职，吏员通知他，按照习惯，他应去他将居住的府衙的一座大堂，向那里的众多的偶像礼拜和宣誓。博士去了，进入偶像所在的厅堂，他举行的仪式是：把偶像都掀翻在地，然后打成碎片。”^[21]

在与传教士交往过程中，李之藻对他们的关心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出自对神父们的敬爱，他日益关心他们的学习和健康，也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以及他们应知道的跟中国人谈话的语言、礼节、问候，这些在中国人中是很受重视的；在种种情况下，当他发现我们有失中国礼仪时，他总是诚恳地给我们告诫和指导。他对我们是那样关切，常常先亲手摸摸我们的袍子看看是否供给我们足够的御寒衣服。我们有人生病时，他叫在他自己家里煎药，说，因为我们的仆人大意或无知，药会丧失效力，病人得不到救治。总的说他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尊敬和爱护，尤其对那些刚来的，还不会说中国话的人更是如此，这些人他总是分外照顾，很同情他们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所费的劳力，为鼓励他们，他会高兴地听到他们开始说中国话时发的每一个音节。他特别指导他们学习中文的方式和方法。他告诉他们最需要用的书名，并且好几次把书送给他们，亲笔一点一画书写，这在中国是一门特殊的学问。”^[22]

为了宣传天主教，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促进天主教的发展，李之藻还积极撰写、编著相关文章和书籍。他为传教士的著述作序，向世人介绍传教士和天主教。晚年，他致力于编辑刻印《天学初函》，并于卒前一年（1629）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介绍西学的丛书，汇集了李之藻、徐光启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译著共 20 种，54 卷，32 册。丛书分为理编、器编二编，器编为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而理编 10 种则多为宣传天主教教义的著作。

李之藻信教的虔诚和为天主教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得到了传教士的高度评价：“中国的基督教，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要大大地感谢李良博士（李之藻）非凡的虔诚和提供的仁慈帮助”。^[23]

（3）杨廷筠

杨廷筠（1557—1627），字仲坚，号淇园，教名弥额尔，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与李之藻同乡。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曾任知县、监察御使、按察司副使、顺天府丞等职。万历三十年（1602），杨廷筠在北京结识利玛窦，接触到天主教和西学，但并没有深究，之后曾一度对佛教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之藻丁父忧回到杭州，杨廷筠前往吊唁，见到郭居静、金尼阁两位传教士，“欣然叩其宗旨，既而恳覲主像，竦息瞻拜，恍若大主临而命之也，因延先生（指郭居静、金尼阁）至家，厚礼之。”^[24] 杨廷筠接受了天主教灵魂不朽和天堂永福的说法，而将佛教的轮回、天堂地狱之论列为不真之言，决定改奉天主教。同年，杨廷筠弃妾受洗，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从那以后，杨廷筠终其余生为教会工作，与耶稣会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入教后的杨廷筠，其一言一行皆表明了他信教的虔诚和热情。他认为，“人不信天地之主，则已自绝于天主，即有他美，无可抵赎。”^[25] 他把自己家中原先供奉菩萨的厅堂改成圣堂。他的母亲笃信佛教，不信天主。他为了劝化母亲入教，沐浴守斋，热心祈祷，并不惜以节食相劝，终使其母受洗入教。在他的劝化和影响下，其妻子、儿女及家族亲友共有 100 多人进了教，乡邻、友人中也有不少受洗入教。杨廷筠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还有意识地按照耶稣会士自省的方式，一天早、中、晚三次肃静颂经，检讨思、言、行的过失，并且做到省而后改，改而后述，述而后正。^[26]

本着博爱的基督精神，杨廷筠做了许多救济普通百姓的善举。如他建立仁会，召集缙绅将每日存储或劝募所得捐出，使“饥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葬。”他兴办仁馆，让无钱读书的穷孩子入馆学习，不仅经常去仁馆巡视，还亲自为孩子们讲授伦理道德。^[27]

杨廷筠为传教士提供了很大的物质帮助。他买了一处房子作为传教士住院，便利传教士在杭州居住和传教。他在杭州郊区购地一块作为教友公墓，郭居静、金尼阁、罗如望、阳玛诺、殷铎泽、等耶稣会士先后安葬于此。他还慷慨地为修建教堂出钱出力，一生共修了四座教堂。^[28] 南京教案发生后，杨廷筠分别致函各地熟识官员，竭力为天主教申辩，托他们保护传教士，他自己也千方百计保护传教士，将郭居静、龙华民、钟鸣仁、游文辉等多名传教士和修士以及教友接到杭州家中，为他们提供了一处“在困难日子里所能有的最安全、宽敞和方便的避难处。”^[29]

杨廷筠由热衷佛教改信天主教后，引起僧人的嫉恨，他们撰文攻击他，其中行元和尚的《非杨篇》骂他骂得很凶。杨廷筠撰文辩驳，反佛教尊天主教。南京教案期间，他又撰文为天主教辩护。此外，他还写过多部弘扬天主教的著述。杨廷筠在“三大柱石”中护教、传教著作最多，主要有《代疑篇》、《代疑续篇》、《天释明辨》、《鸛鸾不并鸣说》、《西学十诫诠释》（不存）、《圣水纪言》（孙学诗辑杨廷筠论“天学”之言等）。

^[30]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是同时代的朋友，生活在经济上最发达、学术上最活跃的地区（杭州和上海）。他们受过良好教育，都有官职，在经济上也有保障，因而他们是传教事业的最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他们撰写著作，帮助翻译、编辑、出版耶稣会士的著作，寻求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富有活力的融合。”^[31]而且“徐、李、杨都是名高位重之士，都是进士，担任相当高的官职，最高者为大学士，他们崇奉西学，受洗入教，其影响远非一般凡夫俗子可比。特别是‘南京教案’发生以后，三人都尽其所能，或上疏抗辩，说明传教士来华，于国有利；或甘冒风险，藏匿被逐之西人。他们因此被称为天主教在中国开教的‘三大柱石’。”^[32]

（4）瞿太素

瞿太素（1549—？），名汝夔，江苏常熟人，礼部侍郎瞿景淳之子。瞿汝夔很早就和利玛窦相识，且相交很深。利玛窦初来华时，原穿僧服，瞿汝夔劝其改穿儒服。日后利玛窦能受到士大夫的欢迎，也得力于瞿汝夔的吸引。瞿汝夔曾从利玛窦学习西学，又曾为利玛窦著述作序。万历三十三年（1605），瞿汝夔从传教士罗如望受洗入教，教名依纳爵。

（5）冯应京

冯应京（1555—1606），字可大，号慕冈，江苏盱眙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关于其入教之事，徐宗泽言冯应京于“1602年皈依圣教”，方豪言冯应京“1601年偶读《天主实义》，大为感服，代为作序，次年受洗，……”，而孙尚杨据利玛窦的记载证明徐宗泽、方豪的结论是臆断，没有根据，冯应京并不是天主教徒。^[33]

（6）孙元化

孙元化（1581—1633），字初阳，号火东，教名依纳爵，江苏嘉定人。在北京任职时与徐光启友善，受其影响而受洗入教。孙元化受洗后，即赴杭州杨廷筠家中邀请传教士至嘉定开教，并出资建一教堂，又在堂侧建教士住宅十余椽，并附设学校。曾德昭、郭居静前往传教，三四年间发展教徒数百人。邓玉涵、傅泛济都曾在学校里学习中国语文。嘉定成为继杭州之后又一处传教士常驻之地。南京教难时，孙元化曾保护毕方济，留居嘉定本宅。^[34]

（7）金声

金声（1598—1645），字正希，徽州休宁人。天启年间入京应试时，与传教士接触。之后在南京读书时与毕方济神父相交。崇祯元年（1628）进士，与徐光启善，领洗入教。

（8）瞿士耜

瞿士耜（1590—1650），字伯略，又字起田，号稼轩，教名多默，江苏常熟人，瞿汝夔从侄。天启三年（1623），艾儒略到常熟一带传教，瞿士耜这时正在家守制，得以结识艾儒略，并从其受洗。瞿士耜受洗后，“曾在宅门外张贴‘僧道无缘’字条，

又以耶稣圣号代替一切偶像。”^[35]此后，瞿士耜除了研究天主教以外，还积极研究西方的科学文化，特别对西方火器很关注，成为朝廷官员中西学的极力倡导者。明朝灭亡后，瞿士耜拥立桂王朱由榔，是永历小朝廷中极为重要的官员，曾派庞天寿与传教士毕方济赴澳门借兵借炮，抗击清军。

(9) 张庚

张庚，字夏詹，又字明皋，号昭事生，教名玛竇，福建人。任杭州教谕时入教，奉教极热心，与杨廷筠协助西士翻经译传。他为多部天主教著述的完成做了很多努力，如与韩霖合撰了我国第一部记述天主教士传略与著作之书《圣教信证》，订正福建福唐人李九标的《口铎日抄》并作序，为传教士孟儒望《天学略议》、艾儒略《五十言余》、《圣梦歌》作序，订正龙华民《圣若撒法行实》。

(10) 吴历

吴历（1632—1718），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教名西满·沙勿略，江苏常熟人。他是中国天主教史上元、明以来，惟一一位兼擅诗、琴、书、画的教徒。^[36]吴历自幼领洗，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却与佛教人士往来密切，四十岁以后，即康熙十一年（1672）以后，才开始与教友往来。康熙十五年（1676），开始与鲁日满等西方传教士交往。康熙二十年（1681），吴渔山决定随传教士柏应理往欧洲，行至澳门，因故未能成行，便留在澳门，加入了耶稣会，进入圣保禄（广东话译为三巴）学院学习神学、哲学和拉丁文等。在澳学习期间，他写了许多以他的学习、生活和天主教、圣保禄学院、西方器物及澳门风情为题的诗作，后辑为《三巴集》。毕业后，吴渔山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8月1日在南京由罗文藻晋为司铎，是第一批在中国本土晋铎成为神父的三位中国籍耶稣会士之一（另两位是江西人万其渊、湖广人刘蕴德）。此后直至逝世前30年间，吴渔山在上海、嘉定及其附近城市传教，管理教徒，不顾年老体弱，往来奔波，不辞辛苦。又曾在嘉定组织数名教友成立圣方济各会，并任会长。

(11) 刘蕴德

刘蕴德（1628—？），字素公，教名巴西略，湖广人。入耶稣会前曾担任钦天监右监副，与教士来往颇密。曾被朝廷派往山西开矿，受诬革职，遂由南怀仁受洗。康熙二十七年（1688）与万其渊、吴历同时由罗文藻主教晋为司铎。之后，传教于上海、南京等地，所到之处受人尊敬。

(12) 许缙曾

许缙曾（1627—？），字孝彦，号鹤沙，教名巴西略，松江华亭人。许母徐太夫人为徐光启孙女，因对天主教贡献巨大而名扬欧洲。许缙曾是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任职于北京、江西、四川、湖广、河南等地。他自幼领洗，受其母影响，常常做一些有利于教会和传教士的事。不论在何处任职，他都善待教士，捐建教堂，尽可能地维护、支持传教工作，对天主教在四川、湖广、河南的恢复与发展帮助很大。他还曾

提议创办育婴所，收养众多弃婴。

2. 北方的知名士人天主教徒

(1) 李天经

李天经（1579—1659），字仁常，又字性参、长德，河北吴桥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曾任开封府儒学教授、济南知府，又历官豫、陕等省。崇祯五年（1632）由徐光启介绍至历局修历。关于其入教之事，徐宗泽言“进士仕京师，与徐文定公善，听其劝而入教。”^[37] 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邓玉函》中亦言其为“信教官吏”，^[38] 方豪也认为“据李天经一生的行事来看，费赖之称他是教友，似无可疑，但找不到一则汉文的积极证据。”^[39]

(2) 王徵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了一道人、支离叟，教名斐理伯，陕西涇阳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曾任广平推官、扬州推官、山东按察司金事。大约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冬或次年春，王徵进京考进士时，与来华传教士相识，并受洗入教，“为陕西省首先奉教之人”。^[40] 天启五年（1625），王徵协助金尼阁在陕西传教。王徵诚心信教，热心传教，撰有多部宣传天主教的著述，如《事天实学》、《真福直指》、《畏天爱人论》、《两理略》、《天问辞》、《经籍全书》等。^[41]

(3) 韩霖

韩霖，字雨公，号寓菴，教名多默，山西绛州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曾在北京任职，期间从徐光启学兵法，受其影响而受洗入教。归家后，邀请传教士高一志（后改名王丰肃）至绛州传教，并校订其撰述。韩霖著有《铎书》，引述教理与教会书籍颇多。又与福建张庚合撰《圣教信证》，为我国第一部记述天主教士传略与著作之书。

(4) 段袞

段袞，字九章，教名伯多禄，山西绛州人。在北京做官奉教。他是绛州巨绅，既富且贵。曾捐巨款建教堂，又担任高一志所创之社团（赈济贫民、劝人入教）主席，并校阅高一志之撰述。

(5) 佟国器

佟国器（？—1684），字恩远，号汇白，教名弥额尔，辽东人。历官苏、浙、闽、赣各省，善待教士，慨捐巨款修建教堂、刊印经书。康熙十三年（1674）在南京受洗。

(二) 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知名士人

传教士以传播西学为传教手段，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地理、医药、音乐、美术、建筑、机械制造、火炮技术等相继传入中国。明清士人中的有识之士，

在认识到西学在某些方面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优势,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很有裨益之后,出于经世致用以及“会通中西以求超胜”的目的,积极学习、研究西方的科学文化,从而涌现了一批研习西方科学文化、会通中西的科学文化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王徵、王锡阐、薛凤祚、梅文鼎、吴历、焦秉贞等。

然而,在根据《利玛窦札记》、《徐光启集》、《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西交通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畴人传》、《清史稿》、《清初士人与西学》等相关资料,制成的《表2: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明末清初知名士人一览表》中,南方士人有65人,占表中所列人数(85)的76%,北方只有20人,占表中所列人数的24%,还占不到南方士人人数的1/3。这表明,南方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士人远远多于北方士人。下文是对南、北方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知名士人的具体介绍。

1. 南方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知名士人

(1) 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是最早主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懂得西学最多、介绍西学最力的人。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荚、水利诸书。”^[42] 他会通中西的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数学、天文历法、水利、军事技术等方面。

在数学方面,徐光启最突出的成就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包括卷一论三角形,卷二论线,卷三论圆即圆,卷四论圆内外形,卷五、卷六论比例。每卷有界说即定义,有公论即定理,有设题即例题。《几何原本》的翻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次翻译即成我国惟一的定本,历代数学家均予确认,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欧几里得的《原本》曾被翻译成许多文字,但几乎没有一种文字的翻译能一次成功。《几何原本》的翻译很精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书中所确定的许多名词术语,如点、线、面、直角、锐角、钝角、直径、平行线、外切等,十分切合它本身的数学意义,一直沿用至今。《几何原本》是明末最先译成中文的西方数学著作,开明末清初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之先河,此后陆续有关于西方数学的译著问世。它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几何学著作,第一次把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介绍给中国知识界,几何由此而成数学之一科。此书译出刊行后,迅速流传开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到一百年中,有三种刻本行世,研习几何成为中国数学家必需之素养,几何方面的著作纷纷涌现,如孙元化的《几何用法》、杜知耕的《几何论约》、方中通的《几何约》、梅文鼎的《几何通解》等,都是明清数学领域引人注目的部分。《几何原本》是许多人学习数学的必读书,对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数学人才起了重要作用,梁启超称赞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43]

以《几何原本》为基础，徐光启进一步开展对中西数学中测量法的研究，先后写成《测量法义》（1608年）、《测量异同》（1608年）和《勾股义》（1609年）三部书，“皆以明《几何原本》之用也”。^[44]受西方数学的影响，徐光启于崇祯二年（1629）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提出了著名的“度数旁通十事”，即天文气象、水利、音律乐器、军事、财政会计、建筑、机械、测绘、医药和计时，明确系统地阐述了数学与其他科学技术的密切关系，强调要重视数学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盖凡物有行有质，莫不资于度数故耳。”^[45]

在天文历法方面，徐光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思，吸收利用西方先进知识，结合中国传统知识，进行历象观测、仪器制造、书目编撰、历法修订，从而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也为促进中国天文历法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徐光启在和利玛窦交往过程中，对西洋历法有了初步的了解，在事实证明了西洋历法的先进后，徐光启等人开始积极学习西洋历法，并建议朝廷参用西历修订中国历法。利玛窦去世后，他继续向传教士熊三拔学习。万历三十九年（1611），徐光启和熊三拔合作制造简平仪，并将熊三拔对简平仪的讲解记录下来，整理成《简平仪说》，又撰写了《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三部著作。这期间，徐光启在北京积极制造仪器，出版书籍，上疏呼吁，以促成修历，但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直至崇祯即位后，修历才正式开始。崇祯二年（1629），西局设立，由徐光启全权负责，督领修订历法。他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涵、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参加修历。他的修历工作，既继承了我国传统测天制器中的优秀方法，又努力会通中西，从而在方法上和理论上，把中国的天文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徐光启重视对天象的实际观测，制造和改进天文仪器，中国自制的第一个望远镜就是在此时完成并投入使用的。本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46]的宗旨，他融会贯通中西历法，组织编译撰写了大量历学书籍。为早日修成新历，徐光启有效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勤于观测、亲自参加撰写和编译、对书稿进行修改和润色，甚至在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之时，仍在操持修历之事：阅读、修改最后一部分书稿，推荐李天经接任历务，继续修历。崇祯七年（1634）底，即徐光启逝世后的第二年，新历终于编修完毕，共计137卷，定名为《崇祯历书》。《崇祯历书》的问世，徐光启起了主导作用。

《崇祯历书》与中国古代传统历法相比，有许多改革和进步之处，主要有：引进明确的地圆思想和经纬度概念；认为各种天体与地球的距离不等，并且给出各种天体距地的具体数值，用于推算它们的行度；应用蒙气差，以准确表示天体的方位；引进几何学、三角学的方法，简化计算手续，提供准确的计算公式，扩大解题的范围；定气注历；日月有高耸行度，即日月在本天行度外还循小轮运动，引起距地远近和速度不等的变化；恒星有本行，即恒星以黄极为极，引进了新的岁差概念；小轮体系和椭圆体系，能够大致用几何运动的假设解释了天体顺、逆、留、合、迟、疾等天文现象；

五星绕日运动，其运动方位受太阳运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引进了一套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包括分圆周 360° ，一日96刻，60进位制，黄赤道座标制等。^[47]由于采用了较好的天文数据和方法，引进和介绍了不少西方天文学成果和概念，所以，《崇祯历书》的编撰和出版，是对中国天文学的深刻改革，它使中国的天文学重新获得生机，走上与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道路。

徐光启很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认为“水法一事，象数之流也，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民足，或且岁月见效。”^[48]利玛窦在世时，曾对徐光启谈及西方水利知识，并将熟知此事的传教士熊三拔介绍给他。后来，徐光启就同熊三拔商议翻译西方水利学著作的事情。1612年，徐光启和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在北京刊印。此书共6卷，主要介绍了西方取水蓄水的方法和器具。《泰西水法》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水利科学，对发展中国农田水利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曹于汴在为《泰西水法》作序时说：“阅泰西水器及水库之法，精巧奇绝，译为书而传之，規制具陈，分秒有度。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用力约而收效广。……中华之有此法，自今始。”^[49]后来徐光启编撰《农政全书》时，将《泰西水法》收入水利部分，丰富了中国农业科学知识。

通过与葡萄牙人作战和传教士的介绍，西方的火器和军事技术传入了中国。徐光启积极主张引进西方火器，利用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提高明军战斗力，加强国防，抗击外敌。为此，他主要着力于四个方面：购买和仿造西洋大炮，任用西洋军事人才，按西方技术建造炮台，组建精锐火器营。万历四十七年（1619），因关外战事吃紧，徐光启受命练兵，有意购买西炮，招募炮手帮助教练。在徐光启的呼吁下，张焘两次赴澳门，共购得火炮30门，聘请精通炮术的传教士和炮手十几名。这批火炮中的11门被运至关外，在天启六年（1626）的宁远之役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击毙击伤数千后金官兵，努尔哈赤被炸伤，不久死去。徐光启不仅主张购买火炮，还主张自制，曾屡次上疏“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50]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中有精于制炮者，于是朝廷命令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

同时，徐光启还极力主张建造西式炮台。天启元年（1621），他在《谨申一得以保完全疏》中，再次指出：“今欲以大、以精胜之，莫如……西洋大炮。欲以多胜之，莫如……星速鼓铸。欲以有捍卫胜之，莫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完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一台之强可当雄兵数万，……盖其法即西洋诸国所谓铳城也。”^[51]随后，在《移工部揭帖》中，对这种炮台的结构、尺寸、材料等进行了详细介绍。驻守宁远的袁崇焕在兵部主事孙元化的帮助下，根据徐光启“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原则，重新修正了宁远城墙，“四角台皆照西洋法改之，行如长爪，以相自救”。这种敌台三面突出城外，火炮可三面击打，克服了传统城墙“凡敌至城下则铳不及矣”的缺点。在敌人冲至城根穴城、竖云梯时

可形成交叉火力杀敌。^[52] 宁远之战明军之所以取得大胜，除得力于西洋火器之外，与这种攻守皆利的新式敌台也是有关的。

出于对西方军事技术的了解和加强本国军事力量的愿望，徐光启设想建立一支用西方火器装备的精锐部队。具体规划是：设立 15 营，6 万人，每营战士 2000 人，队兵 2000 人，配置 120 辆双轮车、120 辆炮车、60 辆粮车、西洋大炮 16 位、中炮 80 位、鹰铳 100 门、鸟铳 1200 门，以及甲冑、执把器械等。^[53] 为实现这一设想，徐光启推荐孙元化任登莱巡抚，组建火器营（关于登州火器营，见 17—18 页孙元化简介）。

徐光启为建立新军、使用火器、建造炮台所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西方的军事技术，促进了中国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

（2）李之藻

李之藻（1565—1630）的聪明博学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他所学很广，天文、地理、军事、水利、音乐、数学、理化、哲学、宗教，无所不究。《开州志》卷四《宦蹟》，说他“性明敏，法令划一，摘发如神，人莫敢欺。于诸家之学，无所不窥。”利玛窦非常推重他，说：“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唯李振之、徐子先二人耳”。徐光启也有“吾友李水部振之，卓犖通人”之赞语。^[54] 与利玛窦结识后，他被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所吸引，又积极学习、钻研、引进西学。李之藻译撰、刊刻了一大批西学书籍，在世界地理、天文历算、逻辑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主要有：

《坤輿万国全图》 李之藻青年时代就对地理学颇感兴趣，曾自制一张《天下总图》，内有中国 15 省之地图，以为天下尽在其中，待他拜访利玛窦，看到其绘制的《山海輿地全图》时，才发现天下很大，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同时又了解到地圆、地球大小、五大洲、五带、山川和各国国名等世界地理知识。这使李之藻眼界打开，深为所动，决定将此图精心刊刻，大量发行，让世界地图广为人知，让地理学知识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李之藻刊刻此图时，并非照搬直刻利玛窦的初本，而是取西文原图及有关地理志书，对比参照，重加考证、确定，既纠正初本谬误之处，又增补许多国别名称，并加注各地风俗、特产，后经利玛窦详细校正，才付刊刻。万历三十年（1602），改名为《坤輿万国全图》的新图刊行，图高七尺，宽三尺，分为六幅，成一屏风状，可展可合。新图受到人们热烈欢迎，纷纷索要购买。此图的印数总计达千份以上，不仅流传中国各地，还远传国外，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和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的《坤輿万国全图》，都是李之藻的刻印的版本。^[55] 李之藻刻印的《坤輿万国全图》，不仅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扩大中国人的视野，冲破陈旧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理观念，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浑盖通宪图说》 万历三十五年（1607）由利玛窦口授，李之藻译撰。此书是李、利合译的第一部西学书籍，也是中国第一部西方天文学译著。自万历十九年（1601）

与利玛窦结交后，李之藻即随其研习西方历算。他将平日所学记录下来，融合自己的见解并结合实际观测资料，融会贯通，译撰成书。《浑盖通宪图说》分上、下两卷，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此书卷首另加一篇有关浑象的介绍。该书上卷叙述星盘面上各种标网的绘制法，其中包括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地平坐标三个系统在平面上的投影。下卷介绍在星盘上标画恒星的方法，并说明星盘的使用方法。书中首次介绍了黄道坐标系和星盘等概念，以及测月食定经度的原理等等。^[56]

《圆容较义》由利玛窦口授，李之藻译撰，先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11月由毕拱辰刊刻于北京，后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由汪孟朴重刻于杭州。书的正文分为18个定理，专论圆的内接与外切理论，每定理下有图、有解、有论，推理详尽，立论严谨。此书是中国最早的西方数学理论译著之一。^[57]《圆容较义》也是一本天文学著作，以算学上周圆之理，证明天地浑圆之说。

《同文算指》利玛窦口译，李之藻笔述，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行。全书10卷，前编2卷，通编8卷，另附别编。前编主要论述整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加法、减法和乘法与分数除法，和现在运算方法已趋一致；通编内容有比例、比例分配、盈不足问题、级数、多元一次方程、开方等；别编收录有关数学书的习题和内容。此书是介绍欧洲笔算的第一部著作，在中国数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寰有诠》和《名理探》皆由李之藻与传教士傅泛济合译。《寰有诠》刻印于崇祯元年（1628），6卷，阐述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得的宇宙论；《名理探》于崇祯四年（1631）刊行，10卷，是中国第一部西方逻辑学译著。这两部书均为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论著作，原文艰涩难懂，但李之藻的译文流畅顺达，意尽理宣，有助于西方哲学思想的传播。

《天学初函》李之藻编辑刻印于崇祯二年（1629），汇集了李之藻、徐光启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译著共20种，54卷，32册。丛书分为理编、器编二编，理编10种为宣传天主教教义以及介绍西方学术概况、习俗、政治等情况的著作，器编10种为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天学初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介绍西学的丛书，为人们学习西学提供了便利的资料来源。

通过研习、译撰西学书籍，李之藻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博学多通、才气横溢，不仅为当时国内的士人所仰慕，即便在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中亦享有盛名。他们赞誉李之藻为中华才士，坦承其对西方科学“的确很了解，以致他比许多有学识的欧洲人，能更好地谈论任何题目。”^[58]

（3）孙元化

孙元化（1581—1633）曾跟徐光启学习火器和算术，在这两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算术方面，他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泰西算要》等书，还协助徐光启编译《几何原本》、《勾股义》等书。在火器方面，他曾向传教士学习过西洋炮台

的造法和西洋大炮的用法,并在北京和关外加以亲身实践。由于他对西洋大炮很熟悉,并有实战经验,又是天主教徒,且与西方传教士继葡人炮师相处融洽,所以崇祯三年(1630)徐光启推荐他担任新设立的登莱巡抚,筹备建立西洋火器营。在同样精通火器的王徽、张焘及西洋炮师公沙的西劳、传教士陆若汉等人的协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孙元化部队不仅拥有佛郎机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余位,每位重二三千斤,而且也有了一批熟练掌握西洋火炮技术的枪炮手。”^[59]用西洋枪炮装备起来的登州孙元化部成为当时明军装备最好、作战能力最强的武装,并曾在对后金作战中发挥出巨大威力。崇祯四年(1631)元月,后金军企图袭击明军驻守的皮岛(朝鲜沿岸),孙元化派张焘率百余艘兵船并携西洋炮师和火炮迎战。在这次战斗中,明军配置的西洋大炮显示了威力,重创后金军队。后来因孔有德之乱,孙元化被俘,西洋火器落入后金手中。虽然这使得明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进一步逆转,但孙元化建立火器营的努力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事技术的进步。

(4) 方以智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方以智是明清之际思想家中对西学了解较多、研究较深的人。为研习西学,他积极与学问水平较高的传教士毕方济、汤若望结交,直接向他们请教西学。同时,他大量阅读《天学初函》等西学著作,包括吸收过西学知识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如熊明遇的《格致草》、薛凤祚的《历学会通》等。由此,方以智吸收了较多的西学知识,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加以引用。方以智对西学的论述,较集中地反映在《物理小识》、《通雅》两部巨著之中,其它散见于《东西均》、《膝寓信笔》等著作中。《物理小识》中约有5%的篇幅援引了当时传教士译介的资料,其中54处引文摘自艾儒略《职方外纪》。除卷4、卷5外,其它10卷(《物理小识》共12卷)均有摘引的西学资料进行论述、对比和参证。《通雅》中亦不下数十处征引了西学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天文地理、人体解剖和生理卫生、历算奇器等方面。^[60]

在大量吸收西学知识的基础上,方以智进行了借鉴和利用,在文字音韵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由于通借甚多而歧义纷纷,应当进行改革,学习西方语言一音一字、一字一义的确切性。而且,他认为中西文字声韵可以会通,古音的通转,可以借西方文字说明。受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的启发,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音韵变化,列《旋韵图》,进行了一次会通中西文字尝试。

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方以智在总结和批判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借鉴西方科学,提出了重实证、重实践的“质测之学”。“质测”意即实测、实证。他认为西学的长处是“详于质测”,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西方“质测之学”的实证精神,应当以西方“质测之学”的实证方法来剔除中国古代科学中混杂着的“吹影镂空”的幻想联系和神怪议论。他在《物理小识》和《通雅》中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大量引用正是对“质测

之学”的实践。

(5) 王锡阐

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他一生隐居不仕,潜心于天文历算研究。他主张中西兼采,“考证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61]王锡阐重视实际观测,“每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鹞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在实际观测的基础上,他对中西天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吸收两者长处,终致“兼通中西之学,自立新法。”^[62]王锡阐天文著述较多,《晓庵新法》是其代表作,被收入《四库全书》中,除此以外还有《历法表》、《六统历法启蒙》、《历策》、《历说》、《日月左右旋问答》、《五行星度解》、《推步交朔序》、《步交会》、《测日小记序》等。在这些天文著述中,“他提出了日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计算的新方法,发明了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提出了细致地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这些都比时人所用中、西方法有所进步。”^[63]

(6) 梅文鼎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毕生从事天文学、数学研究,著述80余种,是清初天文、数学第一大家。曾得到康熙帝的亲自召见,相与论学,并获御赐“绩学参微”嘉名。^[64]

天文方面,梅文鼎有著述40余种,其中《交食》、《七政》、《五星管见》、《揆日纪要》、《恒星纪要》等书,系统介绍第谷体系的西方天文学,是他对西方天文学细心钻研的成果,包括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梅文鼎对从西方传入的天文仪器也很注意,对简平仪和浑盖仪这两种星盘的原理,特著书予以阐释,并制成多种与这两种仪器相关的天文仪器。^[65]

数学方面,亦有著述40余种,涉及初等数学的各个分支: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在其数学著述中,梅文鼎对西方数学,如算术和计算工具、欧几里德几何学、三角学予以介绍和阐发;尝试会通中西,使中西两个不同传统的数学体系融合起来;纠正西方数学著作中的一些失误之处,敢于创新,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新成果。^[66]

(7) 吴历

吴历(1632—1718)自幼跟从名师学习诗、书、琴、画,年轻时就很有名气,为人称颂。入教后,在诗、画方面都融入了天主教或西方特色。他最早提出“天学诗”的概念,并以对天主教教义理解之深、内容之丰富、篇章之多、水平之高,而被推为天学诗诗人第一人。^[67]他“作画每用西洋法,云气绵渺凌虚,迥异平时。”^[68]吴历是中国天主教史上元、明以来,惟一一位兼擅诗、琴、书、画的教徒。^[69]

2. 北方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知名士人

(1) 李天经

李天经在研习西方科学文化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自崇祯七年(1634)接任历局工作,继续徐光启未竟的事业,编完《崇祯历书》。他先后两次进呈历书:崇祯七年七月进呈书目29卷,崇祯七年十二月进呈书目34卷。至此,《崇祯历书》编修完毕,共计137卷。此外,鉴于外患日迫,筹饷日急,为了给朝廷解决财政困难,李天经在督率历局中西人士译完西法历书,造完修历仪器之后,又与汤若望等人翻译了一部矿学书籍《西洋坤輿格致》。只是成书不到4月,明朝就灭亡了。

(2) 王徵

王徵对音韵学和机械工程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为了掌握汉语,来华传教士采取借助西文之拼音,以便记忆的方法学习中文。利玛窦曾刊刻《西字奇蹟》,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天启六年(1626),王徵协助传教士金尼阁编成《西儒耳目资》,由张问达出资刊印。此书“合中西方法,以研究中国文字,”当时文人学士“视为奇书而惊异之。”^[70]全书分为《译引首谱》、《列音韵谱》、《列边正谱》三部分,分别阐述文字学及本书编写原则、按照音韵排列汉字、按照汉字偏旁排列汉字等内容。《西儒耳目资》“是第一部研究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书”,是“我国音韵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71]

王徵笃好科技,热衷于以奇巧的机械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在与传教士交往、读过他们的著作后,遂对西方机械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进行西方科技的研究制造。他根据物理学原理和仿照西法,设计制造了多种新式机械。他将自己的设计汇集成《新制诸器图说》1卷,绘图介绍了他所发明的虹吸、鹤引、轮激、风碓、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连弩。

天启七年(1627),王徵与传教士邓玉涵合作翻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3卷,简称《远西奇器图说》或《奇器图说》。此书既重制造之法,又重原理说明,像杠杆、滑车、螺旋、规矩(即比例)及其用法,都详解明白。书中有图50多幅,其中起重11图,引重14图,转重2图,取水9图,转磨15图,还有其他一些应用技术的图解。每图都有说明,说明其制作方法、工作原理及操作方法。《奇器图说》的刊行,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这部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为日后中国机械工程学的建立作出过积极贡献。同时,书中所创造和使用的诸如重心、杠杆、流体、飞轮、齿轮、螺丝、机器、起重等名词,一直沿用至今。^[72]

《奇器图说》和《诸器图说》于天启七年合刻于扬州。后来,王徵继续研究制造,制成新器24种,收入《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额辣济亚”(Gratia)是拉丁语“天主圣宠”的音译,“牖造”表示天主启示所造。另外,《忠统目录》和《两理略》等书,收录的也是王徵自己的发明创造,其中不乏依据西方物理学原理改进制作的机械。^[73]

中国传统文人，或皓首穷经，或空谈心性，或醉心词章，多视制器之术为奇迹淫巧，不屑为之。而王徵以“学原不问精细，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74]的观念，在译述西人奇器之书之余，又深究其学，自己动手制作，表现了过人的勇气与眼识。王徵是明清时期科技发明最多的科学家。他在机械制作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促进了其他人对制器之术的关注。

(3) 毕拱辰

毕拱辰，字星伯，号麝提居士，教名斐理伯，山东掖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他是天主教徒，与传教士多有交往，曾为高一志的《斐录汇答》作序，并为之删润。“斐录”是哲学（*philosophia*）的译音简写。他和热心于西学的李之藻过往甚密，李之藻的《圆容较义》就是由他第一次刊刻的。崇祯七年（1634），毕拱辰在北京结识汤若望，并向他请教西洋生理学知识，得到邓玉涵所著《泰西人身说概》两卷。之后，毕拱辰将此书加以润色、修订，于崇祯十六年（1643）刊行。他在此书序文中表明了对西方生理医学支持赞同的态度。

(4) 薛凤祚

薛凤祚（1600—1680），字仪甫，号寄斋，山东淄博人。他少承家学，通理学，精《易经》，曾求学于理学大师鹿善继、孙奇逢。后来他致力于各种实用科学的研究，涉猎天文、数学、地理、水利、兵法、医药、乐律等领域，且有相关著述，其中对天文历算着力最多。他初从魏文魁学习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后在南京从传教士穆尼阁学习西洋历算知识，尽得其术，并协同穆尼阁翻译了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著述《天步真原》。书中利用西方天文理论论述了日月食原理，介绍了日月食的计算方法并绘有图解，最重要的是书中首次引入了对数。这以后，他将当时各家历算方法、涉及到各实用科学方面的知识以及他会通中西所撰写的天文著作汇编成《历学会通》，于康熙三年（1664年）刊行。该书规模较大，分为正集12卷，致用16卷，考验28卷，内容包括天文、数学、力学、水利、火器、兵法、乐律、医药及占验等方面，除乐律、医药及占验，其它方面都有对相关西学知识的介绍。

(5) 刘献廷

刘献廷（1648—1695），字继庄，号广阳子，北京大兴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应徐乾学的邀请参修《明史》。他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先进的实学思想，广泛钻研了入传的西方科学文化，涉及的西学领域包括天文、数学、地理、水利、机械、生理及语言文字等。从其所著的《广阳杂记》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对西学的积极研习和深入了解。^[75]

(6) 焦秉贞

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官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楼观，通测算。康熙时期，受西方绘画的影响，出现了揉合中西画法的新画派。这个画派首推焦秉贞。他有多幅反映

意大利风光的绘画，显然是临摹的传教士的作品。他的画“参用西洋画法，剖析分刊，度量阴阳向背，分别明暗，远视之，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圆。”^[76]康熙帝很欣赏他的绘画，命他作《耕织图》46幅，并镌版印制赐予臣下。这些画中的构图、光线、用墨都明显地受到西洋画风的影响。自焦秉贞揉合中西画法以后，宫廷画院多相沿袭。

由前所述，南方的知名士人天主教徒比北方多，南方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学者也远多于北方，这就表明南方士人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要比北方士人积极，在接受西学方面也比北方士人广泛。《表3：明末清初西学译著撰述、校刊之部分知名士人表》也体现了这种差异。表中所列士人是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提及的参与西学（天主教或科学文化）译著的撰述、校刊之士人（姓名、籍贯明确者），虽然他们不全是天主教徒或西方科学文化的研习者，但他们愿意参与西学译著的撰述和校刊，就表明他们对西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接受。表中共列出姓名、籍贯明确者79人，其中南方有61位士人参与了71部西学译著的撰述或校刊，而北方只有18位士人参与了21部西学译著的撰述或校刊。南方士人人数和参与的西学译著数量都是北方的3倍还多，明显反映出南、北方士人在接受西学方面的差异。

二、南、北方士人拒斥西学状况的比较

天主教宣传的是西方国家的宗教思想和神学文化,从根本上与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相抵牾;西方科学文化,在内容、风格、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与中国文化差异很大,特别是在关系到王朝纲维统纪的天文历法方面,西洋历法的采用与否,直接触动封建守旧士人维护道统统治的敏感神经。因此,中国百姓和士人反西学(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的状况是在所难免的。自进入中国之初,传教士就不断遭到各地群众的排斥,甚至遭到群众殴打或捣毁住所,有时也被官方拘禁、驱逐。据耶稣会士曾德昭统计,从1582年罗明坚第一次到肇庆至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之前,曾经有过54起大小教案。^[77]一些士人则纷纷著书立说,呼吁倡议,坚决反对西学传入。他们或从维护儒家思想和佛、道传统出发,攻击天主教“诬妄先师”、“左道惑人”,意图不轨;或从“夷夏之辨”的观念出发,排斥西方科学文化,特别是强烈反对采用西洋历法。

明末清初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士人反西学事件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南京教案、崇祯年间《破邪集》的刊印和清朝康熙年间的钦天监教案,其主力人物分别是沈澹、黄贞和徐昌治、杨光先,他们都是南方人。

(一) 沈澹与南京教案

南京教案是明朝万历年间由浙江乌程人,时任南京礼部侍郎的沈澹在南京发起的一场反西学(天主教和西历)案件。

利玛窦病逝后,龙华民继任中国教区耶稣会会长,全面负责耶稣会在华传教事务。他的传教方针与利玛窦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侧重于在社会下层传教,从利玛窦注重吸收教徒的质量,转向竭力增加教徒的数量;另一方面,他对教务持严厉政策,禁止中国教徒祭祖尊孔。这种传教方针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天主教事业在中国北京、南京、杭州、南昌、南雄和韶州等地有了较大的开展,尤以南京为甚;另一方面,天主教与中国士大夫的矛盾和冲突日益表面化和激烈化,终于导致了南京教案的发生。

南京自郭居静去杭州后,由王丰肃主持教务。他四处活动,宣传教义,发展教徒,不仅有上层的士大夫,还有书童、烧饭、卖糕、种园、挑脚、担水、木匠等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信教,以致原来旧的经堂容纳不下。他倡议教众捐资在洪武冈旧址盖起西式教堂,即所谓无梁殿,还在城外孝陵卫前,别置花园一所。在王丰肃等教士的奔走传播下,南京成为当时中国天主教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煽惑百姓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78]作为明朝陪都的南京,天主教信徒成千上万,且活动如此公

开、频繁，自然会引起明朝官方及士大夫的警觉和忧虑。而且，王丰肃等教士在传教布道过程中，禁止中国教徒祭祖尊孔，这无疑是对儒学至尊的挑战，更令明朝官绅难以容忍。沈澹最先不再容忍，开始排教行动。

沈澹，字铭镇，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曾为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万历四十三年（1615）被派往南京，任南京礼部侍郎。到达南京后不久就注意到传教士和教徒的种种“不轨”行为，于是在上任的次年五月、八月、十二月，向万历皇帝连上三疏，以邪说惑众，阴谋不轨等理由力请禁止天主教，驱逐传教士。同时，逮捕教士，没收教会财产，教案由此产生。

万历四十四年（1616）五月，沈澹上《参远夷疏》，题云：“奏为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恳乞圣明申严律令，以正人心，以维风俗事。”开篇便充满维护封建道统的论调：“职闻帝王之御世也，本儒术以定纪纲，持纪纲以明赏罚，使民日改恶劝善，而不为异物所迁焉。此所谓一道同风，正人心而维国脉之本计也。”他说：“狡夷（指西方传教士）……自称其国曰大西洋，自名其教曰天主教。夫普天之下，葆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炤临之主，是以国号曰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且既称归化，岂可为两大之辞以相抗乎？三代之隆也，临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本朝稽古定制，每诏诰之下，皆曰奉天。而彼夷诡称天主，若将驾轶其上者。……”接着，他认为采用西洋历法将变乱“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是“暗伤王化”。而且，西洋历法与中国历法“立法不同，推步未必相合，况诞妄不经若此，而可据以纷更祖宗钦定、圣贤世守之大统历乎？”他还说传教士用天主教“盗惑小民”，“劝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由前言之，是率天下而无君臣，由后言之，是率天下而无父母。”还有，“闻其广有资材，量人而与，且曰天主之教如此济人，是以贪财之徒有所利而信之。此其胸怀叵测，尤为可恶。”因此，“伏乞敕下礼、兵二部，会同复议，如果臣言不谬，合将为首者，依律究遣，其余立限驱逐。”^[79]

这里，沈澹提出了四条禁止天主教、驱逐传教士的理由：一是妄称大西洋国、天主，触犯明朝国号、皇帝尊严；西洋历法暗伤王化、诞妄不经，不可采用；三是不许中国教徒祭祖，是教人不孝，违背中国名教；四是与人以财，收买民心，胸怀叵测。

沈澹的第一道上疏没有得到明神宗的批准。七月二十一日，沈澹派巡城御使孙光裕提拘王丰肃及中国教徒14人，后来又拘捕谢务禄及数名中国教徒。^[80]在拘捕教士和教徒的同时，沈澹于八月第二次向明神宗上疏。

在《再参远夷疏》，沈澹将传教士的“图谋不轨”说得更加具体：其一，“丰肃神奸，公然潜住正阳门里，洪武冈之西，起盖无梁殿，悬设胡像，诳诱愚民”；其二，“从其教者，每人与银三两，尽写其家人口出生日月，云有咒术，后有呼召，不约而至。此则民间歌谣遍传者也”；其三，“每月自朔望外，又有房虚星昴四日为会期。每会少则五十人，多则二百人”。而天主教势力的发展，隐含祸患，令人担忧：其一，

“臣若更不觉察，胡奴接锤于城闾，虎翼养成而莫问，一朝窃发，患岂及图？”其二，“尤可恨者，城内住房既据洪武冈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前。夫孝陵卫以卫陵寝，则高庙所以游衣冠也。龙盘虎踞之乡，岂狐鼠纵横之地，而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乎？”其三，“更可骇者，臣疏向未发抄，顷七月初才有邸报，而彼夷即于七月初旬具揭。及至二十一日，已有番书定寄揭稿在王丰肃处也。夫置邮传命，中国所以通上下而广宣达也，狡焉丑类，而横弄线索于其间，神速若此，又将何为？”所以，“伏乞陛下念根本重计，早赐批发该部，覆请速咨”，从而使“人心大定，道化归一，而风俗永清，不惟臣部执掌得申，而国家之隐忧亦杜矣。”^[81]

尽管沈澹在疏文中罗列传教士种种不法罪状，并暗示有谋反之嫌疑，但明神宗仍未批准，留中不发，置之不理。而沈澹并不罢休，于是年十二月，再上第三疏，重申“伏戎于莽，为患叵测”，请求皇帝下旨查办教士和教徒。

沈澹上疏之后，南京诸大臣如晏文辉、余懋孳、徐如珂等也纷纷上疏附和，一时间反教之声甚高。在沈澹及其同党的一再指控下，并通过方从哲、魏忠贤的活动，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万历帝发出谕旨，将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和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一同押解出境。谕令下达后，各地反教官员闻风而动。沈澹行动更积极，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三月十六日提出鞫审，亲自审讯王丰肃，并施以严刑，谢务禄因病得免。堂讯之后，判定将王、谢二人置于木笼中解送澳门。洪武冈教堂及教士住院全部拆毁，堂中圣像经书被烧毁，其他什物籍没入官，孝陵卫花园转卖他人。被捕的中国教徒或送法司定罪，或被递解回籍，或予以释放。除庞迪我、熊三拔、王丰肃、谢务禄被指名押解广东外，其他未被指名的教士被迫转入地下，隐藏在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中国教徒家中。

同年，沈澹致仕，回到杭州，南京教案暂告一段落。但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天启即位，魏忠贤以皇帝年幼，总揽大权，方从哲又起用沈澹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此时，山东发生白莲教反明斗争，沈澹利用此事诬告天主教与白莲教是同类邪教，并指使南京部员徐如珂、余懋孳逮捕教士和教徒。直至天启三年（1623），与传教士友好的叶向高任首辅，沈澹罢官，不久死去，南京教案才得以平息。

南京教案具有文化排外的性质，暴露了沈澹等人的无知和自大。他们认为传教士使用“大西洋”和“天主”这样的术语，是贬低了中国人和中国皇帝，传教士盖建无梁殿是僭越和大逆不道，而西方历法诞妄不经，暗伤王化。这显然反映出沈澹等人对天主教教义不甚明了、对西方建筑风格不了解以及其坚持天下之大，中国独尊，中国文化比任何“外夷”文化都要优越的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华夏中心”传统观念。当然，考虑到当时西方殖民者入侵东方，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吕宋等地已被吞并的事实，沈澹出于对西方殖民者侵略野心的警惕和对国家安全的维护，而指控传教士阴谋不轨，是可以理解的。

南京教案的发生，还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士大夫改革派和保守派矛盾斗争的产物。改革派是指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包括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秉承时代气息，坚决主张改革腐朽政治，挽救社会危机，对传教士和西学持友好和吸纳的态度。保守派是指以浙党为首的，包括浙、楚、齐、宣、昆党在内的所有东林的反对派，他们以因循守旧为特征，坚决维护腐朽政治，反对改革，对传教士和西学持拒斥和批判的态度。万历中叶以后，以东林为核心的清流派和以浙党为核心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不断，谁上台谁下台，不但对中国政局本身带来变动，而且也影响到传教士和西学在中国的遭遇。所以，当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是当时政坛上的主角时，利玛窦得以实现居留帝都传教的目的，西学得以在朝野上下广泛传播。而当浙党首领人物方从哲成为内阁首辅，浙、楚、齐、宣、昆党势力占优势的时候，沈~~澹~~就得得以发动南京教案，反对西学，驱逐传教士。^[82]

在保守派中，除齐党是北方士人外，浙、楚、宣、昆党都是南方士人。他们的支持，特别是担任内阁首辅的浙党首领人物方从哲的幕后支持，使得沈~~澹~~能够发动南京教案。而沈~~澹~~本身是浙江人，直接协助他的余懋孳是安徽婺源人，徐如珂是江苏吴县人，也都是南方人，所以，从南京教案中可以看出，南方士人是这次教案的主导力量。

（二）闽浙士人破邪

万历年间沈~~澹~~发动的南京教案是明末士人排拒、反对西学的第一次高潮，而崇祯年间闽浙僧俗士人发起的“破邪”之论为第二次高峰。

南京教案对南京的天主教事业打击很大，却间接推动了福建天主教的发展。当时，耶稣会士罗如望^[83]避难于福建省首位天主教徒漳州严世同（万历二十九年（1601）入京应试时结识利玛窦，受洗入教。）家，严家亲朋好友入教，这成为天主教传教福建之开始。^[84]之后，艾儒略于天启四年（1624）应叶向高的邀请至福建传教，毕方济、阳玛诺等教士也相继来到福建，他们特别是艾儒略积极奔走福建各地，广泛结交士大夫，接触普通民众，从而使得天主教在福建迅速发展起来。“大堂二十二座，小堂不计”，“受洗一万余人”。^[85]

天主教在福建省日益活跃的传播活动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强烈反应，其中以黄贞最为著称。黄贞，字天香，是一介书生，信佛，福建漳州人。艾儒略入漳州传教，“贞一见即知其邪”，于是起而攻之，陆续撰《尊儒亟镜》、《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破邪集自序》、《不忍不言》等文，并由闽入浙，鸠合同志，呼号朝野之士、儒生、佛子，合击邪教。在其鼓动、号召下，一些闽浙士人、佛教僧人纷纷著书立说，认定天主教是邪教，强烈非议、攻击、排斥天主教和传教士。其中，士人反教的文章有福建黄廷师的《驱夷直言》、苏及宇的《邪毒实据》、陈侯光的《辨学刍言》、戴起

凤的《天学剖疑》、谢宫花《历法论》等，浙江王朝式的《罪言》、许大受的《圣朝佐辟》、张广诰的《辟邪摘要略议》等。这些文章内容大多为指责天主教败坏中国纲常名教，从事阴谋活动，威胁明朝统治；而传教士为明廷修历效劳，也有其险恶的政治图谋：“夫尧治世必以治历明时为国家之首务，此辈之擅入我大明即欲改移历法，此其变乱治统、觊图神器，极古今之大妄诞。”^[86]

崇祯十年（1637），黄贞将闽浙僧俗文人反教反西学的主要著述、以及沈耀的三篇《参远夷等汇编为《破邪集》，并请名士蒋德璟、周之夔作序。崇祯十二年（1639），浙江绅士徐昌治将《破邪集》编辑为《圣朝破邪集》，刊行于世。《圣朝破邪集》十万余言，分为八卷，汇集了群臣、诸儒、众僧破邪卫道的著述。其中，一、二卷主要是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的有关记录，包括各种疏文、回咨、会审记录、告示等，也有崇祯七年（1634）福建反教事件中的一些告示；三至六卷主要是闽浙儒家学者，包括朝廷官员和民间儒生，反教反西学文章的汇编（详见表4《〈破邪集〉所载明末反西学士人表》）；七、八卷是佛教界反天主教文章的汇编。《破邪集》的刊行，“掀起了明末士人全面批判、排斥天主教和西洋科学的浪潮”。^[87]

（三）杨光先与钦天监教案

钦天监教案又称康熙历狱，是清初以杨光先（1597—1669）为代表的部分正统士大夫，在康熙初年攻击汤若望等传教士和西洋历法，并掀起一场刑狱的反西学（天主教和西历）案件。

清朝建立以后，原来帮助过明朝修订历法的传教士汤若望等人，以新制历法、天文仪器等西学、西物，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经过实际测验，证实汤若望所编新历准确之后，摄政王多尔衮将之定名为《时宪历》，决定“自顺治二年（1645）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88] 历书封面上有顺治题写的“依西洋新法”字样。而汤若望因精于历法、修历有功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顺治皇帝也很尊敬和信任汤若望，对他优礼有加：允许他可以直接进奏，免三跪九叩之礼；不时召他进殿或亲至他的寓所，喝茶聊天或讨论天象和朝政问题；不断对他加封，先后封为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光禄大夫，其祖上三代也援例加封，并赐予其“通玄教师”的称号（后为避康熙玄烨之讳，改为“通微教师”）；又赐予他空地和银两，助其建立天主教堂，并御笔“钦崇天道”的匾额和“通玄（微）佳境”的堂额。

由于汤若望受到皇帝恩宠，天主教在北京和全国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清初北京教会顺治八年（1651）受洗人数为119，1653年为500，1658年为5000，1663年北京教区信徒已达13000人。据毕嘉（Fr. Giovanni Gabiani）估计，1651—1664年14年间，全国受洗人数约为104980人。”^[89]

而汤若望在掌管钦天监以后，试图确立西洋历法的独尊地位，曾以西洋历法考

核监中官生，借此打压监内仍守旧法的天文官生，又以回回科已无用而罢弃不用，科中秋官正吴明炫也被罢职。

皇帝对汤若望的格外恩宠、天主教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由西洋人掌管钦天监、以西洋历法取代大统历和回回历的情形，使原来的钦天监官员和其他保守派人士甚感不满。顺治十四年（1657），被罢职的吴明炫首先发难，连续两次上疏，控告汤若望剥夺回回科例行承担的天算工作，指责其历法推算有误，并请朝廷保留回回科。但在之后遵顺治之命进行的实际测验中，反而证明回回历法推算有误，吴明炫因此获罪。吴明炫反西学失败后，同郡杨光先以布衣身份继续反西学。

杨光先（1597—1669），字长公，安徽歙县人。其祖杨宁进士，曾任礼部尚书，且有战功，子孙遂世袭徽州府新安卫中所副千户。杨光先早年因秉性好斗而且暴躁，谨遵父命，家居读书，不曾参加科举考试，后让职于其弟，只身入京。崇祯十年（1637），以山野布衣的身份上疏弹劾吏科给事中陈启新和首辅温体仁，获得“敢言”的声名。他有着很强烈的道统思想：“务论大文小文，一必祖尧舜，法周孔，合于圣人之道，始足树帜文坛”，“我大清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接三皇五帝之正统，大清之太祖、太宗、世祖、今上也，接周公孔子之道统，大清之辅相师儒也。”^[90]他这种强烈的道统思想，当然看不惯朝廷重用西人，采用西历，再加上他的“敢言”，就使他成为清初反西学的主力人物。

他“稍通历法，与同郡吴明炫善，明炫自谓知历，每言若望历短，光先闻之大喜，用其言疏攻若望”。^[91]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他上《正国体呈稿》，反对汤若望制定的新历法，并且认为新历封面题写“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不知其欲天王谁乎？”^[92]因当时顺治皇帝恩宠汤若望，杨光先的奏疏没有获准。

杨光先在上疏反对西洋历法的同时，曾将所作《辟邪论》等反西学文章刊行天下，广为散发，制造舆论声势。康熙三年（1664），传教士利类思与信教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写《天学传概》与之辩驳，并请御使许之渐（字青屿）为此书作序。杨光先看到此书更为愤恨，撰写《与许青屿侍御书》，对《天学传概》及李祖白、许之渐进行批判，并于同年七月向礼部递交《请诛邪教状》，并将搜集到的所谓罪证：金牌一面、绣袋一枚、会期一张、妖书（即《天学传概》）一本、邪教《图说》三张，以及他所撰写的《正国体呈稿》等交给礼部，要求剪除天主教，依律正法。

此时康熙年幼，鳌拜等四大臣辅政，鳌拜顽固守旧，不认同前朝多尔袞、顺治帝实行的种种因势适时的开明政策，主张恢复入关以前旧制，也因此对传教士没有好感。当接到礼部转交的杨光先奏疏时，鳌拜等辅政大臣认为正好可以借机驱逐传教士，即于八月命吏部和礼部开堂会审汤若望，传教士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以及李祖白、许之渐、潘进孝（汤若望义子，天主教徒）、许谦（即许保禄，天主教徒）等人被拘

禁。十一月，在吏、礼二部提出处理意见的基础上，朝廷初步决定：杨光先所告邪教等案属实；汤若望、李祖白、许之渐革职，并与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潘尽孝、许谦一起送交刑部处置；将各省西洋人送至京城议奏。

各省督抚接到诏谕后，即拘拿传教士解京审办。后来，外省的 25 名传教士自北京遣发到广东，软禁于广州老城耶稣会堂内，不准出城，不准传教。各省教务只能由中国神父罗文藻负责。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受到限制，杨光先反天主教的目的初步实现。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1665 年 1 月 16 日），京师将见日食，这是验证西洋历法是否荒谬的好机会。之前，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分别用大统历、回回历、西洋历推算出日食发生时刻。当日，辅政大臣、各部大员、钦天监全体以及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等齐集观象台校验，结果证明西洋历准确。杨光先极为尴尬，随后撰《日食天象验》，辩解说：“即使准矣，而大清国卧榻之内，岂惯谋夺人国之西洋人酣睡地耶？……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93]他又向礼部控告传教士在为顺治皇帝幼子荣亲王选择葬期时，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以致祸及董鄂妃和顺治帝，使他们相继去世。这就给汤若望等人扣上了弑君害国的大罪名，从而把历法之争上纲为政治阴谋事件，并把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掣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显光、中官正刘有泰都罗织到本案之中。结果案情大变，康熙四年三月初二，诸辅政大臣决定批处汤若望及杜如预等 7 位监官凌迟，潘进孝等 5 人斩立决。但这时凑巧出现严重地震、星变，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纷纷请求皇上实行大赦。最后，在同情西教士的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干预下，四月三日，历狱最后结案：汤若望等传教士无罪释放；但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显光、刘有泰 5 人与荣亲王一事有直接牵连，只免去凌迟处死，仍判死刑；其他信教或友善传教士的官员，如许纘曾、许之渐、佟国器等以革职论处。

之后，朝廷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右监副，但他连上五疏，以“六不敢受职之畏，二不敢受职之差”^[94]坚辞不受，朝廷不准，反而授他为钦天监监正。杨无奈，只好走马上任，并引吴明烜^[95]为监副。然而，杨光先只是出于卫道的观念而排斥西洋人和西洋历法，实际上他对历法了解甚微，“只知历理，不知历数”，^[96]只好复用《大统历》，并请朝廷访求知晓传统历法的人才。在杨光先和吴明烜主持历局期间，治历工作连续出现严重失误，甚至连闰月也推算错误。

康熙六年（1667）以后，康熙亲政，着手清除鳌拜等辅政大臣，并决心结束杨光先上任以来历法的混乱局面。经过多次实地测验，并查验杨、吴二人所制康熙九年民政历，证明杨、吴所持历法错误百出，还是西洋历法正确。在事实的基础上，康熙八年（1669），康熙主持召开议政王会议，认为杨光先系妄生事端，诬告汤若望谋反。

决定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师”之号，照原样赐恤，给还教堂基地；许缙曾等被革职的官员准予复职；李祖白等被误杀的官员照原职恩恤；宣武门内天主堂发还南怀仁等。杨光先理应论死，康熙念其年老，从宽免死，遣回原籍。同年，杨光先由京师南归故里，行到德州而卒。

发生在康熙年间的钦天监教案是继明朝万历年间南京教案之后，“中国天主教的第二次教难”，^[97]而极力促成这次教案的安徽歙县人杨光先，同浙江乌程人沈 和闽浙士人一样，都是南方士人。而且，他们反西学的立场和角度也是一样的，都是以维护“圣学道统”为旗号，坚持“夷夏之辨”的论调，极力排拒西人、西学进入中国，强烈主张禁止天主教，不用西洋历法，驱逐传教士。他们是南方士人中思想僵化、虚骄自大、盲目排外的守旧派士人代表。而在北方士人中，却未曾有像沈 、闽浙士人和杨光先那样强烈反对西学（天主教和西历）的人物。这是西学传入中国后南北方士人的又一点不同。

（四）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但拒斥天主教的知名士人

沈 、杨光先等士人对西学采取的是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极端态度，另有一部分士人对西学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他们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但排斥天主教。翻阅《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孙尚杨著，东方出版社）和《清初士人与西学》（徐海松著，东方出版社）两书，查得持这种态度的士人有：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江苏常熟人。明万历进士。他在他的藏书楼“绛云楼”内收藏有不少西学科学著作，但他晚年公开抨击“西人之教”为“世间大妖孽”。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研读过《崇祯历书》等西洋历算书籍，并有关著述7种以上，可惜大多已经佚失，现仅存《西历假如》1卷。但在其著作《破邪论》中，他否定天主为上帝，并斥为邪说，主张排除。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对西洋火器、天文历法学等西方科技成果持明确的接纳和利用的态度。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对西洋“佛郎机”火炮的引进与仿造予以关注，认为西洋火炮可以用作守城破关的利器。在《菰中随笔》中，他引述了汤若望《新法历引》中的“三余说”，并与中国传统的“四余说”作了比较，对汤氏之说持明显的赞同态度。他对天主教也持反对态度，希望清朝当局效仿唐武宗下令禁断摩尼教之举，禁止天主教。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一壶道人、夕堂等，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他肯定并有意吸取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承认西方利用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实测多得的数据而编制的天文历法“实有其理”，以精密见长的西洋“远近测法”有可取之术。但他将天主教崇奉的“天主”归于夷狄所信仰的鬼神，主张排斥。

王崇，字勿翦，安徽歙县人。著有《知新录》，辑录了不少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但在卷9“天主教”条中，对杨光先的反教言论表示明确支持。

魏禧（1624—1680），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江西宁都人。出身明末诸生，入清后抱亡国之痛，隐居绝仕。他曾阅读过梅文鼎撰写的《历法通考》等传播西学的书籍，而且直接钻研过由传教士亲自翻译的西学书籍，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思想，提出了士人以律历之学为经世应务的实学思想。但他明确拒绝了天主教信仰。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人。他认真关注过入传的西方科学，倾心于梅文鼎中西会通的历算之学，主张吸收西洋历法。但他把天主教比为佛教邪说，并认为它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祸乱的根源。主张焚毁天主教理书和天主教堂。

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号稼堂，江苏吴江人。他倾心于王锡阐、梅文鼎之学，对西方天文历学、仪器制造等科学技术持明确的吸纳态度。但他认为天主教是邪教，主张“屏邪教”。

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人。出身明末诸生，入清后弃绝仕途，潜心治学，以经学闻名于世。他曾对中西历法进行了比较，接受了西洋新法的实测结论。但他将天主教比之为佛说，斥之为荒谬，而且将天主教会等同于白莲教、无为之类的邪教组织。

张伯行（1652—1725），字孝先，河南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承认西洋历法精妙，赞同清廷利用西洋历法。但他认为西洋教士组织宗教活动存在潜在危险，主张铲除天主教。^[98]

由前所述，南京教案和钦天监教案的发起者沈澹和杨光先都是南方士人，极力“破邪”的除直隶丹徒人吴起龙以外，几乎全是南方的闽浙士人。而在北方士人中，却未曾有像沈澹、闽浙士人和杨光先那样强烈反对西学（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者。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但拒斥天主教的知名士人中，南方有8位，北方只有2位。这表明，南方士人拒斥西学的程度要比北方士人强烈得多。

三、南方士人接受西学广泛的原因

南方士人之所以比北方士人更广泛地接受了西学，是由南方在地理位置、经济贸易、人才数量、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优势造成的。

（一）西学传播路径的自南向北

明末清初，因西方人自海路入叩中国，中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交往区域就集中在东南沿海。所以，不论是对外贸易的开展，还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南方都是首当其冲的。而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若想在较大范围内得到传播，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则必定要往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及其周边省份传播。事实也证明，西学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传播的：首先在南方登陆中国，然后再向北方扩展。

西方人自海路入叩中国，“其实是 14 世纪以来西方人海上扩张的一个辉煌成果”。^[99]自 14 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来，西欧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对黄金的需求量大增。西方人对《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的“香料盈野、黄金遍地”的东方财富更加向往，急于前往东方寻找黄金。而传播基督教则是促使欧洲人向海外扩张的一种精神动力，他们希望找到传说中信奉基督教的那位被称为约翰的东方君主，并与之结盟，从而可以两面夹击穆斯林，扩大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弘扬基督教于海外诸国。进入 15 世纪，西欧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有了重大突破，不仅制造出适应大洋复杂气候条件的多桅帆船，而且开始在船上装备火炮，使欧洲人在向东方的扩张中拥有军事技术的绝对优势。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针和从阿拉伯传入的用于计算纬度的星盘广泛用于海上航行，大大提高了航行效率。与此同时，古希腊的地圆学说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佛罗伦萨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根据地圆学说绘制的世界地图，将中国和印度绘制在大西洋对岸，并断言从欧洲西航，可直达东方。这样，经济需求、精神动力、技术支持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新航路的开辟和海外扩张的进行。^[100]

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于 15 世纪末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而且具备了远航的物质条件。两国专制政府积极支持海洋探险事业，大力资助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海外冒险活动，从而成为最早进行海外扩张的国家，也是最早将侵略触角伸到东方的国家。明正德五年（1510），葡萄牙在果阿建立城堡，作为其东方根据地。次年，占领满刺加（马六甲）之后，不断寻找机会进入中国，并试图在中国建立据点。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终于窃据澳门，为日后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便利。紧随葡萄牙人来到东方的西班牙人，于明隆庆五年（1571）强占菲律宾最大岛屿吕宋的马尼拉，将它逐步建成西班牙在东方殖民统治的政治、军事、经济

和宗教中心。其后，荷兰也开始向东方发展殖民势力。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兵舰入侵澎湖，并窥视中国台湾。葡、西、荷等西方殖民者，乘船渡过大西洋和印度洋，先后到达太平洋沿岸，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建立据点，就为传教士的东来开辟了道路。

16 世纪初，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卡尔文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欧洲陆续产生了脱离罗马教廷统治的基督教新教各宗派，并迅速发展起来。面对新教势力的日益扩大，罗马天主教廷竭力反扑，进行“反宗教改革运动”，一方面进行内部整顿，严格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大力开展海外传教活动，扩大天主教势力范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旨在维护天主教的修会，其中最活跃的就是耶稣会。它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创立，1540 年获得教皇批准。耶稣会采用严格系统的办法，培养了一批具有坚韧毅力、博学多才、忠于天主教和罗马教皇的传教士。

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的进行，就为罗马天主教大规模进行“海外布道”提供了条件，欧洲耶稣会士等天主教传教士纷纷乘坐贸易船只和军舰东来。葡萄牙和西班牙都以天主教为国教，传播天主教也是他们殖民扩张的一部分。在他们的支持下，天主教传教士就随其船只从大西洋入印度洋或太平洋梯航梯航而来。

明朝末年实行闭关政策，海禁严厉，对占据南洋诸国的西方商人只准每年在广州通商两次，且夜间须回到船上，所以传教士根本无法随意进入中国内地。嘉靖三十一年（1552），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沙勿略独自到达中国广东台山县正南海中的上川岛，试图从此进入中国内地，但千方百计都不成功，最终病死在岛上。此后不少天主教传教士仍以各种方式企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但都以失败告终。在此情况下，澳门的地理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澳门是葡萄牙的据点，航海而来的耶稣会士等传教士自然也以澳门为立足点。万历四年（1576），罗马教皇颁布谕旨，成立了澳门教区。澳门教区除经营澳门教务外，还竭力开展对中国内地传教事务。开始，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不顾明朝的禁令，企图从澳门潜入广州，但被明朝抓获、监禁一段时间后遣返出境。传教士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传教方法，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传教方法。在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并仔细考察了中国的具体现实后，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提出在华传教应使传教士中国化，要会读、会写、会说中文，并尽量熟悉中国的礼规和中国的国俗民情。范礼安提出的传教新策略，经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传教实践证实了是行之有效的。利玛窦还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最终确立了一条包括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尊重中国礼规、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等针对中国国情的适应性传教路线。

这样，传教士来华的路径是海路、中国实行闭关政策、传教策略要求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等原因，决定了来华传教士必须首先在澳门停留，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学习后，才能进入中国内地。据不完全统计，自明万历十一年至清嘉庆十年（1583—

1805), 经澳门进入内地的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多达 460 余人, 占该时期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 80% 以上。^[101] 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圣保罗学院)就是来华传教士休整和学习的重要场所。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总共收录了在华传教士 467 人, 其中有近 50% 在圣保禄学院学习过。^[102] 可以说, 澳门是传教士由海外进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 而“澳门圣保禄学院在整个西学东渐过程中扮演了后勤基地的作用。”^[103]

澳门处于中国的南端, 由澳门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 其行走路线自然是由南向北, 活动范围也是由南方向北方扩展的。以利玛窦为例。他于万历十年(1582)来到澳门, 次年随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进入广东肇庆。此前, 罗明坚曾以赠送礼物、巧言辩解等方式取得广东总督陈瑞的允许, 在肇庆停留了一段时间。这次, 他们旧技重施, 再次取得新任总督郭应聘和肇庆知府王泮的好感, 在肇庆留居下来。五年以后, 罗明坚返回欧洲, 利玛窦由南向北辗转活动于韶州、南雄、南京、南昌、苏州等地。利玛窦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了解, 他认为“假使我们不能在南北两京, 到皇宫里, 对着皇上宣讲福音, 设法求得他的许可, 至少许我们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 那么, 将来传教要得不到保障, 也就什么不能成就。”“假使我们求得了这种许可, 便可以在短时期内, 有几百万人归化圣教。”^[104] 正是认识到中国皇帝惟我独尊, 大权独揽, 在中国传教不取得皇帝的支持得不到保障, 利玛窦才想方设法进入北京。万历二十九年(1601), 利玛窦携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抵京, 向明神宗进赠礼物, 并上奏疏, 打动了明神宗, 得以在北京留居和传教, 天主教会也获得了合法地位, 从而达到了在全国传教的目的, 传教士得以从澳门北上, 进入京城, 进而传教于河北、陕西、山西、山东等京城附近各省区。

然而, 应当注意到, 从利玛窦来华到他最终进入北京, 前后经过了 20 年。这 20 年里,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一直在南方各城市活动, 结交了一批士大夫和达官贵人, 向他们宣讲天主教义, 介绍西方科学文化, 并撰述和刊行了几部相关著作, 如《天主实义》、《交友论》、《山海輿地图》等。在此期间, 相继来华的传教士, 如郭居静、龙华民、罗如望、李玛诺等人, 都是在南方的韶州、南昌、南京等城市活动, 直至利玛窦去世, 龙华民才因继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而前往北京。利玛窦等传教士最先在南方各城市开展活动, 就使得南方首先接触到西学, 而他们在南方活动的长期性, 又使得西学在未传到北方之前就已在南方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 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肇庆知府王泮(浙江山阴人)、两广总督刘继文(安徽灵璧人)、韶州知府谢台卿(福建晋江人)、南雄同知王应麟(福建海澄人)、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广东安定人)、江西巡抚陆万垓(浙江平湖人)等地方官员以及瞿太素、徐光启等士人纷纷与传教士交往, 与他们探讨天主教义, 了解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他们对西学的友好态度, 势必会带动南方一大批人士对西学的友好态度。

于是，在北方士人未曾接触到西学之前，南方士人中已出现了一股西学风尚，从而在接触西学的时间上和广度上都领先于北方士人。一步落下，步步难赶。北方士人在接受西学方面与南方士人的差距，一时之间是很难缩短和消除的。

（二）海外贸易带来开放的社会氛围

我国早在汉代通西域的同时，就已经开辟海运航线，发展海上贸易。西汉武帝时，有从广东出海远航印度的航线，称“南海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唐朝以来，全国的经济中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逐渐繁荣，对外贸易日趋活跃。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一隅，为维持与海外诸国的交往和增加朝廷收入，非常重视海路交通，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中国的丝绢、陶瓷等物品通过海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乃至欧洲和非洲。^[105]元朝的时候，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海外贸易继续发展，并且还是集中在东南沿海，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是对外贸易的三大港口。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人民就有进行海外贸易、与海外诸国联系和交往的传统。

明清两朝，虽然统治者出于海防的考虑和自大自满的心理，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度禁止商民出海，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中断。这一方面是朝廷因无法中断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无法忽视海外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而不得不开放南方的部分口岸进行贸易；另一方面是沿海人民为追求商业利润而不顾朝廷禁令私自出海，进行走私贸易。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人的早期扩张与在中国沿海的活动对明后期以后的海外贸易以及沿海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明初实行“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明前期海外贸易方式，集中地表现为通过明朝勘合制度限制的海外国家官方组织的来明朝贡贸易，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市舶司港口接待，其中，“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从这种港口分工上可以看出，明代中国的海外贸易依然集中于南方沿海，特别是广州，而长江以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几乎是一片空白。

葡萄牙殖民势力扩张到印度洋周围和南洋地区后，一些与明朝保持朝贡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被占领或控制，从而在外部破坏了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而明政府鉴于葡萄牙“频岁侵扰”广东沿海加强海禁，将“安南、满刺加诸番尽行阻决”的措施，又从内部加强了对朝贡贸易的限制。然而，在明朝朝贡贸易逐渐衰落的同时，由葡萄牙等国所经营的西方对华贸易规模却在不断扩大，成为明后期海外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葡萄牙、荷兰分别以澳门、台湾为基地，经营世界贸易，获利甚高。1585年至1591年间，葡萄牙人每年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大约价值60—100万克鲁沙多银币，1580—1642年间，葡萄牙人开往马尼拉的商船有64艘。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收入为500万两，其中150万两为贩运中国商品所得。

欧洲人以中国物品以及其他东方物品为货源所进行的世界贸易,为中国东南沿海出海商人提供了规模空前的市场,刺激了中国商民对外贸易的发展。嘉靖以后,私人航海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易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106]“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107]除了在中国沿海与西方人进行贸易外,还有不少中国海商前往日本、吕宋以及马六甲等地贸易,甚至还有不少中国人移居西方殖民者控制的地区。清人徐继畲曾指出:“中国之南洋……迨(明)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东来,据各岛口岸,建立埔头,流通百货。……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则南洋者亦七鯤、珠崖之余壤,而欧罗巴之东道主也。”^[108]私人贸易的繁盛,使明朝无法等闲视之,隆庆元年(1567),朝廷不得不解除海禁,并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中国商民的海上贸易。

清初,根据形势的需要,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政策是有允许有禁止,并不是绝对的禁止。顺治三年(1646),为了购办铸造钱币的铜料,朝廷就发布了准许商民出海贸易的敕令。只是后来因为郑成功海上抗清势力的增长,才使清朝开始实行禁海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63),清朝统一台湾以后。次年,康熙帝即决定开海贸易,先后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康熙晚期,因顾忌通过开海贸易导致大量移民海外的汉人聚集起来对抗清王朝,也是出于对西方殖民者潜在威胁的预防,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廷才又下令禁海。

明清时期与欧洲商人开展海外贸易以来,大大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的出现和增加,这在农业,特别是手工业方面均有体现。由于蔗糖的大量外销,广东的番禺、增城、东莞、阳春等地以及福建的一些地区的农民,专门种植甘蔗。在丝绸制作方面,有的商人“模仿欧洲产品”,“织成一种金丝的料子”;有的商人“巧妙地仿照最受欢迎的西班牙款式”制造衣服。在瓷器生产方面,景德镇的一些窑主可以专门根据外商的要求进行设计和生产。在该地生产的一些瓷器,“贩去与西人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到清代,在广州的河南(即珠江的南岸)地区兴起了专门加工“洋彩”瓷器的加工业,瓷器商人先到景德镇购买大批白瓷,然后“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进行彩绘烘热加工,制成彩器,售于西方商人。

随着海外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沿海港口与内地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其中,几件大宗外销商品,如生丝、丝绸、棉花(外国人称为Nankeen,即南京本色布)主要来自江南地区,瓷器主要来自景德镇,茶叶主要来自安徽、福建、浙江、江西等省。这些大宗出口商品通过集市、市镇、城市等多层次的国内市场网络源源不断地运往沿海港口,特别是贸易集中的广州港,从而将南方内地城市也拉到海外贸易网络中。

从以上论述中,^[109]可以看出,东南沿海自古代延续至明清的海外贸易,为西学在南方的传播制造了一种开放的社会氛围。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北起浙江、南至广东

一带发达的海外贸易使中国沿海不知不觉地向着世界市场迈进。中国在经济上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同时,也使沿海居民加强了对外界的了解,为进一步在文化上与国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明末清初中国的对外贸易,多集中于南方,这是因为北方一来经济发展远逊于南方,二来要对付严重的边患。明朝后期,北有蒙古贵族、东北有女真族,他们限制了明朝与外国的联系。清代前期境况有所好转,中俄两国开始有了一些经济上的交流,《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有些商人来到中国,“俄使率有随员 89 人,自其人之外貌观之,任何人均可得而断定彼等之来仅为通商而已,且其来携有毛皮 60 大车,尤可为证。”^[110] 清前期,山西、河北、山东一带商人也多有从事中俄贸易的,“汉民至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本钜而利亦厚;次则山东回民,多以贩牛为事,出入俄境极稔。”^[111] 但是北方的中俄贸易与南方的海外贸易相比,时间晚、规模小,贸易范围也狭窄,仅限于土特产之间,且交流主要是民间的,影响很小,根本无法与南方的对外贸易相提并论,从对外贸易中所形成的文化交流也不如南方。

而海外贸易,特别是与西方人的海外贸易集中于东南沿海,使得南方人比北方有更多的机会(包括时间、场所)与西方人接触,进而对他们有所认识和了解;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使得南方商人千方百计,甚至不惜涉险走私贸易寻求与西方人通商的机会,进而加深与西方人的交往;而根据西方人的要求和品味进行商品生产,就会在一定范围内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南方内地城市是大宗出口商品的货源地,也必然会因商业往来而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有所认识。这样,南方士人就比北方士人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目的、更广的范围认识和了解西方人和西方文化,从而也就更容易接受西学。

(三) 商品经济催生思想文化的活跃

黄河流域曾是中国经济的重心,但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由于北方战乱频仍,动荡不安,又常常发生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所以大批北方人相继南迁,南方各地的开发逐渐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经过唐朝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北宋的靖康之难,到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一隅,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并稳定下来。明清时期,南方经济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而北方经济则发展缓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南北方经济在某些方面呈现出迥异的发展趋向。

江南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镇经济活跃,宋应星对此有过生动地描述,“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112]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镇经济的繁荣,正德《姑苏志》所载该府市镇竟达 73 个之多,万历《湖州府志》所载该府市镇也有 20 多个。^[113] 随着江南商品经济发展,本地经济不但与全国经济发生密切联系,而且参与了海外贸易,东南沿海各省,海外贸易尤其繁盛。仅以

福建漳州为例，万历四年（1576）海关税已“至万金”；十一年（1583）“累增至二万有余”；二十二年（1594）“骤溢至二万九千有奇”。^[114]江南商品经济的销售范围在不断的拓宽，逐渐由“内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经济”。关于南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情况，前文已有论述，本处不赘述。外向型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得益彰，樊树志先生以为“由于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地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以及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市镇的蓬勃发展。”^[115]

与此相比，北方商品经济虽然也有较程度的发展，在北京、河南、山东等地也出现了一些贸易集散地，如北京，“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116]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土志》中也记载了“河间行货之商，皆贩缙、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缙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贩铁者农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磁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117]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较南方商业发育状态明显不足。分析《河间府志》的记载，经营范围虽广，但没有超出国内的范围，没有发展海外贸易的痕迹，只是本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是一种封闭式贸易。

在农业方面，南中国的农业经营走的是一条专门化、利益化的道路，农产品也进入了商贸领域。如海南岛“诸州县亦皆以槟榔为业。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118]这是农业经营领域的新气象。16世纪后，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展，原产美洲的作物，如玉米、番薯、马铃薯、烟草等农作物传入中国，并在南方诸省得到广泛推广。由于玉米、番薯“这两种作物皆能耐旱，不择沃土、贫瘠的沙地和山场生地皆能适应，并且高产。这就为农民腾出更多的土地和省出更多的肥料与劳动力去发展经济作物提供了条件。”^[119]而西方科技的传入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是西学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的产物。与南方的农业经济相比较，北方农业经营方式与前代相比并没有什么较大变化，虽然经济作物也有种植，但更多的是服务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南方发达的商品、市镇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沉闷的封建社会中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对中国南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崛起，产生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推动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活跃了思想，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开放的风气，促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产生了一批学术大师，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阳明心学、实学思潮、以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启蒙思想。而且，南方经济的高度发展也使更多的人脱离生产领域，得以进行思想研究，从事文化艺术；经济繁荣又导致教育发展，书院林立，学术空气空前活跃，从而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使江南人才辈出。明末大多数有影响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都出现在南方。这必然会极大地提高南方士人的学术水平和文化层次，形成一种开放的大气磅礴

的文化氛围（南方的学术文化将在下文详细论述）。由此，西学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广泛传播，既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具备了深厚的精神文化基础和人才基础。

与此相反，在北方，传统自然经济仍占据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重农”思想基础之上的传统意识形态——儒家伦理观念和“官本位”思想仍禁锢着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他们“皓首穷经”，汲汲于功名，重因循而不事创新。加上距离政治统治中心较近，与政治接触密切，受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束缚尤甚，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北方知识分子谨慎、踏实的作风和学风，思想行为比较传统，对西学的接受程度也就远远不及南方知识分子了。

（四）人才地理分布的偏南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北方世家大族大量南迁，先进的文化也随之传播到南方地区，如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家”的琅琊王氏就迁居到了浙江绍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这就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文化重心也逐渐移到了南方。唐宋以来，江西白鹿洞书院、江宁茅山书院、江西信州鹅湖书院、湖南岳麓书院、衡阳市鼓书院等全国十分有名的书院都在南方。宋代官私学校最多的是浙江、江南和福建，三省州学普及率达100%，县学达80%，私学占全国的72%。明清时期，全国大部分府县设立官学，民间私学书院也大量涌现。在数量上，南方占绝对优势。《大明一统志》记载全国书院308所，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占230所。明清两代南方书院占全国3/4。^[120]南方官学、私学的兴盛，大大提高了南方的教育普及率和教育水平，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才子学人。

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已经居于中国文化之首，出现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江南千水千才子”的说法。又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逐甲于天下。”^[121]的记载，明人章潢也曾说过“鲁邹多儒，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122]

关于明清南方人才之盛，已有学者以统计数据进行了证明。明清进士中“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近15%；而且其科试名次极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不在少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123]明代内阁大学士中，南方有114个，北方有48个；明代的文学家，南方有136个，北方仅有12个；明代的理学家，南方有96人，北方有13人；明代的方伎类中，南方有25人，北方仅有5人。而且，明代的文魁中（状元、榜眼、探花、会元），整个南方地区更是占有全面优势，有215人，而北方仅有29人。清代虽然南方遭遇过战争的破坏，但是这种状况却得以延续，在清代“状元”的籍贯分布中，我们可以看出南方也是占有绝对优势，共有99人，北方仅有12人。^[124]另外，笔者对《畴人传》所载的明末清初从事天文数学研究的籍贯明确的学者进行了统计，发现南方有

50人，而北方学者只有9人（详见表5），而这些学者的地域分布正与表1所列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士人的地域分布相合。通过以上各组数据，很明显就可以看出，南方士人群体，包括高级官员、高级知识人才及有影响的学者中，他们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北方士人群体，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高。而这正是接受西学的南方士人多于北方士人的直接原因。

（五）王学与实学的思想张力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开放，明中后期，中国思想界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作为程朱理学反对面的王学出现，大大冲击了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程朱理学，成为一种规模宏大的社会思潮，“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125] 王学的出现，对整个社会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二是知识分子在批判宋明理学和西学传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的实学思潮。主要内容是反对经学空谈心性，主张实用，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科学、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反对理学束书不观，提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学术新风尚。^[126] 实学的繁盛改变了明清思想界的风气，“经世致用”的指导原则更便利了西学尤其是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明清之际的王学风行和实学高涨，为西学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张力。

然而，这一时期不论是“王学”的个性解放，还是实学的“经世致用”，都是以中国南方为学术阵地展开的，这是明清之际南方商品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结果。与此同时的北方，其学术风气和思想界比南方要沉寂一些，虽然也曾出现过孙奇逢、李颀等王学大师，但是与南方相比仍有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学在中国南北方的传播。

1. 阳明心学与西学传播

明中期以后，王阳明倡导的“心学”发展起来，提倡“致良知”，倡导“心外无物”，“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127] 有学者将其称为良知准则论，并指出这种良知准则论包含着反对崇拜儒家圣贤和贬抑儒家经典的意蕴。^[128] 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强调个人的心性，摒弃任何外界权威的束缚，“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岂不一大快事也哉。”^[129] 心学的出现打破了程朱理学整齐划一的思想说教，是沉闷的思想界的一股新风。自王阳明以后，其后人王畿、王艮以及泰州学派更是将其学说发扬光大，使之逐渐成为明中期以后一股风气颇盛的社会思潮。

心学出现并在社会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给了正统思想以极大冲击，以至于有人说，“学脉之替乱，于斯为极。不惟诮紫阳，几桃孔孟。”^[130] 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

局面逐渐被打破，一些被压抑已久的“异端学说”纷纷粉墨登场，这就为西学作为一种外来学术思想的闯入，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空间。而王学风行导致儒家权威思想动摇，好异求新的文化氛围开始形成，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浓厚兴趣。^[131] 王学包含的反对儒家圣贤和贬抑儒家的意蕴，使人们对儒家的崇奉发生了动摇，为西学传播提供了空间。

利玛窦就是抓住这个时机，以儒者的身份出现，将其天主教的教义与中国儒学思想相结合，尝试以“西学补儒”，获得了中国士大夫的认同。徐光启曾说，“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132] 孙元化也认为，“一还吾三代之隆懿者，非泰西教学不可也”。^[133] 张星曜也赞同以西学补儒学之缺失，认为“天地间，是有真理，儒教之备，而犹有未尽晰者，非得天主教以益之不可”。^[134] 这些材料反映的都是程朱理学受到王学冲击后，西学趁机而入的状况。因此，可以说王学的传播为西学的进入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

王学为西学传播提供了便利，主要原因还在于：“王学注意伦理学的自愿原则，为天主教教义的传播架设了思想桥梁。”^[135] 王阳明学说强调个人的自愿原则，重视人的个性，“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136] 黄宗羲也认为心学主张“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137] 这一时期传入的西学，因或多或少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也认为人在道德和信仰领域应有出于意志自由的自主选择，人是否服从上帝，都是自愿选择的结果，唯此上帝的赏善罚恶才有意义。^[138] 这一点也可以由利玛窦的一段话得到证明，“意者心之发也。金石草木无心则无意……善恶是非之心内之意为定。……故吾发意从理，即为德行君子，天主佑之；吾弱意兽心，即为犯罪小人，天主且弃之矣。”^[139] 正因为西学与王学相同的思想基础，所以明后期心学的兴起为西学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西学的传播。关于这一点，清人纪昀也曾说过“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腐而后生，非尽持论之巧也。”^[140] 充分概括了西学是如何因在思想上与王学有相同之处而借助王学的勃兴，注入中国传统思想界的。如果明末清初的思想界仍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话，那么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必将困难重重。这也可以从清朝中期理学重新确立权威地位后，西学在中国的境遇可以得到反证。清中期，由于统治者提倡，理学复兴，王学式微，西学在中国的影响也迅速下降，甚至传教士也被赶离中国。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在大变革中又一次背离封建传统思想，西学传播才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2. 实学思潮与西学传播

明朝后期，随着“知识界、思想界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末流的猛烈抨击，随着封建制度内部革新派与新兴市民阶层两股社会力量的‘会合’”^[141] 而兴起了一股“经

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这股思潮倡导一种脚踏实地的学风，在抨击理学空疏的同时，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对社会风气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实学的兴起和传播，继“心学”打破程朱理学思想束缚利于引入西学之后，更进一步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

实学思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并因其倡导“经世致用”而更具生命力。实学和西学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有相同的要求“明清之际居于实学行列的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西学看作实学的同道。”^[142]“晚明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研究热潮的兴起，逐渐发展到‘富国强兵’、‘经世致用’为主旨的实学思潮为归宿。即使是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西学派，也是为了寻找国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143]徐光启称颂西方传教士是“实心、实行、实学”，^[144]李之藻说西学是“真修实学”，^[145]方以智也认为西学具有实证精神，“详于质测。”^[146]金声的论述更直接，他说他“敬服西儒，嗜其实学”，直接指明了接受的西学是实学，他还打算“次第译授西学，流布此土，并为人广细宣说”^[147]。这说明西学在某些方面与实学“经世”特征相吻合，并被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是它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开来的重要原因。“西学的传入拓展了当时中国人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丰富了日益高涨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内容，成为明清之际经世实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8]

西学传入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学中的西方科技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也顺应了实学思潮。顾炎武说“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149]这表现出重科技、文化的趋向。一些崇尚西学的士人也是实学的倡导者，如徐光启认为，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制造的器物，很有实际功用，“器虽形下，而切世用”，^[150]王徵也说，“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至急也。”^[151]深刻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的作用。

明末清初中国的思想界，无论是个性张扬的王学，还是追求实效的实学，都打破了学术界沉闷的风气，为西学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而王学和实学的学术阵地是在南方。王学的创始人王守仁、继承发扬其学术思想的泰州学派，以及晚明激进的思想家李贽，他们均为南方士人，而且其活动范围也主要是在南方。明清之际的实学家，如徐光启、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无一例外全是南方人，其他提倡实学的知名学者也大多生于南方，活动于南方。与此相比，北方由于处于政治中心的强有力控制下，思想学术界显得比较沉闷，程朱理学一直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知识阶层的异端思想不易成长、存活。这就导致了西学在中国南北方的传播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水平程度上也有明显的差距。由此可见，国内思想界的活跃程度，对国外学术思想的吸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南方士人拒斥西学强烈的原因

正因为以上所述西学传播路经由南向北、海外贸易造成社会氛围的开放、商品经济刺激思想文化的活跃、人才地理分布偏南、王学和实学的阵地在于南方等原因，明末清初中国南方士人对于西学的接受，不论在人数上，还是在程度上均要远远高于北方士人。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却产生了一个貌似“悖论”的现象，即在很多南方士人积极接受西学的同时，也有不少南方士人以一种坚决的态度反对西学，出现了南京教案、闽浙士人破邪、钦天监教案等强烈反对西学的事件。其实，这种貌似“悖论”的现象，也是与南方特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环境有关的。

（一）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西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特别是作为西方国家宗教思想和神学文化的天主教，在根本上是与儒学思想相抵牾的。虽然明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王学勃兴、实学思潮兴起，思想界的活跃为西学的传播提供了空间，但因程朱理学作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却没有任何改变，天主教与儒学、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就是在所难免的。

首先，西方传教士从欧洲的国情、形势出发，公开宣扬“政教分离”，“国中君主有二，一称治世皇帝，一称教化皇帝。治世者摄一国之政，教化者同万国之权”。这就挑战了中国帝王的权威，对于儒家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也是一种冒犯，因此立即就激起了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的反对。黄问道曾经反驳说：“欲人人奉一天主，塑一天像，明祷其侧而乞怜焉！不其邀天、褻天、僭天、渎天者乎？”^[152]这就充分显示了两种文化在根本上的差异。此外，天主教还禁止教徒祭祖，这种无视孝道的观念，整个冲击了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忠孝观念，当然更进一步招致了士大夫的反对，在南京教案中，沈葆楨就曾经攻击传教士，“诬惑小民，辄曰祖宗不必祭祀，但奉天主……今彼直劝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153]由此可见，平时以圣教维护者自居的封建士大夫，绝对不会容忍如此异端思想存在的。

其次，中西之间在观念上也有重大的差别，传统中国素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华夷”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他们虽然瞧不起西方国家，但是在骨子里又有一种忧虑和担心，害怕“以夷变夏”，担心他们“扫灭中国贤圣教统”，有些士大夫就认为，“又有宗教、分教，必夷人以主之。祭制冠裳，皆用夷服。吾恐目习其所见，耳变其所闻，将羲皇以来之道统、治统，与圣祖高皇帝驱胡定鼎、万世金瓯之天下，礼乐制度、人心风俗，一旦变于夷狄，莫此为甚。”^[154]可见他们对于西方人在骨子里就有一种排

斥心理。这也是一些中国的士大夫反对西学的重要原因。

再次，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重义轻利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中国的士大夫更重视“内圣”，着力于思想修养的提高，反而对于器物层次的提高并不重视。因此，在西方传教士以先进科技为诱导进入中国时，他们很轻蔑的视之为“奇技淫巧”加以排斥。一些士大夫尤其痛恨传教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径，“赂以财物，眩以伪书，迷其心、箝其口，令袖手坐视，任彼奸谋。”^[155] 这些都是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偏见的结果。

此外，中国传统士人，有着强烈的国家观念，他们以儒家思想为寄托，对于皇帝、朝廷有着无限的忠诚，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他们对于可能危及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格外留心。而恰恰西方传教士采用的利益形式，让中国的士大夫感到莫名其妙，很容易与传统社会中的危险因素——民间宗教结合起来，产生“无为、天主等教，悉属左道，妖妄邪言”^[156]的认识，从而认为“叛常乱俗，厥有明刑。故《周礼》不能宽左道之诛，《春秋》所以凛防微之戒。从来邪教聿兴，多方煽惑，致蚩蚩之众，俯首皈依。或弃伦常而弗顾，或倾资产以相从，种种昏迷，为忧方大”。^[157] 其实在事实上天主教的一些文献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有违士人心理的言论，如“弥撒巾是明亡之暗信”，“利玛窦进中国为明失天下之暗信”^[158]等。这也反映了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民间宗教利用，“为了特定的目的，中国教徒在当时是会像利用其他信仰崇拜一样利用基督教的，那些‘吃教’、‘打官司教’、‘娘子教’等称号，便是形象的证明。”^[159] 害怕西教为民间反政府人士利用，对封建统治造成危害，是传统士大夫反西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倡导下，反西学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一股暗流，而此时中国南方人才荟萃、学者云集，西学又在南方传播广泛，很容易在士人阶层中形成截然对立的看法，反西学的人物南方居多也就是正常现象了。

(二)对殖民侵略的警惕

西方人航海东来的目的就是为掠夺财富，进行殖民扩张，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和侵扰活动是同时进行的，给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葡萄牙自正德六年（1511）侵占满刺加以后，又将侵略势力伸向了我国东南沿海。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舰队在若热·阿尔发累斯的率领下，盘踞广东珠江口屯门，进行海盗活动，抢劫行旅，为害民众。正德十二年（1517），啡瑙·安拉德率葡萄牙和马来商船来到屯门，冒充满刺加贡使入京，被戳穿后，退回屯门，在那里“盖房树栅，恃火銃自固。”^[160] 接替他的西蒙·安拉德变本加厉，设立营寨，制造火銃等武器，杀人抢船，并且无视中国主权，在当地行使刑事审讯，掠买良民。他们“所到之处，硝磺刀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其杀掠，莫敢谁何。”^[161]

葡萄牙殖民者在屯门的侵略活动，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惊惧，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元年（1521—1522）派军将他们驱逐出屯门，又在新会之西草湾给予痛击，使其在广东难以立足。但葡萄牙人并不死心，转向福建和浙江沿海活动。他们不时到福建漳州的月港、泉州的浯屿和浙江宁波的双屿等地进行走私贸易，并在双屿等地建立了据点。殖民者总是将海上贸易和海盗活动结合起来，以双屿为基地的葡萄牙人也是如此，他们串通中国海盗，走私贸易，掠买人口，为非作歹，无所不为，致使闽浙祸乱不断。

嘉靖二十七年（1548）、二十八年（1549），闽浙海防军务提督朱纨率军先后在浙江双屿、福建走马溪大败葡萄牙人，沉重打击了葡萄牙在闽浙沿海的嚣张势力。但是，遭到打击的葡萄牙人还是不知悔改，又将活动重心转移到澳门。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以货物被浪涛打湿为由，暂借澳门海滩晾晒，却由此在澳门搭篷栖息，赖着不走。此后，又陆续建造房屋，作久居之计。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通过贿赂手段，占据了澳门，活动日益猖獗。这引起明朝官员士绅的警惕。嘉靖四十三年（1564），庞尚鹏在《抚处濠境澳夷疏》中说葡萄牙人“诡行异服，弥漫山海；剑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奸人则导之陵轹居民，蔑视澳官，渐不可长。若一旦豺狼改虑，不为狗鼠之谋，不图锱铢之利，拥众入居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趋会城，俄顷而至，其裨诚有不忍者，可不逆为虑耶？”^[162]

继葡萄牙来到中国的欧洲殖民者是西班牙和荷兰。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强占了菲律宾最大岛屿吕宋的马尼拉，进而逐步控制了菲律宾，为到达中国搭好了跳板。万历二十六年（1598），菲律宾总督派遣萨摩第到广东，要求通商，被拒后，他们就在广东虎跳门建筑房屋，妄图长期占据。广东海道副使章邦翰派兵焚其聚落，驱逐出境，才挫败了他们企图在虎跳门建立据点的图谋。西班牙还曾入侵台湾。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派兵在台北鸡笼登陆，筑城固守。崇祯二年（1629）侵入淡水，又筑一城。后来西班牙被荷兰打败，鸡笼和淡水均转入荷兰之手。

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兵舰来到中国沿海，试图侵占澎湖，受挫之后，继续寻找入侵机会。天启二年（1622），荷兰殖民者强占了澎湖。占据澎湖期间，他们对当地人民任意烧杀掳掠，作恶多端。曾经亲身参与强占澎湖的格罗宁根号船长威廉·庞德古直言不讳地供认：“我们就于30日（1622年11月）率领七十名火炮手攻打这些村庄。居民都跑到碉堡里去，我们也追到那里去。他们冲出来两次，那种可怕的啼哭声和嚎叫声真像世界末日来临似的。……我们挡住了他们，用刀砍他们的头，用火炮射倒一些人，他们又急急忙忙地逃回去，……我们……把他们全都杀死在那里。”^[163]除了烧杀之外，他们还到处捉掳中国人，替他们运土石，修城墙，或者运往巴达维亚从事奴隶贸易。

在侵占澎湖的同时，荷兰殖民者还不断就近侵犯其它沿海城市。天启二年（1622）

侵犯厦门，次年又侵犯鼓浪屿。天启三年（1623）七月，荷兰殖民者被明朝官兵逐出澎湖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宝岛台湾。在当地修筑城堡，并建起仓库、医院等，又将淡水和鸡笼自西班牙手中夺回，逐步在台湾扩大占领和掠夺。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血腥侵略，对沿海居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沿海人民将西方殖民者看成是作恶多端的强盗，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恐惧与憎恶的感觉。

因此，当与西方殖民者同来的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时，就有许多士人怀疑他们的真正动机。如李贽，他虽然曾在南京、山东临清与利玛窦有过多次交往，但他对利玛窦来华的真实意图很是费解。在致友人的信中流露出了他对利玛窦活动的疑虑，“但不知到此为何，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164] 在利玛窦尽量以儒学装扮自己、尽量向儒学的意识形态接近的时候，李贽这位对传教士和西学有所了解的士人尚且出现此种疑虑，那么那些对传教士和西学不了解的士人，面对者一种全无了解的异端文明时，其疑虑就会更重，而且还会产生误解，如果这种异端文明再有“坚船利炮”为其保驾护航的话，无疑这种“误解”更容易上升为冲突。“南京教案”的发起者沈葆楨就认为西方传教士“诈称行天主教，欺吕宋国主，而夺其地，改号大西洋”。^[165]，虽说不乏无知之见，但是担忧国家安全之心也溢于言表。许大受也认为传教士是“澳门诸夷分遣间谍”^[166]。这种观点在中国南方士人中比较有市场，他们中的不少人出于对西方殖民者在南方沿海进行的侵略、抢劫等罪恶活动的痛恨，将传教士视为打入本国内部特务，“吞我属国吕宋及咬囉巴、三宝颜、窟头朗等处，复据我香山澳、台湾鸡笼、淡水，以破闽粤之户，一旦外犯内应，将何以御？”^[167] 他们对外国势力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南中国是遭受外国殖民势力侵扰最重的地区，同样也是反抗外国殖民势力最坚决的地区，因此南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排斥西方传教士就属情理之中。

而由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势力没有波及到北方地区，因此北方士人对于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并没有什么切身的痛恨，更缺乏那种感性的认知，所以他们对传教士的态度就比较平和，这也是造成南方士人反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程度远远高于北方士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教务昌盛的忧虑

利玛窦制定的传教策略适应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取得了很大成功，天主教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开来。利玛窦的后继者也采用同样的传教手段（龙华民对利玛窦传教策略的背离导致了“南京教案”的发生，传教士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利玛窦传教策略的正确性，之后便不敢再随意更改），在各地开展传教活动，中国天主教徒人数迅速增加。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去世时，

全国教徒为 2500 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增至 5000 人，万历四十五年（1617）扩展为 13000 人，崇祯九年（1636）则扩展为 38000 人。清初，因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先后受到朝廷的恩宠，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较明末更盛。顺治七年（1650）全国有教徒 15 万人；康熙三年（1664）教徒人数为 248180 人，有 30 位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教士住院 42 处，教堂 159 座；康熙四十年（1701）中国天主教徒达到了 30 万。^[168]

然而，天主教徒人数、教堂数量在南方和北方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南方的教务远比北方昌盛。根据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十七世纪之教务状况”一节的统计，而制成的《表 6：1664 年中国天主教传教状况》、《表 7：1699 年在中国之耶稣会之状况》和《表 8：1701 年中国天主教传教状况（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多名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及不入会教士之合计）》，其中的统计数据明显反映出：1664 年南方的教徒人数、教堂数、会口数都比北方多，1669 年耶稣会在南方的公学、住院、圣堂、教士数量也比北方多，1701 年各修会在南方的住院、圣堂、教士数量还是比北方多。虽然目前未能找到对比明末南、北方教务状况的具体资料，但根据清初的统计，以及传教士在南方的活动远比北方广泛的事实，可以推断出明末也是南方的教务昌盛于北方。

天主教教徒人量、教堂数量的迅速增加，使反西学的士人深为忧虑。他们认为，多一个天主教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中国百姓成为天主教徒，听从于传教士的规劝，定期参加聚会，这种状况已经“威胁到乡土中国的原有社会结构”，^[169]甚至会导致叛乱。而南方教徒人数、教堂数量远多于北方，教会活动也比北方公开和频繁，就使南方士人更为忧虑。福建漳州的黄贞就说：“今南北两直隶、浙江、湖广武昌、~~福建~~山东、山西、陕西、广东、河南、福建福州、兴泉等处，皆有天主会堂，独贵州、云南、四川未有耳。呜呼，堂堂中国，鼓惑乎夷邪！处处流毒行，且令万世受殃。”^[170]浙江余姚的施邦曜说：“夫一人能鼓数十人之信从，数十人能鼓百人，即能鼓惑百十人，即能鼓惑千万人。从其教者，人人皆坚信若斯，使之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又何事不可为哉？”^[171]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士人。这些“名公巨卿，或进表章存于圣上，或作文章为之序跋，或遍地吹嘘，或随方拥护，为人维持靡所不周。”^[172]然而，士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道德教化的示范性，他们是维系儒家道德规范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中坚，一旦他们弃儒从耶，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因为南方天主教务比北方更加昌盛，南方士人对可能由此引起“以夷变夏乱华”的危险性有比北方士人更为深刻的忧虑，所以，为了维护原有的社会结构，维护儒家道德规范和社会等级制度，他们比北方士人更加强烈地排斥天主教和传教士。

五、山东士人与浙江士人对待西学态度的比较

（一）态度的差异

山东和浙江分别是北方和南方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山东士人和浙江士人可以分别作为北方士人和南方士人的代表，比较他们对待西学态度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北方士人和南方士人对待西学态度的差异。

在《表1：明末清初信奉天主教的士人一览表》中，山东信奉天主教的士人只有毕拱辰1人，浙江信奉天主教的士人有杨廷筠、李之藻、张星曜、朱宗元、祝石5人；在《表2：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明末清初知名士人一览表》中，山东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士人只有毕拱辰、薛凤祚、张尔歧、焦秉贞、王士禛5人，浙江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士人有李之藻等19人。浙江接受西学的士人人数几乎是山东的5倍。在《表3：明末清初西学译著撰述、校刊之部分知名士人表》中，山东只有毕拱辰、王家植、李焕然、丁允泰4名士人参与了4部西学著作的撰述、校刊，除了《泰西人身说概》是属于医学生理方面的科学著作外，其余3部都是关于天主教的；而浙江有李之藻等13名士人参与了32部西学著作的撰述、校刊，其中有关西方科学文化方面的著作有11部，涉及天文历算、数学、哲学、水利、地理、教育等领域，仅李之藻一人就参与了其中9部有关西方科学文化著作的撰写、校阅和辑刊，涉及西学范围之广、掌握西学程度之深、传播西学之力（见16-17页李之藻简介），山东的任何一名士人都无法企及。虽然山东的薛凤祚对西方天文历算有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是清初的天文历算名家（见第21页薛凤祚简介），但应当注意到薛凤祚的西方天文历算知识是在南京学到的。焦秉贞的西学成就仅限于在绘画中初步地运用了西洋绘画的技巧（见第21-22页焦秉贞简介）。而张尔歧只是对中西历法进行了比较，接受了西洋新法的实测结论，并没有再进一步深入研习，也未能在历算方面有所成就（见第31页张尔歧简介）。王士禛也只是将了解到的西学知识记录下来，也没有深入地学习和运用。以上数据和分析表明，浙江士人对西学的接纳，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山东士人。

在拒斥西学方面，山东除了张尔歧强烈排斥天主教的以外，其他拒斥西学的士人并不突出，而且，张尔歧的反教只是局限于言辞上，^[173]并没有付诸行动，也没有向朝廷上疏，利用国家政治力量进行打击。而浙江的沈淮却以朝廷官员（南京礼部侍郎）的身份向朝廷连上三疏，强烈要求禁止天主教，驱逐传教士，反对采用西洋历法。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南京教案，逮捕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甚至对他们动用了刑罚。南京礼部署司事祠祭主事徐从治、福建巡海道施邦曜、南京按察使副使徐世荫等浙江籍的官员，也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天主教和传教士进行政治打压。王朝式、许大受、

张广濬等浙江士人，则纷纷撰写文章，对天主教和传教士进行口诛笔伐（见《表4：〈破邪集〉所载明末反西学士人一览表》）。这表明浙江士人对西学的拒斥，是从朝廷官员到普通士人，从动用官府势力到制造舆论声势的排斥，范围广，程度激烈。山东士人的拒斥西学与浙江士人的拒斥西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总起来看，山东士人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是冷淡的、平静的，而浙江士人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是热情的、激烈的。出现这种差别，是由两省的文化、政治、经济、人才数量、对外联系、接触西学机率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二）态度差异的原因

文化方面，山东是孔孟的故乡，山东士人皆熟读孔孟诗书，长期受到正统儒学思想的熏陶。虽然阳明心学和实学也曾在山东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但并没有出现思想大家，相比浙江，其影响也不大，儒学正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政治方面，山东距政治统治中心北京比较近，与政治接触密切，受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束缚程度较高，山东士人不得不谨言慎行，诚惶诚恐，唯恐因为逾矩而受到惩处。经济方面，明末清初，山东虽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运河沿岸的临清、聊城等地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与浙江相比，则时间晚，规模小，影响小，传统自然经济仍占据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文化、政治、经济的传统性，就决定了山东士人思想、行为的保守性。

从人才数量来看，山东的人才也不如浙江的多。《明史》所载的山东儒生和文士共只有5人，而浙江则有19人，几乎是山东的4倍；《清史稿》所载的山东儒生和文士有10人，而浙江则有47人，几乎是山东的5倍。^[174]再看状元人数，明代山东共有状元4人，而浙江有20人，正好是山东的5倍；清代山东共有状元6人，而浙江有20人，还是山东的3倍多。^[175]山东人才的数量与浙江人才数量相比，总是存在着3—4倍的差额，接受西学的人才基础显然比浙江薄弱得多。

山东虽然濒海，但其对外联系的国家主要是韩国和日本，与西方人几乎没有任何海上的联系和贸易往来。西学能够传入山东，是个别山东士人从南京、北京等省外城市带回来，以及个别传教士进入山东传播的。如，薛凤祚是在南京学的西方天文历算，焦秉贞是在北京皇宫学的西洋绘画技巧。在山东活动的传教士只有龙华民、利安当、伊大任等3人，利玛窦虽然也到过山东，但只是北上时途经该地，并没有特意在山东开展传播西学的活动。

所以，相对浙江士人而言，接触到西学的山东士人人数并不多，而在这部分为数不多的士人当中，又以对西学持怀疑、观望甚至敌视态度者居多，只有极少数士人，如毕拱辰、薛凤祚，接触到西学尤其是西方科学技术以后，从中领悟出了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对西方科学技术有一定程度的学习、实践和宣传。

相对而言，浙江士人虽然也和山东士人一样尊崇儒家思想，但儒学正统的影响显

然不像孔孟故乡山东那样深厚。而心学的创始人王守仁就是浙江余姚人，他主张“心外无物”，提出“致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具有“荡轶礼法，蔑视伦常”的一面，有着偏离甚至破坏儒家传统思想的因素，是对当时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的反动。王守仁曾任南京兵部尚书，并在平定宁王宸濠叛乱中立有军功，他创立的心学又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对程朱理学批判的要求，文治武功皆有大成，其影响力不但广及全国，在家乡本土的影响更加巨大，自然会有不少浙江士人接受阳明学说。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大家黄宗羲也是浙江余姚人，他对封建君主制度的抨击、对实学思想的赞同、对西方科学文化接纳，也必然会在士人中产生一定的影响。王守仁的学说及黄宗羲的启蒙思想就为西学在浙江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政治方面，浙江士人没有山东士人那种汲取功名、诚惶诚恐的思想包袱，相对灵活和自由。在经济方面，元、明时代，浙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丝织业十分发达，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是全国丝织业中心，出现了不少从事丝绸生产的市镇，以至于浙江有“富甲东南丝绸乡”的赞誉。^[176] 宁波、温州是浙江的两大海外贸易港口，特别是宁波港，历来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明清之际，又与西方商人有了直接的贸易联系，商贾往来频繁，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的灵活和自由、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就催生了浙江士人思想的活跃和开放。

李之藻、杨廷筠都是浙江杭州人，都是高官巨卿、翰苑闻人，在社会上很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对天主教的信奉、维护和宣传，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接纳、研究和传播，对传教士的友待、关心和照顾，就会带动一大批士人对西学和传教士采取接纳态度。而众多传教士，如郭居静、金尼阁、黎宁石、艾儒略、邓玉涵等等，他们那在浙江的广泛活动，更加促进了西学在浙江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所以，综合文化、政治、经济、人才、对外联系、接触西学机率等方面的因素，浙江士人接受西学自然会比山东士人更多、更广、更深。

西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别很大，特别是天主教义，从根本上与儒家思想相冲突。起初，传教士为了打开传教局面，采用“附儒”、“合儒”、“斥佛”等策略，使天主教义与儒家思想“貌合形似”，因此，“文人和官吏各界首先认为传教士们是严肃的伦理学家、佛教的敌对者和孔夫子的虔诚崇拜者。”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当他们更为清楚地了解到了天主教的内容以及当他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传教士们追求的目的时，他们的态度也就变了。”^[177] 正是因为浙江士人接触到传教士和天主教的机会较多，对传教士的目的和天主教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们感到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对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和社会的正常统治秩序产生了威胁，所以，出于维护封建正统和伦理纲常的强烈责任感，他们愤然而起，呼吁朝廷、官府、同侪共同排斥天主教，驱逐传教士。同时，浙江与海外的联系比较密切，浙江士人对西方人吞

并南洋岛国、奴役百姓、掠夺财富的侵略行为，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的骚扰活动，以及进行走私贸易、诱惑百姓出海等不法行为，有着较多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宁波的双屿就曾被葡萄牙人盘踞，在这里发生的抢掠事件有目共睹。这更加距了他们对同是西方人的传教士的猜忌和怀疑，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患于未然，他们强烈排斥传教士，希望将传教士驱逐出境。

相对而言，山东士人与传教士和西学接触的机会不多，范围既不广，程度也不深。对西学有所了解的也就那么几位士人，其中，毕拱辰是教徒；薛凤祚对西学的关注只是限于西方天文历算等科技知识，未曾涉及天主教；王士禛对西学的关注是出于好新奇、广博闻的心理；焦秉贞供职宫中，而康熙对传教士很有好感。这几位士人自然不会排斥传教士和西学。只有经学大师张尔歧，由于从事经学的研究，坚持正统思想，所以才强烈排斥天主教。而且，由于山东境内来的传教士不多，也不曾受到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山东士人与西方人的联系也很少，对西方殖民者侵略行径的了解不不如浙江士人多，认识也不深刻。所以，山东士人对传教士和天主教的排斥也就不如浙江士人激烈。

结 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一种传统说法，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一方人影响一方社会的发展。明末清初南、北方士人对待西学的不同反应，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西方殖民者主要在东南沿海活动）有关，但根本上还是由南、北方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南方政治的灵活、经济的繁荣、人才的兴旺、思想文化的活跃就是南方士人比北方士人更能接受西学的深层次原因。虽然，南方士人反对西学的程度也比北方士人强烈，但像沈 、杨光先那样顽固保守、一概排外的极端偏激、缺乏理性的士人，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南方士人对西学采取的是一种批判吸收、借鉴利用的理性态度，比如徐光启主张“会通以求超胜”，黄宗羲主张利用西方科技、摒弃天主教，他们的态度是明智的、积极的、可取的。而广大南方士人对西学的批判吸收、借鉴利用，就促进了南方经济（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学术文化（方以智的“质测之学”等新思想、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了南方社会的进步。而与南方士人对西学热情、积极的态度相比，北方士人对待西学是冷淡的，消极的，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北方社会的继续沉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学术文化上都没有多大的改变，更谈不上提高和进步了。

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一直存在，南方人、北方人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也一直延续，而由此造成的南、北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也没有改变。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南、北方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南、北方社会发展的差异更加明显。近代以来，广东出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叶剑英；湖南出了曾国藩、左宗棠、黄兴、蔡锷、谭嗣同、蔡和森、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贺龙、彭德怀；江浙地区出了龚自珍、章太炎、鲁迅、蔡元培、周恩来、瞿秋白、蒋介石、胡宗南；安徽出了李鸿章、段祺瑞、冯玉祥、胡适、陈独秀；巴蜀出了邓小平、刘伯承、朱德、陈毅、郭沫若、巴金；荆楚出了黎元洪、李先念、董必武、李四光、闻一多，等等。^[178]南方水土养育出了这么一大批杰出人物，而北方产生的杰出人物却是少之又少，不可与南方同日而语。南方这些优秀人物在近代西学东渐之时，又一次先行觉醒，“开眼看世界”，积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不断寻求富国强兵、驱逐侵略、变革社会的途径，并身体力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活动，不仅推动了近代以来南方社会的变革，而且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影响深远。近代中国总共有五次大的革新运动：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除了义和拳，其它四次都发端于南方或由南方人发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西方的思想文化，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义和团虽然是由北方人发动且兴盛于北方，但它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排外情绪，最终还是被清王朝利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自南方吹起，南方人再一次站在了时代的前言，引领时代潮流。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都在南方，随后建立的海南经济经济特区也在南方。南方人利用发展对外经济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他们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运营理念和企业管理模式，又制定优惠的政策，创造优越的环境，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利用其外资、技术和进步的管理模式推动本地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的联系带动了文化的流动，西方当前的生活方式、流行时尚、法律法规等随之进入中国南方，更加促进了南方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和与时俱进的步伐，也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内容不断涌现。南方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以后，其经验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开放之风吹遍大江南北，中国的经济文化以惊人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人民生活持续得到改善，科学文化不断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长。

不过，在这里强调南方人的杰出、对国外经济文化的学习利用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并不是要否认北方人的优秀、对国外经济文化的学习利用和北方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只是相对而言，南方自宋元以来在人才数量、变革活动、对国外文化的借鉴利用等方面，都明显地领先于北方。即使是在今天，南、北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资的吸收、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利用等方面还是不一样的，南方依然领先于北方。

当然，南方人也有缺点，比如相对于北方人的稳重、俭约，南方人显得激进、奢靡。我们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南方人、北方人要取长补短，互相促进。重农贱商、锢己趋同、持重守成的北方人，应当学习南方人的诸业并重、慕异灵活、开新进取；激进、奢靡的南方人，应当多一些稳重、俭约；在当今对外文化交流中，北方人要更主动一点、更积极一点、更灵活一点。只有南、北方共同进步发展，整个中国社会才能进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表 1: 明末清初信奉天主教的士人一览表

籍贯	姓名	教名	生卒年	主要事迹	其它
南方士人 (34 人):					
上海	徐光启 字子先 号玄扈	保禄	1562 — 1633	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年进士, 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1603 年在南京受洗入教。爱国、护教。致力于中西会通, 编译、撰述了多部科学著作, 希望借以富国强兵。关心、爱护教士, 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做过很多努力。	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
浙江仁和	杨廷筠 字仲坚 号洪园、井寒子、郑圃居士、泌园居士	弥额尔	1557 — 1627	万历二十年 (1592) 进士, 累官至顺天府丞。1611 年在杭州受洗入教。护教、传教极力, 撰有多部护教、传教著作, 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贡献很大。	
浙江仁和	李之藻 字振之、我存、凉庵 号凉庵居士、凉庵逸民、存园寄叟	良	1565 — 1630	万历二十六年 (1598) 进士, 官至工部水司郎中。1610 年在北京入教。所学很广, 天文、地理、水利、军事、音乐、数学、理化、哲学、宗教, 无不研究, 中西会通, 编译、撰述著作多部。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亦有很大贡献。	
上海	陈于阶 字瞻一 号仲台		1595 — 1645	曾官钦天监中官正。师事徐光启, 于西洋器术之学, 研究颇精。崇祯二年佐徐光启修历, 七年往登州推测月食, 十六年在南京佐史可法教练诸营火器。清军攻陷南京, 殉节于城中天主堂。	徐光启之甥。是否受洗, 教史不言, 亦无圣名。
上海松江华亭	许纘曾 字孝彦 号鹤沙	巴西略	1627 —?	顺治六年 (1649) 进士。自幼领洗, 在外任官时善待教士, 捐建教堂, 对教会多所匡助, 有功于天主教在四川、湖广、河南的恢复与发展。提议创办育婴所。	其母亲为徐光启
上海松江华亭	陆希言 字思默	多明我	1631 — 1704	1680 年与吴淦山同随柏应理神父至澳门。1688 年入耶稣会。著有《圣年主保单》、《亿说》、《周年主日口铎》(一名《周年瞻礼口铎》), 亦名《周主日铎音》。	耶稣会修士。
上海松江华亭	王宏翰 字惠源 号浩然子		1648 — 1700	博通儒学, 明达医理。天主教徒, 与教士研讨西学, 故其为医, 兼采西说, 为中国第一接受西说之医家。著有《医学原始》等多部医书。	曾馆于陈薰家, 课其子, 与薰朝夕论道。
江苏宝山	孙元化 字初阳 号火东	依纳爵	1581 — 1633	曾跟徐光启学习火器和算术, 各有相关著述。1621 年在北京受洗入教, 邀请传教士至嘉定开教。崇祯初年任登莱巡抚, 引进西洋火器, 招募葡萄牙炮师, 组建西洋火器营。	入教

江苏嘉定	陆道淮 字相源 号上游			国学生，善画山水，师事王翬、吴历，尝至日本，足迹殆遍。	疑是教友。
江苏嘉定	赵 仑			为吴渔山作《续口铎日抄》。是吴渔山在嘉定成立的圣方济各会会员之一。	入教。
江苏嘉定	金造士 字民普			工山水。与吴渔山交厚。	吴渔山教友。
江苏嘉定	王者佐 字师尹			擅画。	吴渔山教友。
江苏常熟	瞿汝夔 号太素	依 纳 爵	1549 —?	与利玛窦交游，劝其改穿儒服，为其《交友论》作序。1605年从罗如望受洗。	入教
江苏常熟	瞿式毅	玛 窦	1593 —?	1607年受洗。1623年到杭州杨廷筠家，邀请教士往常熟开教。为艾如略《职方外纪》撰《小言》。	瞿汝夔之子。
江苏常熟	瞿式耜 字起田 号稼轩	多 玛 斯 (多 默)	1590— 1650	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曾官吏部给事中。1624年前后在常熟从艾如略受洗。为艾如略《性学粗述》作序。拥立桂王，奔走于西南之间，抗击清军，在桂林殉难。	瞿汝夔从侄。
江苏常熟	吴 历 字渔山 号墨井道人	西 满 · 沙 勿 略	1632— 1718	自幼领洗。曾与僧人往还，四十岁后与天主教友往还。1681年决意随柏应理神父往欧洲，已至澳门，未能成行，遂在澳门入耶稣会。1688年与刘蕴德、万其渊同时由罗文藻主教晋为司铎。之后在上海、嘉定及其附近城市传教，管理教徒，往来奔波，不辞辛苦。曾在嘉定成立圣方济各会，会员6人。	中国天主教史上元、明以来，惟一一位兼擅诗、琴、书、画的教徒。耶稣会神父。
江苏常熟	王 翬 字石谷 号耕烟散人、清晖主人		1632— 1717	稚年时领洗。后因享名之高、应酬之繁、收入之高、禅友之多、教会人才之衰而冷淡了信仰。	与吴历有同里、同庚、同门、同教之谊。
江苏苏州	沈惠于			与吴渔山之往还，论道论画，历时凡三十年。	吴渔山教友。
江苏句吴	陈 薰 字鸥渚			天主教徒，著有辟佛老之书《性学醒迷》。	曾与王宏翰朝夕论道。
江苏山阳	尚祐卿 字天民 又名识己			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清初留寓济南时，结交利安当、汪儒望二教士。撰《补儒文告》、《正学鏖石》、《天儒印正》	
浙江	张星曜 字紫臣	依 纳 爵	1633 —?	1678年受洗。撰《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旨在辟佛。编辑《天教明辨》，撰《天儒同异考》。	入教

浙江 鄞县	朱宗元	葛斯 默	约 1609 —?	顺治五年(1648)举人,博学善文。1631年前后在杭州受洗,对传教有极大热诚,著有《答客问》、《拯世略说》、《天主圣教豁疑论》,为阳玛诺的著述作序。	入教
浙江 兰溪	祝石 字子坚		1602 —?	好韩非子书,好为螯牙屈曲之文。又擅医卖药,漫游各大都市,交友甚广,称浙江奇士。与卫匡国交情深厚,为其所著《逖友篇》作序。又有上罗文藻主教书。因明末空谈风行而撰《希燕说》。	入教,或至少为一信仰甚笃之慕道。
福建 温陵	张庚 字夏詹,又 字明皋 号昭事生	玛窦		任杭州教谕时入教,热心奉教,与杨廷筠协助西士翻经译传。与韩霖合撰《圣教信证》。订正李九标的《口铎日抄》并作序。为孟儒望《天学略议》、艾儒略《五十言余》、《圣梦歌》作序,订正龙华民的《圣若撒法行实》。	入教
福建 福唐	李九标 字其香			入教后静修一年,记述艾儒略、卢安德二教士在福建之讲道为《口铎日抄》。校阅《励修一鉴》。跋艾儒略《圣梦歌》。	二人为兄弟,1628年就试三山时,从艾如略受洗。
福建 福唐	李九功 字其叙			从艾如略受洗。参定其兄的《口铎日抄》。纂评《励修一鉴》。	
福建 绥安	李嗣玄 字又玄			订正《励修一鉴》并作序。与艾儒略相知最深,撰《思及艾先生行迹》。	入教
福建 晋安	陈克宽 字孔熙			校阅李九标的《口铎日抄》。	入教
福建	林一偶 字用籛			校阅李九标的《口铎日抄》并作序。为艾儒略《圣梦歌》作小引。	入教
福建 桃源	潘师孔			校阅艾儒略《圣梦歌》,有诗赠西教士,收入《熙朝崇正集》。	入教
福建 桃源	苏负英			校阅艾儒略《圣梦歌》,有诗赠西教士,收入《熙朝崇正集》。	入教
福建 漳州	严谟 字定猷	保禄		著有《天帝考》,录《书经》、《诗经》及《四书》中有关上帝之文。	
湖广	刘蕴德 字素公	巴西 略	1628 —?	入耶稣会前曾担任钦天监右监副,与教士往还颇密。曾被派往山西开矿,受诬革职,遂于南怀仁手中受洗。1688年与万其渊、吴历同时由罗文藻主教晋为司铎。之后传教于上海、南京等地,所到之处受人尊敬。	耶稣会神父。
安徽 休宁	金声 字正希		1598— 1645	崇祯元年进士。天启年间入京应试时,与传教士接触。之后在南京读书时与毕方济神父相交。清军南下时,积极抗清。	
北方士人(14人):					
山西	焦珪 字国器	路加	? — 1651	拥立桂王,率军隶瞿式耜,抗击清军,殉节死。	受洗事只见于西文教会史,未见于汉文资料。

山西 绛州	韩霖 字雨公 号寓菴	多默		天启元年(1621)举人,善诗文,工书法,藏书甚富。在北京受洗。邀请高一志神父至绛州传教。著有《铎书》,引述教理与教会书籍颇多。又与张庚合撰《圣教信证》,为我国第一部记述天主教士传略与著作之书。校订高一志的撰述。	三兄弟,云为兄,霖次之,霞再次。三兄弟皆为孝廉。
山西 绛州	韩云 字景伯	未达尔			
山西 绛州	韩霞 字九光	伯多禄			
山西 绛州	段袞 字九章	伯多禄		绛州巨绅,既富且贵。捐巨款建教堂。担任高一志所创之社团(赈济贫民、劝人入教)主席,校阅高一志之撰述。	三兄弟,袞为兄,皆入教。
山西 绛州	段袞				
山西 绛州	段戾				
山西 蒲州	韩熿 字象云			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邀请高一志至蒲州开教。	奉教热诚
陕西 泾阳	王徽 字良甫 号葵心、了一道人、支离叟	斐理伯	1571— 1644	天启二年(1622)进士。曾任广平推官、扬州推官、山东按察司僉事。1616年前后在北京入教。诚心信教、热心传教,撰有宣传天主教的著述。协助金尼阁神父撰述《西儒耳目资》,译绘邓玉函神父口授的《远西奇器图说》。	入教
北京	李应试 字省勿	保禄		两次前往朝鲜御倭。1602年受洗。翻刻利玛窦的《山海輿地全图》,题为《两仪玄览图》。	入教
山东 掖县	毕拱辰 字星伯	斐理伯	?— 1644	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删润高一志的《斐录汇答》,润定邓玉涵的《泰西人身说概》。	入教
河北 吴桥	李天经 字仁常、性参、长德		1579— 1659	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曾任开封府儒学教授、济南知府,后又历官豫、陕等省。崇祯五年(1632)由徐光启介绍到历局,完成《崇祯历书》的编撰。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邓玉函》中称他是教友,但没有汉文证据。
河南 永城	丁魁楚	路加	?— 1647	进士。曾官兵部右侍郎。计擒永城叛将。明亡,先后臣仕唐王、桂王。1647年降于李成栋,被杀。	受洗事只见于西文教会史,未见于汉文资料。
辽东	佟国器 字恩远 号汇白	弥额尔	?— 1684	历官苏、浙、闽、赣各省,善待教士,慨捐巨款修建教堂、刊印经书。1674年在南京受洗。	康熙外祖佟图赖之侄。

资料来源:《明史》有关人物传记;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下),中华书局1988年3月。籍贯不确者未列。

表 2: 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明末清初知名士人一览表

籍贯	姓名	生卒年代	主要的西学活动	备注
南方士人 (65 人)				
上海	徐光启	1562—1633	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编《崇祯历书》	进士，入教
上海	陈于阶	1595—1645	钦天监博士，与编《崇祯历书》	徐光启外甥
上海	王宏翰	1648—1700	吸收西方医学、天文、地理等知识	出身儒学世家而以行医为业
江苏宝山	孙元化	1681—1632	与毕方济等游，编《几何体论》等	徐光启门人，入教
江苏青浦	陈子龙	1608—1647	印熊三拔《泰西水法》	进士，徐光启门生
江苏苏州	尤侗	1618—1704	通西方地理学	入选博学鸿儒
江苏吴江	王锡阐	1628—1682	吸收西方天文、历算等知识	
江苏吴江	潘耒	1646—1708	研习西方历算	博学鸿儒，参修《明史》
江苏吴县	惠士奇	清代	通西洋天文学	进士，有《交食举隅》
江苏太仓	陆世仪	1611—1672	涉略西方数学、天文、地理、火器等知识	理学家
江苏昆山	顾炎武	1613—1682	接纳和利用西洋火器、天文历法	
江苏南京	孔贞时	明末	序阳玛诺《天问略》	
江苏常熟	吴历	1632—1718	作画每用西洋法	入教，中国籍耶稣会士
江苏淮安	阎若璩	1636—1704	通西洋历算	著名学者
江苏无锡	杨作枚	清代	通西洋数学	有《解剖圆之根》
江苏泰州	陈厚耀	清代	通西洋天文、数学	进士，翰林院编修
江苏松江	屠文漪	清代	通西洋数学	有《九章录要》
江苏长洲	丁维烈	清代	通西洋数学	梅文鼎弟子
浙江杭州	李之藻	1565—1630	译《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刻《天学初函》	进士，入教
浙江杭州	李次霖	明末	与编《崇祯历书》，序《名理探》	监生，李之藻之子
浙江杭州	杨廷筠	1557—1627	译《职方外纪》	进士，入教
浙江杭州	卓尔康	明末	笔记熊三拔《表度说》	
浙江杭州	胡亶	清初	通西洋天文学	有《中星谱》等
浙江山阴	王洋	明末	刻印《山海輿地图》	进士，曾任肇庆知府
浙江	周子愚	明末	钦天监监副，于熊三拔译《表度说》	向朝廷推荐熊三拔
浙江嘉兴	陈荃谟	明末	通西洋数学	有《测度》三卷
浙江余姚	黄宗羲	1610—1695	通西洋历算、数学	有《西洋历法假如》、《割圆八线解》等多种
浙江余姚	黄百家	清代	通西洋历算、数学	黄宗羲之子
浙江余姚	邵昂霄	清代	通西洋数学	有《万青楼图编》
浙江秀水	张雍敬	清代	通西洋历算	有《定历玉衡》

浙江仁和	袁世龙	清代	通西洋天文、数学	有《测量全义新书》
浙江海宁	谈 迂	清初	主动向传教士求习西学	史学家，有《北游录》
浙江海宁	陈 訏	清代	通西洋数学	有《勾股引蒙》
浙江海宁	陈世仁	清代	通西洋数学	进士，有《少广补遗》
浙江嘉兴	王元启	清代	通西洋数学	进士，有《勾股衍》等
浙江平湖	陆隲其	1630—1692	设略西方天文、历算、地理知识	理学家
浙江	万斯同	1638—1702	主张吸收西洋历法	参修《明史》
福建建宁	游 艺	清初	通西洋天文学	有《天经或问》等
福建安溪	李光地	1642—1718	通西洋天文学	进士，大学士，有《历象本要》
福建安溪	李鼎征	清代	通西洋数学	举人，李光地之弟
福建晋江	陈万策	清代	通西洋天文、数学	进士，梅文鼎弟子
福建南靖	庄亨阳	清代	通西洋数学	进士，有《庄氏算学》
江西南昌	熊明遇	明末	序熊三拔《表度说》，吸收西方天文、历算、生物、地理、自然等知识	有《格致草》
江西进贤	樊良枢	明末	有《钞泽盖通究图说跋》	曾任仁和知县
江西南昌	周希令	明末	与阳玛诺译《天问略》	
江西宁都	魏 禧	清初	涉略西洋天文历学	明末诸生，入清绝仕
江西广昌	揭 暄	清初	通西洋天文学	有《写天新语》
江西婺源	江 永	1681—1762	通西洋天文学、数学	有《数学》八卷
安徽休宁	金 声	1598—1644	从毕方济研习西洋历法	进士，入教
安徽休宁	汪 昂	1615—1700	接受脑主神明说	有《本草各要》等
安徽桐城	方以智	1611—1671	熟悉多种西学	进士，著名学者，有《物理小识》、《东西均》等
安徽桐城	方中通	清初	通西洋数学	有《数度衍》等
安徽桐城	余 熙	清代	通西洋数学	有《八线测表图说》
安徽宣城	梅文鼎	1633—1721	吸收西方数学、天文学等知识	
安徽宣城	梅文鼎	清代	通西洋天文、数学	梅文鼎之弟
安徽宣城	梅毅成	清代	通西洋天文、数学	梅文鼎之孙
安徽宣城	梅 冲	清代	通西洋数学	梅文鼎之孙
安徽宣城	梅 鈞	清代	通西洋数学	梅文鼎之曾孙
安徽睢州	孔兴泰	清代	通西洋历法、数学	有《大测清义》等
安徽歙县	张 潮	1659—1707	探究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	编辑《昭代丛书》，有《虞初新志》
安徽歙县	王 棠	清代	辑录西方科学与西洋奇器	有《知新录》
湖北蕲州	李时珍	1518—1593	接受脑主神明说	著名医学家
湖北江夏	刘湘燧	清代	通西洋天文、历算	梅文鼎弟子

湖南衡阳	王夫之	1619—1692	肯定并有意吸取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	
四川	王应熊	明末	与阳玛诺译《天问略》	
北方士人 (20 人)				
山西河东	曹于汴	明末	序熊三拔《泰西水法》	进士
山西绛州	韩霖	明末	从高一志学铤法	举人, 入教
山西绛州	韩云	明末	校阅金尼阁《西儒耳目资》、高一志《空际格致》	入教
陕西泾阳	王徽	1571—1644	译《西儒耳目资》、《远西奇器图说》	进士, 入教
陕西谷口	张问达	明末	序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自署“谷口病夫”
河南开州	王英明	明末	通西洋历法	举人
河南柘城	杜知耕	清初	通西洋数学	举人, 有《几何约论》
河南柘城	李子金	清初	通西洋数学	有《隐山鄙事》
北京	李应试	明末	从利玛窦等游, 刻《两仪玄览图》	祖籍湖北, 生于北京, 入教
北京	刘献廷	1648—1695	广泛钻研西方学术文化, 包括天文、数学、地理、水利、机械、生理及语言文字等	参修《明史》, 有《广阳杂记》
河北吴桥	李天经	1579—1659	编译《崇祯历书》	进士, 入教
河北大兴	何国宗	清代	通西洋天文学	进士, 礼部尚书, 参与编《数理精蕴》等书
山东掖县	毕拱辰	?—1644	润定邓玉涵的《泰西人身说概》	进士, 入教
山东淄川	薛凤祚	1600—1680	从穆尼阁学西洋数学等	有《天学会通》等
山东济阳	张尔岐	1612—1678	对中西天文历法做过比较	经学大师
山东济宁	焦秉贞	清代	绘画参用西洋法	官钦天监五官正
山东临淄	王士禛	1634—1711	对西洋文化事物很感兴趣, 在《池北偶谈》、《居易录》中多有记叙	进士
辽宁秀岩	胡世安	明末	序汤若望《民历辅助解惑》, 关注西洋天文学	自署“秀岩老史”
辽宁广宁	年希尧	清代	通西洋数学	有《测算刀圭》
满洲	顾琮	清代	通西洋历算	吏部尚书, 参与编修《历象考成后编》

资料来源:《明史》有关人物传记;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第 81—87 页《表 2: 受西学影响的明清学者录要》(表中戴震之前的籍贯明确的学者), 以及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 东方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表 3: 明末清初西学译著撰述、校刊之部分知名士人表

籍贯	确定籍贯依据书目	姓名	生卒年	撰述、校刊西学译著书目	备注
南方士人 61 人, 西学译著 71 部:					
上海	《明史》卷 251 《徐光启传》	徐光启 字子先 号玄扈 谥文定 教名保禄	1562- 1633	与利玛窦合作编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并作序, 与熊三拔合作编译《泰西水法》、《简平仪说》并作序, 与毕方济合作编译《灵言蠡勺》, 主持编译《崇祯历书》, 序《同文算指》(李之藻利玛窦合作编译), 撰《谏诤偶编》、《辟妄》、《辩学章书》, 跋《二十五言》(利玛窦述), 校《推验正道论》(耶稣会士王一元撰)	万历三十二年 (1604) 进士 万历三十一年 (1603) 入教
上海	《译著提要》	徐尔觉		序《圣教四规》(潘国光述), 序《逮友篇》(卫匡国述)	徐光启之孙
上海 松江 华亭	《教史人物 传·许缙曾》	许缙曾 字孝彦 号鹤沙	1627- 约 1696 年后	序《十诫劝谕圣迹》(潘国光述)	其母为徐光启 孙女
上海 松江 华亭	《列传及书 目·陆希言》、 《译著提要·陆 希言传略》	陆希言 字思默	1631- 1704	撰《周主日瞻礼口铎》、《新刻主保单》、《億说》, 校《原染亏益》(郭纳爵译著)	耶稣会士
上海 沪淞	《译著提要》	丘曰旦		删润校《原染亏益》(郭纳爵译著)	
江苏 嘉定	《明史》卷 248 《孙元化传》 《教史人物 传·孙元化》	孙元化 字初阳 号火东	1581- 1633	序《则圣十篇》(高一志撰), 订正《睡答画答》(毕方济著)	徐光启门生 入教
江苏 盱眙	《明史》卷 237 《冯应京传》	冯应京 字可大 号慕冈	1555- 1606	序《交友论》、《二十五言》、《天主实义》(皆为利玛窦撰述)	万历二十年 (1604) 进士
江苏 金坛	《明史》卷 221 《王肯堂传》	王肯堂 字宇泰 号损庵		录《交友论》、《二十五言》(皆为利玛窦撰述), 在其所著《郁冈斋笔麈》, 《二十五言》改名《进言》	万历十七年 (1589) 进士
江苏 无锡	《明史》卷 251 《周炳谟传》	周炳谟 字仲颯		作《重刻畸人十篇引》	万历三十二 (1604) 年进士
江苏 常熟	《教史人物 传·瞿汝夔》	瞿汝夔 号太素	1549- ?	序《交友论》(利玛窦撰)	万历三十三年 (1605) 入教
江苏 常熟	《教史人物 传·瞿式毅》	瞿式毅	1593- ?	序《职方外纪》(艾儒略增译)	瞿汝夔之子, 入教(1607)
江苏	《明史》卷 280	瞿式耜	1590-	序《性学辅述》(艾儒略译著)	瞿汝夔之从侄

常熟	《瞿式耜传》	字起田 号稼轩	1650		万历四十四年 进士
江苏 常熟	《列传及书 目·吴历》	吴 历 字渔山		校阅《崇正必辨》(何世贞著)	耶稣会士
江苏 虞山	《译著提要》	何世贞		著《崇正必辨》并作序	
江苏 长洲	《译著提要》	韩 莢	1637- 1704	序《古今敬天鉴天学本义》(白晋编)	
江苏 长洲	《译著提要》	周 志 字于道		序《天教蒙便》并作《小引》，撰《身心四要》并作序，与何大华合著《天学蒙引》	
江苏 秣陵	《译著提要》	孔贞时		校阅《天问略》(阳玛诺条答)并作序	
江苏 东海	《译著提要》	许胥臣		引《西学凡》(艾儒略答述)	
浙江 仁和	《教史人物 传·李之藻》	李之藻 字 振 之、我 存 号凉庵 居士、 凉庵逸 民、存 园寄叟 教 名 “良”	1565- 1630	与利玛窦合作编译《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并作序，与傅泛际合作编译《名理探》、《寰有诠》并作序，序《天主实义》(利玛窦述)，序《畸人十篇》(利玛窦述)并作跋，序《职方外纪》(艾儒略增译)，序《圣水纪言》(孙学诗述)，引《睡答画答》(毕方济著)，撰《浑盖通宪图说》，参与编译《崇祯历书》，订正《泰西水法》(徐光启、熊三拔合编)，辑刊《天学初函》	万历二十六年 (1598) 进士 万历三十八年 (1610) 入教
浙江 仁和	《译著提要》	李次霖		序《名理探》(李之藻、傅泛济合作编译)	李之藻之子
浙江 仁和	《教史人物 传·杨廷筠》	杨廷筠 字仲坚 号 淇 园、井 寒子、 郑圃居 士、泌 园居士 教名弥 额尔	1557- 1627	著《鸱鸢不并鸣说》、《代疑编》、《代疑续编》、《天释明辩》，序《七克》(庞迪我译述)、《西学凡》(艾儒略答述)、《同文算指》(李之藻、利玛窦合译)，汇记《职方外纪》(艾儒略增译)并作序，跋《畸人十篇》(利玛窦述)，引《策息警语》(熊世旂著)	万历二十年 (1592) 进士 万历三十九年 (1611) 入教
浙江 仁和	《译著提要》	张星曜 字紫臣	1633 —?	序《天儒同异考》，编次《徐光启行略》(柏应理撰)，与洪济合著《辟妄略说条驳》并作序，编辑《天教明辩》(丁允泰创意)并作序	入教
浙江	《译著提要》	洪 济		与张星曜合著《辟妄略说条驳》并作	

仁和				序	
浙江 武林	《译著提要》	卓尔康		与周子愚合作笔记《表度说》(熊三拔口授)	
浙江 武林	《译著提要》	王若翰		撰《合刻辟妄条驳序》	
浙江 西湖 旅安	《译著提要》	张安茂		序《逮友篇》(卫匡国述)	
浙江 慈溪	《译著提要》	张能信 字成义		序《炤迷四镜》(孟儒望著), 订正《答客问》(朱宗元著)	
浙江 慈溪	《译著提要》	周子愚		与卓尔康合作笔记《表度说》(熊三拔口授)并作序	
浙江 鄞县	《译著提要》	朱宗元 字维城		著《拯世略说》并作序, 著《天主圣教豁疑论》、《答客问》, 序《十诫真诠》(阳玛诺述)	
浙江 兰溪	《译著提要》	祝石 字子坚		序《逮友篇》(卫匡国述)	
浙江 桐乡	《译著提要》	刘胤昌		序《畸人十篇》(利玛窦述)	
福建 晋江	《明史》卷 251 《黄景昉传》	黄景昉 字太稷 号湘隐 居士		序《三山论学记》(叶向高与艾儒略论道之书, 艾儒略结集付刻)	天启五年 (1625) 进士
福建 晋江	《明史》卷 251 《蒋德景传》	蒋德景 字申葆		校阅《西方问答》(艾儒略撰)	天启二年 (1622) 进士
福建 晋江	《译著提要》 《教史人物 传·张庚》	张庚 字夏詹、明 皋 号昭事 生		序《天学略义》(孟儒望述)、《圣梦歌》(艾儒略述译)、《励修一鉴》(李九功纂评), 题《五十言余》(艾儒略撰)、《天释明辨》(杨廷筠著), 订正《圣若撒法行实》(龙华民译), 订正《口铎日抄》并作序, 与韩霖合撰《圣教信证》	入教
福建 晋江	《交游人物表》	陈亮采		序《七克》(庞迪我译述)	
福建 晋江	《译著提要》、 《教史人物 传·苏负英》	苏负英		与进贤熊士旂、桃源潘师孔同阅《圣梦歌》(艾儒略述译)	入教
福建 福清	《明史》卷 240 《叶向高传》	叶向高 字进卿	1559- 1627	序《职方外纪》(艾儒略增译)	万历十一年 (1583) 进士
福建 福唐	《译著提要》、 《教史人物 传·李九标》	李九标 字其香		笔记《口铎日抄》(艾儒略、卢安德二教士在福建若干地区之讲道)并作小引, 跋《圣梦歌》(艾儒略述译), 校阅《励修一鉴》(李九功纂评)	入教
福建	《译著提要》、	李九功		纂评《励修一鉴》并作序, 参订《口	李九标之弟

福唐	《教史人物传·李九标》	字其叙		铎日抄》(艾儒略、卢安德二教士在福建若干地区之讲道,李九标笔记)	入教
福建晋安	《译著提要》、《教史人物传·林一僑》	林一僑 字用籛		校阅《口铎日抄》并作题叙,作《圣梦歌小引》	入教
福建绥安	《译著提要》、《教史人物传·李嗣玄》	李嗣玄 字又玄,又字德望		订正《励修一鉴》(李九功纂评)并作序,著《思及艾先生行迹》	
福建晋安	《译著提要》、《教史人物传·陈克宽》	陈克宽 字孔熙		校阅《口铎日抄》(艾儒略、卢安德二教士在福建若干地区之讲道,李九标笔记)	入教
福建清漳	《译著提要》	严赞化 字思参		订正《口铎日抄》, 订正《励修一鉴》(李九功纂评)	
福建仙溪	《译著提要》	陈衷丹 字葵伯		序《励修一鉴》(李九功纂评)	
福建桃源	《译著提要》 《教史人物传·潘师孔》	潘师孔		与进贤熊士旂、晋江苏负英同阅《圣梦歌》(艾儒略述译)	入教
福建樵川	《译著提要》	米嘉穗		序《西方问答》(艾儒略撰)	
福建	《译著提要》	陈仪		序《性学摘述》(艾儒略译著)	
福建	《译著提要》	林起		序《代疑编》(杨廷筠撰)	
福建	《译著提要》	林文英		序《答客问》(朱宗元著),	
福建	《译著提要》	黄鸣乔		撰《天学传概》	
江西进贤	《明史》卷257 《熊明遇传》	熊明遇 字良儒		序《表度说》(熊三拔口授),引《七克》(庞迪我译述)	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
江西进贤	《译著提要》	熊士旂		跋《西学凡》(艾儒略答述),著《策怠警语》并撰跋,与晋江苏负英、桃源潘师孔同阅《圣梦歌》(艾儒略述译)	
江西豫章	《译著提要》	周希令		校阅《天问略》(阳玛诺条答)	
江西南州	《译著提要》	朱时亨 字德先		校刊《性学摘述》(艾儒略译著)并作序	
江西上饶	《明史》卷251 《郑以伟传》	郑以伟 字子器 号方水	? -1630	序《七克》(庞迪我译述),序《泰西水法》(徐光启、熊三拔撰合编)	
江西南丰	《译著提要》	李长祚		序《人罪至重》(卫方济述)	
江西宜丰	《译著提要》	吴宿		序《人罪至重》(卫方济述)	
安徽芜湖	《交游人物表》	崔涓 字震水 号鹤江		序《七克》(庞迪我译述)	

四川新都	《译著提要》	王汝淳		较刊《二十五言》(利玛窦述), 跋《七克》(庞迪我译述)	
四川建武	《译著提要》	张廷赞		序《圣洗规仪》(穆迪我撰)	
四川巴县	《明史》卷 253 《王应熊传》	王应熊 字非熊		校阅《天问略》(阳玛诺条答)	万历四十一年 (1613) 进士
北方士人 18 人, 西学译著 21 部:					
山西安邑	《明史》卷 254 《曹于汴传》	曹于汴 字自梁 号贞予	1554- 1630	序《泰西水法》(熊三拔撰说, 徐光启笔记)	万历二十年 (1592) 进士
山西绛州	《译著提要》 《教史人物 传·韩云》	韩云 字景伯 教名未 达尔		与李焕然、卫斗枢、段袞修润《寰宇始末》(高一志撰), 与韩霖同订《铎书》(韩霖撰), 校刊《天主经解》(罗雅谷著述), 诠定《西儒耳目资》(金尼阁撰述)	入教
山西绛州	《译著提要》 《教史人物 传·韩霖》	韩霖 字雨公 号寓庵 教名多 默		撰《铎书》, 与张庚同撰《圣教信证》并作序, 与段袞校阅《童幼教育》(高一志撰) 并作序, 与卫斗枢、段袞同校《修身西学》(高一志撰)	韩云之弟 入教
山西绛州	《译著提要》、 《教史人物 传·韩霞》	韩霞 字九光 教名伯 多禄		与韩云同订《铎书》(韩霖撰)	韩霖之弟 入教
山西绛州	《译著提要》	韩无敦		与韩无期同阅《铎书》(韩霖撰)	韩霖之子
山西绛州	《译著提要》	韩无期		与韩无敦同阅《铎书》(韩霖撰)	韩霖之子
山西绛州	《译著提要》 《教史人物 传·段袞》	段袞		与李焕然、卫斗枢、韩云修润《寰宇始末》, 与卫斗枢、韩霖同校《修身西学》, 与韩霖校阅《童幼教育》, 校阅《譬学警语》(皆为高一志撰述)	入教
山西绛州	《译著提要》	卫斗枢		与李焕然、段袞、韩云修润《寰宇始末》, 与段袞、韩霖同校《修身西学》(高一志撰述),	
山西绛州	《译著提要》	朱鼎瀚		参定《记法》(利玛窦译注) 并作序	
陕西泾阳	《译著提要》 《教史人物 传·王徵》	王徵 字良甫 号葵心、 了一道 人、支	1571- 1644	序《代疑编》(杨廷筠撰), 引《仁会约》, 较刊《西儒耳目资》(金尼阁撰述) 并撰叙, 笔记《崇一堂日记随笔》(汤若望译述) 并作小引, 译绘《奇器图说》(邓玉函口授) 并作序	天启二年 (1622) 进士 万历年间入教

		高叟 教名斐理伯			
陕西 泾阳	《明史》卷 241 《张问达传》	张问达 字德允 号谷口 病夫	? -1632	序《西儒耳目资》(金尼阁撰述)	
山东 掖县	《明史》卷 263 《毕拱辰传》	毕拱辰 字星伯 号麝提 居士	斐理 伯	润定《泰西人身说概》(邓玉函译述) 并作序	
山东 渤海	《译著提要》	王家植 字木 仲, 号 直斋		引《畸人十篇》(利玛窦撰述)	
山东		李焕然		与卫斗枢、韩云、段袞修润《寰宇始末》(高一志撰述)	
山东 济阳	《译著提要》	丁允泰 字履安		创意《天教明辩》(张星耀编辑)	
河北 涿鹿	《译著提要》	杨 陞		序《僖说》(陆希言撰述)	
河北	《译著提要》	李天经		参编《崇禎历书》, 序《名理探》(李之藻、傅泛济合译), 阅润《天主经解》(罗雅谷著述),	
辽宁 襄平		佟国器 字思远 号汇白	? -1684	序《十诫真权》(阳玛诺述)	

注: (1)表中所列人物及西学译著书目均出自《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徐宗泽编著, 中华书局 1989 年 1 月第 1 版。(2)笔者将时限定为明末清初, 故康熙朝以后参与译著撰述、校刊者未列于表内。(3)表中所列人物为姓名、籍贯可考者, 姓名、籍贯不确者未列。(4)“确定籍贯所依据书目”栏中的《译著提要》指《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徐宗泽编著, 中华书局 1989 年 1 月第 1 版;《列传及书目》指《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法)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教史人物传》指《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方豪著, 中华书局 1988 年 3 月第 1 版;《交游人物表》指《利玛窦交游人物表》, 林金水撰,《中外关系史论丛》(第 1 辑),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第 1 版。除此, 其它参考书还有:《明史》, 张廷玉等撰, 中华书局 1974 年 4 月第 1 版;《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 吴海林、李延沛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第 1 版;《中国历史人物大辞典》, 许焕玉、周兴春、王玉顺主编, 黄河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 2 版;《中国历史地名辞典》,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第 1 版;《中国市县大辞典》, 阎崇年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第 1 版;《清初士人与西学》, 徐海松著, 东方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表 4:《破邪集》所载明末反西学士人一览表

籍贯	姓名	生平简介	破邪文章篇名、撰写时间及其内容
南方士人:			
浙江海盐	徐昌治 字覲周	少为诸生,后为高僧圆悟和通容的弟子,著有《四书旨》、《周易通》、《通鉴烂》等书。	《破邪题词》(1639年):指出《破邪集》汇集了群臣、诸儒、众释子破邪卫道的著作,刊刻该书将使世人明大道,息邪说,有补于一时,有功于万世。
浙江海盐	徐从治	徐昌治之兄,曾任南京礼部署司事祠祭主事,后任济南太守,山东巡抚。	《会审钟鸣仁等犯一案》(1617年):是南京礼部六司会审华人天主教徒钟鸣仁等人的记录。 《拆毁违制楼园一案》(1617年):记录了南京礼部奉旨将王丰肃违制盖造楼房花园入官、拆毁、变卖事宜。
浙江秀水	陈懿典 字孟常 号如冈		《南宮署牍序》:叙述了《南宮署牍》的作者沈 为官勤勉,处处以宗社大计为要。说明沈 驱逐夷人是因为西夷不召而来,煽诱愚民,为祸难测。驱逐西夷则可以防微杜渐,早绝祸端,其意义深远。
浙江乌程	沈 瀛 字铭镇	明神宗时任南京礼部侍郎	《南宮署牍》(1616年):包括《参远夷疏》、《再参远夷疏》、《参远夷三疏》,要求朝廷禁教。 《发遣远夷回奏疏》:叙述了南京礼部遣返远夷的经过。
浙江余姚	施邦曜 字尔韬 号四明	历任福建漳州知府、福建副使左参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左副御使,闻崇祯帝自缢后殉主。	《福建巡海道告示》(1637年):记录了时任福建巡海道的施邦曜在宁德县、福安县拿获西夷及华人的经过,认为:西夷系利玛窦一派,传天主教,以邪说惑人,以夷乱华,而从夷华人则是借夷教以乱圣道,怙恶不悛,真为名教罪人。因此建议:通告百姓,从其教者,十家连坐;速令夷人回国;以学道惩戒从教生员,以乡约海谕从教百姓。
浙江开华	徐世荫 字尔绳	历任南京兵部主事、按察使副使、福建按察使	《提刑按察司告示》(1637年):告示百姓,无为、天主等教是左道邪教,奉旨将在京私习煽惑者董一亮等,凌迟处决。将杨玛诺、艾儒略等驱逐出境。误入邪教者,当改过自新;执迷不悛者,将尽法重治;教堂、禁书要拆毁焚除;若有事发,一体连坐。
浙江山阴	王朝式 字金如		《罪言》:回顾了朝廷当年放逐天主教的事,通过对比,说明天主教去后复来规模更盛于昔,而欺天侮圣,诱惑百姓,欺瞞士人,抗法破禁,危害国家,正如万历明旨所言。故与黄贞等共同反教。
浙江德清	许大受	出身于官宦世家	《圣朝佐辟》:是《破邪集》中最为详尽全面的批评天主教的文章。从王化德治、学脉道统、人伦祭祀、性理学说、技艺、财货、历算等方面,批判了天主教违禁犯律、毁坏道统、败坏人伦风俗、诬惑百姓、图谋不轨的行为,并为执政者提出了辟邪要略。
浙江钱塘	虞淳熙	万历十一年(1583)	《天主实义杀生辨》:站在儒释二教的角度上,针对

	字长孺	进士，历任兵部职方主事、主客员外郎，后隐南山回峰下以终其老。著有《德园集》60卷。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提出的有关杀生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浙江杭州	张广漭	云栖和尚弟子	《辟邪摘要略议》：从治统、道统、人伦、宗教、学术多方面对天主教的危害进行了论述。 《证妄说》：是对《辩学遗牍》（传为利玛窦为辩云栖《天说》而作）中《利先生复莲池和尚竹窗天说四端》和弥格子的跋所涉内容的批驳。 《证妄后说》：是对《证妄说》的补充，阐述了作证妄说的必要性。
福建晋江	蒋德璟 字申葆 号八公	历任侍读、少詹事、礼部右侍郎，著有《敬日草诗》等。	《破邪集序》（1638年）：作者对天主教和传教士德态度较为公允平和，叙述了与西士的交往和对西士的误解，指出中国人所称的上帝不是天主，更不是一位西方人。尽管如此，其教可斥而西士当矜，如果其悔改则可以接纳，也可命其修历，而不必尽行驱逐。认为“邪说之使愚民所惑，咎在吾未能明先王之道，非邪说与愚民之咎。”而黄天香所作的《破邪集》也有益于西士。
福建和平	颜茂猷 字壮其	是黄贞的老师	《明朝破邪集序》（1637年）：批判天主教错谬幻惑，乱世统、乱道统，戕人类、戕人性。《破邪集》将有裨于世道人心。
福建福州	周之夔 字章甫	曾任苏州通判，是复社成员。	《破邪集序》：批评西夷以技能称雄，其教最浅陋无味，应当以禽兽视天主教与从其教者，当政者也不可宽大不较，而应该芟除殄灭天主教。
福州府	李维垣 陈圻 等人	李维垣是福州府左中右三卫千百户掌印，陈圻是福州府闽、侯官二县儒学生员。	《上翰林院左春坊将公德璟攘夷报国公揭》：是福州地方军政长官及士人百姓给奉差路经福州的翰林院编修蒋德璟的公函。陈述西夷上欺圣主，中结朝士，下惑愚民，驱而复回，有以夷变华之祸；其侵吞吕宋等地，有外犯内应之患。因此请求蒋德璟入告朝廷，尽除西夷。
福建漳州	黄贞 字天香 自称 “白衣弟子”	是一介书生，信佛，反天主教。	《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是黄贞写给其老师颜壮其的信，邀请他共辟天主教。 《尊儒亟镜》：批评天主教通过媚儒、窃儒而害儒，从事天之学、生死理欲、受用苦乐、尊贵迷悟、天道太极等方面分析了儒教与天主教的区别，指出狡夷之害无穷，不可坐视不言。 《破邪集自序》（1639）：天主教传入中国后，为祸甚于杨墨，为破除邪教，拯世教民而尊儒反教。 《不忍不言》：号召佛教奋起辟除天主教。
福建温陵	黄廷师 字惟经 号调雨	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曾任湖广金事，在清代任光禄寺卿、	《驱夷真言》（1638）：认为古圣先王是为了王化治夷，华夷并不相及。明朝穷尽天下学问，发明已无余蕴，未闻天主之说。西夷在中国居心叵测，应当

		广西副使	谨防猾夏之渐。文中对天主教的许多描述有失实之处。
福建霞漳	苏及字号恬夫		《邪毒实据》(1638): 揭露西夷邪毒异惨, 号召士庶鸣鼓而合攻之。文中有诸多不实之词。
福建松溪	魏 潜字禹卿	明万历甲辰(1604)进士, 历任户部主事、户部郎中、右副都御使、湖广按察使, 有《峡云阁存草》12卷。	《利说荒唐惑世》: 运用中国传统的天文地理学说, 通过实地验证, 批评了利玛窦所著的《舆地全图》, 认为中国在世界之中, 阳城为天地之中, 并认为利玛窦的九天之说也是杜撰可笑, 所制的自鸣钟也不如中国的壶漏。
福建三山	陈侯光		《辨学刍言》: 从祀天、天主、耶稣与上帝; 忠孝; 人性; 创作论; 性理之学五个方面列数西夷之罪状, 说明天学与儒学决然不同。
福建三山	黄紫宸		《辟邪解》: 揭示了儒教性善论与天主教原罪论的矛盾。
福建三山	黄问道		《辟邪解》: 认为西士窃儒而叛道, 应当辟而逐之。
福建清漳	王 忠字信生		《十二深概》: 记叙的是作者因中国人对天主教之毒害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而发的感慨。
福建福唐	戴起凤		《天学剖疑》: 天主教为善去恶之训可从, 但关于天主造物、降生、救赎、受难之说, 其理不通, 不可信。
福建芝城	谢宫花字个臣		《历法论——辟西历弃润邪说》: 考察中国自汉及元制定历法的历史, 说明明朝大统历参考诸历之长, 不需要西夷的历法。还批判了天主教的天主受死救世说。
江西新昌	邹维琏字德辉号瀛元别号匪石	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 历任延平推官、郎中、右金都御使、福建巡抚。著有《达观楼集》、《理署》、《友白》、《宦游诸草》等。	《辟邪管见录》: 批评《天主实义》词意险怪, 首尾矛盾、浅陋不文, 指责利玛窦妄自尊大, 有变易天下之心; 且侮圣欺天, 是当今之苏秦、张仪、王莽。
北方士人:			
直隶丹徒	吴起龙字云卿	历任户部主事、应天府推官、南京户部员外郎、福州知府、福州兵备副使。	《福州府告示》: 该文引经据典, 说明邪教的危害性, 虽然驱逐了杨玛诺、艾儒略等人, 仍恐邪党未消, 去向复入。因此, 告示百姓须严加防察, 如有容隐不举, 一体连坐。

资料来源:《破邪集》卷一至卷六, 见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5卷),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年。表中所列为著者、籍贯明确者。

表 5:《畴人传》所载明末清初科学家区域分布表

省份	州县	人名	州县	人名	州县	人名	合计
上海		徐光启	松江	屠文漪			2
江苏	吴江	王锡阐、潘圣樟、潘耒	淮安	阎若璩	无锡	杨作枚	9
	泰州	陈厚耀	吴县	惠士奇	长洲	丁维烈	
	不明州县	顾长发					
浙江	仁和	李之藻、胡璠、袁士龙、	钱塘	许胥臣、沈超远、张永祚	嘉兴	陈夔谟、徐发、王元启	16
	余姚	黄宗羲、黄百家、邵昂霄	秀水	张雍敬	海宁	陈訏、陈世仁	
	不明州县	周子愚					
福建	海澄	王应遴	建宁	游艺	安溪	李光地、李钟伦、李鼎徵、李光坡	8
	晋江	陈万策	南靖	庄亨阳			
江西	广昌	揭暄	婺源	江永			2
安徽	歙县	杨光先	桐城	方中通、余熙	宣城	梅文鼎、梅以燕、梅成、梅玠、梅钫、梅文鼎、梅文鼎	11
	睢州	孔兴泰					
湖南	巴陵	许伯政					1
湖北	江夏	刘湘燧					1
南方各省总计:							50
河北	赵州	李天经	大兴	何国宗			
河南	开州	王英明	柘城	杜知耕、李子金	中州	谢廷逸	
山东	淄川	薛凤祚					
辽宁	广宁	年希尧					
满洲		顾琮					
北方各省总计:							9

注:本表统计对象,从《畴人传》卷 32 开始到卷 42“江永”,即从明万历到清康熙的籍贯明确的科学家。

表 6: 1664 年中国天主教传教状况

省份(府、州)	教徒人数	教堂数	会口数
直隶 北京	1500	3	
正定府		7	
保定府		2	
河间府	2000	1	
山东 济南府	3000	10(全省)	
山西 绛州	3300		
蒲州	300		
陕西 西安府	20000	10	
汉中府	40000	6	15
河南 开封府		1	
北方各省合计	70100	40	15
四川 成都 保宁 重庆	300		
湖广 武昌	2200		8
江西 南昌	1000	3	
建昌	500	1	
吉安	200		
赣州	2200	1	
汀州	800		
福建 福州	2000	5	8
延平	3600		
建宁	200		
邵武	400		
彝山 崇安县等处		多所	
浙江 杭州	1000	2	
江南 南京	600	1	
扬州	1000	1	
镇江	200		
淮安	800	1	
上海	42000(又说 50000)	城内 2, 乡下 66	
松江	2000		
常熟	10900	2	
苏州	500		
嘉定	400		
太仓、崑山、崇明		均有教堂	
南方各省合计	72800	多于 85	16

资料来源: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第 238—240 页, 上海书店 1990 年 10 月。

表 7: 1699 年在中国耶稣会之状况

省份	公学	住院	圣堂	小堂	教士
直隶	1 (北京)	2 (北京东堂 1、正定府 1)	10	4	9
山东		1 (济南府)	9	7	1
山西		6	16	甚多	2
陕西		1 (西安)	2		1
河南			2		
北方各省合计	1	10	39	多于 11	13
江南	1 (南京)	6	89		14
浙江	1 (杭州)		3		4
湖广		2	10		4
福建		2	7		3
江西	1 (赣州)	1	9	2	2
南方各省合计	3	11	118	2	27

资料来源：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况》，第 242 页，上海书店 1990 年 10 月。

表 8: 1701 年中国天主教传教状况 (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及不入会教士之合计)

省份	住院	圣堂	教士
直隶	6	21	11
山东	10	18	11
山西	3	10	2
陕西	4	4	1
河南	2	2	1
北方各省合计	25	55	26
江南	19	133	19
湖广	9	8	3
江西	14	12	11
浙江	11	7	6
福建	18	15	17
广东	11	11	21
广西	13	14	10
南方各省合计	95	200	87

资料来源：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况》，第 243—244 页，上海书店 1990 年 10 月。

注 释

-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 月。
-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8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 [3]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第 229 页，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赵洪恩、李宝席主编：《传统文化通论》，第 422—423 页，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 [4] 《明史》卷 326《意大利传》，中华书局 1974 年 4 月。
- [5]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 189—191 页，上海书店 1990 年 10 月。
- [6] [意]利玛窦、[法]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468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 10 月。
- [7] 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转引自梁家勉编著《徐光启年谱》，第 6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4 月。
- [8] [意]柯毅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晚明基督论》，第 334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7 月。
- [9] [意]利玛窦、[法]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489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 10 月。
- [10]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 306 页，上海书店 1990 年 10 月。
- [11] 徐光启：《家书》，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第 489、49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1 月。
- [12] 徐光启：《辩学章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第 431—43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1 月。
- [13] 徐光启：《治历已有成模恳祈恩叙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第 427—42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1 月。
- [14] [意]利玛窦、[法]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484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 10 月。
- [15] 梁家勉：《徐光启年谱》，第 7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4 月。
- [16] [意]利玛窦、[法]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516—517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 10 月。
- [17]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 64 页，东方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 [18]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 65 页，东方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 [19] 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 314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 1 月。

- [20]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 395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 7 月。
- [21] [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 293—29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
- [22] [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 29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
- [23] [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 29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
- [24] 丁志麟：《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见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一），台北方济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
- [25] 杨廷筠：《代疑续篇》，转引自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第 205 页，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26] [比利时]钟鸣旦著，香港圣神研究中心译：《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第 74 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27] 林坚：《明末天主教儒者杨廷筠》，载《中国天主教》，1990 年第 1 期。
- [28] 林坚：《明末天主教儒者杨廷筠》，载《中国天主教》，1990 年第 1 期。
- [29] [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 27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
- [30] 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第 204 页，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31] [意]柯毅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晚明基督论》，第 334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7 月。
- [32]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6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
- [33] 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第 146—147 页，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34]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 236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 3 月。
- [35]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 277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 3 月。
- [36]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 203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 3 月。
- [37]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 190 页，上海书店 1990 年 10 月。
- [38]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第 160 页，中华书局 1995 年 11 月。
- [39]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 16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 3 月。
- [40]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 190 页，上海书店 1990 年 10 月。
- [41] 陈柏绿：《爱国爱教的科学家王征》，载《中国天主教》1990 年第 3 期。
- [42] 《明史》卷 251《徐光启传》，中华书局 1974 年 4 月。

- [4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
- [44] 《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子部16·天文算法类1”《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6月
- [45] 徐光启：《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第3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
- [46] 徐光启：《历书总目表》，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第3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
- [47] 陈久金：《徐光启和〈崇祯历书〉》，见席泽宗、吴德铎主编《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90—91页，学林出版社1986年3月。
- [48]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第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
- [49] 梁家勉：《徐光启年谱》，第99—1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
- [50] 《明史》卷251《徐光启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
- [51] 徐光启：《谨申一得以保完全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第175—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
- [52]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第9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月。
- [53] 徐光启：《钦奉命旨敷陈愚见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第3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
- [54]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113页，中华书局1988年3月。
- [55]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79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12月。
- [56]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第7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月。
- [57] 王力军：《简述李之藻的治学观及其西学图籍》，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 [58] [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2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 [59]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第95—9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月。
- [60] 罗炽：《方以智对西学的批判吸收》，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 [61] 阮元：《畴人传》卷35《王锡阐下·论曰》，商务印书馆1957年10月。
- [62] 阮元：《畴人传》卷34《王锡阐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10月。
- [63]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

- [64] 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第 339 页，东方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 [65]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第 191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 1 月。
- [66]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第 198—199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 1 月。
- [67] 李波、薛小荣、刘永伟撰：《吴渔山笔下的澳门》，载《文史杂志》1999 年第 6 期。
- [68] 《清史稿》卷 504《吴历》，中华书局 1977 年 8 月。
- [69]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 203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 3 月。
- [70]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 322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 1 月。
- [71]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 227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 3 月。
- [72] 张柏春：《王徵与邓玉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 年第 1 期。
- [73]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第 112—113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 1 月。
- [74] 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 298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 1 月。
- [75] 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第 180—185 页，东方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 [76] 《清史稿》卷 504《焦秉贞》，中华书局 1977 年 8 月。
- [77] [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 21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2 月。
- [78] 《明神宗实录》卷 547，民国 29 年（1940）影印本。
- [79] 沈澹：《参远夷疏》，《破邪集》卷 1《南宫署牍》，日本文学博士、九州大学名誉教授荒木见悟、冈田武彦主编《辟邪集 圣朝破邪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台湾总代理，大化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4 年 10 月。
- [80] 关于沈澹拘捕教士和教徒的时间、次数、人数以及与第二次上疏的时间先后关系，各家记载有出入：沈澹自己在《再参远夷疏》中提到：“除王丰肃系化外人，臣谨遵律令明文候旨处分外，其余同居徒众，妄称天主教，扇惑人民，见在本所搜获者一十三名，一面行提鞫审，此外更不株连一人。”在本疏下文及在《参远夷三疏》中未曾再提及拘捕之事（见《破邪集·南宫署牍》）。南京礼部万历四十五年二月《付该司查验夷犯》中亦提到：“二十一日，该巡视东城御使孙，行兵马司提拘王丰肃等一十四名。”（见《破邪集》卷 1）南京礼部万历四十四年八月《拿获邪党后告示》中提到：“西营地方，搜获十三名，幼童五名。孝陵卫地方搜获一名，如此而已。”（见《破邪集》

卷2)曾德昭(原名谢务禄)在《大中国志·第二部第八章》中记载他与王丰肃的被捕时间是八月三十日。徐宗泽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南京教案》中记为:“沈澹上参远夷疏,第一疏不准,故上第二疏,然第二疏亦不准,于是串通同乡官方从哲等,内接太监魏忠贤以图构陷。方从哲与沈同里相善,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颇有权势,于一六一六年八月二十日致书沈澹曰:所称西洋人在内地传教,不妨先拿获监禁,再请旨治罪。沈澹得书后,于八月三十一日发兵包围南京教堂,王丰肃神父遂被逮捕,教友张窠姚若望愿同神父致命,随之而去。九月一日谢务禄、钟鸣礼同十三教友亦被监禁。(萧若瑟天主教传入中国考)继又押禁教友多名,共二十四人,教士二人。(见《破邪集》卷2。)”李喜所主编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记为:“七月二十一日……逮捕耶稣会士王丰肃、谢务禄和中国教徒钟鸣仁、……等16人。八月十四日,又逮捕钟鸣礼、……等8人”(见本书54、55页)。林仁川、徐晓望著《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中记为:“沈澹眼看(第二次)上奏无效,在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方从哲的支持下,采取先拿获监禁,再请旨治罪的先斩后奏的办法,派兵包围南京天主教堂,当场逮捕王丰肃、谢务禄及其他教徒24人”(见本书134页)。晏可佳著《中国天主教简史》和[韩]李宽淑著《中国基督教史略》同认为是七月二十一日命巡城御使孙光裕逮捕传教士王丰肃、谢务禄及中国信徒十四人并幼童五人,八月十四日又逮捕中国信徒钟鸣礼、张窠等8人(分别见本书的62页、57页)。

- [81] 沈澹:《再参远夷疏》,《破邪集》卷1《南宫署牍》,日本文学博士、九州大学名誉教授荒木见悟、冈田武彦主编《辟邪集 圣朝破邪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台湾总代理,大化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0月。
- [82] 万明:《晚明南京教案新探》,见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 [83]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57页作“罗士望”,但查《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并无罗士望,而在“罗如望”传记中提到,“一六一六年南京仇教时,……(罗)如望从江西南昌至福建漳州开教”,时间、地点皆吻合,故笔者认为应是罗如望。
- [84] 这是《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说法,见本书第57页,而徐宗泽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认为“福建的开教,乃艾儒略的功绩”,见本书第317页。
- [85]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4,转引自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5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月。
- [86] 林启陆:《诛夷论略》,《破邪集》卷6,日本文学博士、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 荒木见悟、冈田武彦主编《辟邪集 圣朝破邪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台湾总代理，大化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4 年 10 月。
- [87] 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第 14 页，东方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 [88] 《清史稿》卷 272《汤若望传》，中华书局 1977 年 8 月。
- [89] [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 75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 [90] 杨光先：《与许青屿侍御书》，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附二种）》，第 7—9 页，黄山书社 2000 年 11 月。
- [91] 彭孙贻：《客舍偶谈》，转引自任延黎主编《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第 187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 [92] 杨光先：《正国体呈稿》，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附二种）》，第 36 页，黄山书社 2000 年 11 月。
- [93] 杨光先：《日食天象验》，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附二种）》，第 75、79 页，黄山书社 2000 年 11 月。
- [94] 杨光先：《四叩阍辞疏》，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附二种）》，第 84 页，黄山书社 2000 年 11 月。
- [95] 《清史稿》卷 272《杨光先传》言“明烜，明炫兄弟行”，而陈占山在《不得已（附二种）》附录二《清史稿·杨光先别传》后注①言：“吴明烜即吴明炫，是为避康熙名讳所改。《清史稿》误。”
- [96] 杨光先：《二叩阍辞疏》，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附二种）》，第 82 页，黄山书社 2000 年 11 月。
- [97]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第 60、77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年 4 月。
- [98] 以上 11 位士人中，钱谦益、王棠、郁永河见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第 62、118、204—206 页；其他士人见本书相关章节，东方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 [99]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第 31 页，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
- [100] 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第 8—11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5 月。
- [101] 朱亚非、刘文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门户》，载《世界历史》1999 年第 6 期。
- [102] 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 208 页，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 年 7 月。
- [103] 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 217 页，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 年 7 月。

月。

- [104]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 70 页，商务印书馆民国 24 年 4 月。
- [105] 李云泉主编：《中西关系史》，第 102—103 页，泰山出版社 1997 年 8 月。
- [106] 张时彻：《招宝山重建宁波府知府凤峰沈公祠碑》，《明经世文编》卷 243，中华书局 1962 年 6 月。
- [107] 冯璋：《通番舶议》，《明经世文编》卷 280，中华书局 1962 年 6 月。
- [108] 徐继畲：《瀛寰志略》卷 2《南洋各岛》，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
- [109] 除文中个别的另外加注外，见陈尚胜著《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第 69—71、284—291、311、329—333 页，山东人民 1993 年 12 月。
- [110] 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第 134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6 月。
- [111] 《黑龙江述略》，转引自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第 178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6 月。
- [112]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沈阳出版社 1995 年 8 月。
- [113] 汤纲、南炳文：《明史》，第 51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
- [114] 张燮：《东西洋考》卷 7《饷税考》，中华书局 1981 年 1 月。
- [115] 樊树志：《晚明史》，第 74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
- [116] 谢肇制：《五杂俎》卷 3《地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 8 月。
- [117] 《河间府志》卷 7《风土志》，1964 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景印。
- [118]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5，中华书局 1985 年 4 月。
- [119] 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第 331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 [120] 胡兆量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第 13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9 月。
- [121] 洪迈：《容斋随笔》之《容斋四笔》卷 5《饶州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 [122] 章潢：《图书编》卷 34《统论南北形胜》，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69 册。
- [123]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 年第 2 期。
- [124] 刘德增：《正统的北方人》，第 212—214 页，济南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
- [12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 32《泰州学案》，民国 5 年（1916）上海文瑞楼石

印本。

- [126] 王杰:《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载《文史哲》2001年第4期。
- [127] 王守仁:《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孙爱玲译注《传习录》,第292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1月。
- [128] 陈卫平:《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
- [129] 罗汝芳语,见《明儒学案》卷34《泰州学案二》,民国5年(1916)上海文瑞楼石印本。
- [130] 《陆桴亭选集》卷1,转引自陈卫平《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
- [131] 陈卫平:《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
- [132]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第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
- [133] 孙元化:《则圣十篇引》,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99页,中华书局1989年1月。
- [134] 张星曜:《天儒同异考·弁言》,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99页,中华书局1989年1月。
- [135] 陈卫平:《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
- [136] 王守仁:《传习录上·陆澄录》,孙爱玲译注《传习录》,第80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1月。
- [137]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民国5年(1916)上海文瑞楼石印本。
- [138] 陈卫平:《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
- [139] 利玛窦:《天主实义》第六篇,转引自陈卫平:《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
- [14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5“子部35·杂家类存目2”《灵言蠡勺》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6月。
- [141] 王杰:《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载《文史哲》2001年第4期。
- [142] 陈卫平:《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
- [143] 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关系

- 引论》，第 58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
- [144]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第 6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1 月。
- [145] 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转引自陈卫平《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载《江汉论坛》1993 年第 10 期。
- [146]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钟肇鹏选编《续百子全书》第 21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 8 月。
- [147] 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 3《上徐玄扈相公书》，见《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 244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 3 月。
- [148] 王杰：《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载《文史哲》2001 年第 4 期。
- [149] 顾炎武：《三朝纪事阙文序》，《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民国 4 年（1915）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 [150]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第 6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1 月。
- [151] 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 298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 1 月。
- [152] 黄问道：《辟邪解》，《破邪集》卷 5，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53] 陈侯光：《辨学刍言自叙》，《破邪集》卷 5，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54] 黄虞：《品级说》，《破邪集》卷 6，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55] 王忠：《十二深概》，《破邪集》卷 6，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56] 徐世荫：《提刑按察司告示》，《破邪集》卷 2，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57] 吴起龙：《福州府告示》，《破邪集》卷 2，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58] 《中国天主教史论丛》，50、53 页，“《辨学》抄本记略”，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华北庙会与民间社会》，第 158—159 页，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
- [159]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华北庙会与民间社会》，第 159 页，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
- [160] 张燮：《东西洋考》卷 5《东洋列国考·吕宋》，中华书局 1981 年 1 月。

- [161] 《光绪广州府志》卷 122《胡平运传》，据清光绪五年刻本影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 [162] 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第 31—32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5 月。
- [163] 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第 69—70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5 月。
- [164] 李贽：《续焚书》卷 1《与友人书》，第 92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
- [165] 《南宮署牍·参远夷三疏》，《破邪集》卷一，日本文学博士、九州大学名誉教授荒木见悟、冈田武彦主编《辟邪集 圣朝破邪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台湾总代理，大化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4 年 10 月。
- [166] 许大受：《圣朝佐辟自叙》，《破邪集》卷四，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67] 《攘夷报国公揭》，《破邪集》卷六，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68]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第 67、151、176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 1 月。
- [169] 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第 225 页，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170] 黄贞：《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破邪集》卷 3，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71] 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破邪集》卷 2，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72] 林启陆：《诛夷论略》，《破邪集》卷 6，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173] 张翰勋整理：《蒿庵集、蒿庵集摺逸、蒿庵闲话》，第 299—300 页，齐鲁书社 1991 年。
- [174] 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第 162—163 页表 5—5：明代儒生、文士统计表，第 165 页表 5—6 清代儒生、文士统计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 月。
- [175] 胡兆量等编：《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第 141—158 页表 5—4：历代状元籍贯地详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9 月。
- [176] 《浙江风物志》，第 53、55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2 月。
- [177]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 6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3 月。
- [178] 陈金川主编：《地缘中国·前言》，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参考文献

一、史料

1. 《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本。
2. 《明实录》，民国 29 年（1940）影印本。
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 4 月。
4.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7 年 8 月。
5.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6. [明]王守仁：《传习录》，孙爱玲译注本，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1 年 1 月。
7. [明]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 1981 年 1 月。
8.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沈阳出版社 1995 年 8 月。
9. [明]谢肇制：《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 8 月。
10. [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 1962 年 6 月。
11. 黄宗羲：《明儒学案》，民国 5 年（1916）上海文瑞楼石印本。
12.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民国 4 年（1915）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13.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65 年 6 月。
14. [清]阮元撰：《畴人传》（上、下），商务印书馆 1957 年 10 月。
15. [清]杨光先等撰，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附二种）》，黄山书社 2000 年 11 月。
16.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 1985 年 4 月。
17. [清]夏燮著：《中西纪事》，岳麓书社 1988 年 2 月。
18. [清]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
19. [清]戴肇辰、苏佩训、史澄、李光延纂修：《光绪广州府志》，据清光绪五年刻本影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20. 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1 月。
21.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77 年 7 月。
22. 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1 月。
23. 张翰勋整理：《蒿庵集、蒿庵集摭逸、蒿庵闲话》，第 299—300 页，齐鲁书社 1991 年 4 月。
24. 日本文学博士、九州大学名誉教授荒木见悟、冈田武彦主编《辟邪集 圣朝破邪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台湾总代理，大化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4 年 10 月。
25. 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台北方济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

26. 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二、国内著述

1. 陈垣撰：《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0 年 6 月。
2. 陈垣撰：《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辑），中华书局 1982 年 2 月。
3. 张维华著：《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1 月。
4. 张维华著：《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 年 2 月。
5. 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6 月。
6. 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 1993 年 8 月。
7. 李志刚撰：《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6 月。
8. 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5 月。
9. 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下），中华书局 1988 年 3 月。
10. 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89 年 1 月。
11. 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 1990 年 10 月。
12.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齐鲁书社 1991 年 11 月。
13. 董丛林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 1992 年 6 月。
14. 李亚宁著：《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
15.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16. 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
17. 孙尚杨著：《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18. 李兰琴：《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19. 周燮藩著：《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4 月。
20. 李云泉主编：《中西关系史》，泰山出版社 1997 年 8 月。
21. 王晓朝著：《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 1997 年 9 月。
22. 何俊著：《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8 月。
23. 任延黎主编：《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24. 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5 月。
25. 林仁川、徐晓望著：《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
26. 汪前进著：《西学东渐第一师——利玛窦》，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9 月。

27. 徐海松著：《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28. 晏可佳著：《中国天主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年 4 月。
29. 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 年 6 月。
30. 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澳门日报出版社 2001 年 7 月。
31.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 1 月。
32. 纪宗安主编：《中外关系史名著提要》，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年 6 月。
33. 赵春晨等著：《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8 月。
34. 张国刚著：《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
35. 汤纲、南炳文著：《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
36. 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
37. 樊树志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
38. 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 月。
39. 梁启超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40.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明清人物论集》（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
41. 清史委员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 1984 年。
42. 赵园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43. 梁家勉编著：《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4 月。
44. 王欣之著：《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
45. 席泽宗、吴德铎主编：《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 1986 年 3 月。
46. 王青建著：《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5 月。
47. 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
48. 中国实学研究会编：《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49. 谢国桢撰：《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 2004 年 1 月。
50. 陈尚胜著：《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51. 陈尚胜著：《“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52. 石璋如等撰：《中国历史地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民国 72

- 年(1983)。
53. 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 1983 年 12 月。
 54. 王会昌著:《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 月。
 55. 蓝勇主编:《中国历史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56. 辛向阳等著:《人文中国:中国的南北情貌与人文精神》(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5 月。
 57. 陈金川主编:《地缘中国》(上、下),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58. 刘德增:《正统的北方人——中国南北文化透视》,济南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
 59. 曾煜编:《且说中国人》,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4 月。
 60.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
 61. 赵洪恩、李宝席主编:《传统文化通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62. 《浙江风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2 月。
 63. 安作璋、王志民主编,朱亚非、石玲、陈冬生著:《齐鲁文化通史》(明清卷),中华书局 2004 年 12 月。

三、工具书

1. 姜亮夫纂定:《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
2. 吴海林、李延沛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张惠剑编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
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8 月。
5. 阎崇年主编:《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6. 许焕玉、周兴春、朱亚非主编:《中国历史人物大辞典》,黄河出版社 1992 年 5 月。

四、国外著述

1. [意]德礼贤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商务印书馆民国 24 年(1935) 4 月。
2. [意]利玛窦、[法]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1990 年 10 月。
3. [意]柯毅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7 月。
4. [意]白佐良、马西尼著,萧晓玲、白玉崑译:《意大利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2002年10月。

5.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
6.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下),中华书局1995年11月。
7. [法]杜赫德编,郑德第、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
8. [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中华书局1990年7月。
9. [西班牙]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年7月。
10. [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
11. [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12. [比利时]钟鸣旦著,香港圣神研究中心译:《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五、论文

1. [比利时]钟鸣旦撰,马琳译:《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8月。
2. 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8月。
3. 陈伟明:《近年明清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述评》,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2期。
4. 张先清:《1990—1996年间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6期。
5. 何建明:《基督宗教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述评》,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6. 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7. 林金水:《利玛窦交游人物表》,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2月。
8. 林金水:《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交游表》,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5辑),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
9. 刘建:《简论徐光启的宗教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4期。
10. 赵毅:《论徐光启的西学观》,载《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

11. 王力军：《简述李之藻的治学观及其西学图籍》，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2. 赵建海：《李之藻和〈浑盖通宪图说〉——比较天文学的地平》，载《中国文化》1995年第2期。
13. 计翔翔：《明末奉教官员李之藻对“景教碑”的研究》，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14. 林坚：《明末天主教儒者杨廷筠》，载《中国天主教》，1990年第1期。
15. 陈柏绿：《爱国爱教的科学家王征》，载《中国天主教》1990年第3期。
16. 郭熹微：《王徵散论》，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
17. 宋伯胤：《题王徵〈两理略〉残本》，载《文献》1984年第1期。
18. 张中政：《明代杰出机械学家王徵论评》，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19. 张中政：《明泾阳王徵先生行实述评》，载《史学集刊》1994年第4期。
20. 张柏春：《王徵与邓玉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
21. 张柏春：《王徵〈新制诸器图说〉辨析》，载《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1期。
22. 张惠民：《明末王徵的翻译出版活动及其历史影响》，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23. 冒怀辛：《论方以智的〈通雅〉》，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24. 罗炽：《方以智对西学的批判吸收》，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25. 陈卫平：《方以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载《江淮论坛》1993年第2期。
26. 关增建：《方以智“通几”与“质测”管窥》，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27. 吕锡琛：《论方以智科学实践中的科学精神》，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5期。
28. 薛斌：《王锡阐年谱》，载《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4期。
29. 李波、薛小荣、刘永伟：《吴渔山笔下的澳门》，载《文史杂志》1999年第6期。
30. 黄晨敏：《罗文藻吴渔山简论》，载《安徽史学》1998年第4期。
31. 万明：《晚明南京教案新探》，见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32. 陆敏珍：《论明末反天主教运动》，载《安徽史学》200年第2期。
33. 朱亚非、刘文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门户》，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
34. 朱亚非：《16—18世纪西学在山东的传播》，载《中西文化交流》2004年第1期。
35. 谢方：《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2月。
36.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37. 陈卫平：《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
38. 王杰：《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载《文史哲》2001年第4期。
39. 乔凌霄：《明清之际的文化心态与西学传播效应》，载《安徽史学》1999年第2期。
40. 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南北论》，载《上海文化》1994年第5期。

致 谢

光阴荏苒，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在硕士论文完成之际，我要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衷心感谢我的导师朱亚非老师！论文从构思到写作，都得到了朱老师无私的帮助和热心的指导。朱老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受益终生。不仅是学业上的指导，朱老师还在生活上给予关心和照顾，在做人做事方面进行规劝和开导。值此，谨向恩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感谢导师组的安作璋先生、王克奇教授、张仁玺教授、仝晰纲教授三年来给予的指导与教诲。

感谢我的父母和我的弟弟。他们的辛勤劳作和无私奉献使我不必为生活奔波，能够安心学习。

还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同学们。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师姐赵红、师妹梁娟娟、盛雪雁、师弟赵树国以及吉秀华、韩晓燕等同学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此外，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时间仓促，文中难免不足和疏漏之处，恳请诸位师长斧正。

翟 杰

2005年4月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论文《明清时期的地方衙门》刊发于《联合日报·文史周刊》2003年9月26日第三版。
- 2、论文《管中窥豹 小中见大——从狮子入华看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刊发于《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 3、论文《铁铉与济南保卫战》收录于《山东重要历史事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
- 4、论文《兼通中西的历算名家薛凤祚》收录于《山东古代科学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 5、论文《妙趣横生狮文化》收录于《中国学研究》（第七辑），济南出版社2005年3月版。
- 6、论文《铁铉与靖难之役》（第二作者）收录于《济南文史论丛》（初编），济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 7、参编《新时期山东精神》（青少年学生读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
- 8、参编《风雨域外行——探寻古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足迹》，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明末清初南、北方士人对待西学态度之比较

作者: [翟杰](#)
学位授予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

: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64787.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3fa0af8b-1e4c-4a5b-95b5-9e4d00818342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